

湖南文史资料

第30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南文史资料

第30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 朴永子 徐晓吟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政协文史书刊发行组发行
(长沙市迎宾路15号)
湖南省轻工业专科学校印刷厂印刷

•

1988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 字数: 170,000
印数: 1—11,000 定价: 1.50元
国内统一刊号 CN43—1011

●主 编 田伏隆

●责任编辑 朴永子 徐晓吟

湖南文史资料

19288

目 录

(总第30辑)

宗 教 史 料

- 建国前的湖南天主教 肖鸿才 郭先开 (1)
- 长沙基督教青年会的创始与活动 冯崇毅 (14)
- 与外国传教士抗争的二三事 徐灵石 (26)
- 我的从教生活纪略 李雍吾 (33)
- 我的佛门生涯 戒 圆 (37)
- 李仁山阿訇传略 李子厚 马文彬 (46)

地下武装史料

- 回忆我在酃县的革命斗争经历 周 里 (54)
- 湘中二支队始末 谢德明 (77)
- 湘中一支队第三团地下斗争概况 封岐山 (97)
- 浏阳起义前后 王绳祖 (103)

社会生活史料

- 熊希龄的救灾办赈活动.....周秋光 (107)
长沙民办消防业始末.....刘孟坚 (131)
长沙百善堂纪实.....刘舜华 (142)
长沙娼妓之兴废.....谭文俊 渔 叟 (150)

少数民族史料

- 龙潭首义.....石老保 (157)
我的土家族织锦艺术生涯.....叶玉翠 (165)
隆回瑶族.....李泽芝 (178)
龙山土家族的风俗习惯.....王本亮 (197)

补充·订正·质疑

- 订正《我所知道的李锐》.....李 璜 (212)

建国前的湖南天主教

肖鸿才 郭先开*

天主教传入湖南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传入和发展，与当时的社会、国情、民俗相关。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可以公开传教，外国传教士也随之蜂涌而来。尔后，清朝廷与侵略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都有自由传布天主教和建堂礼拜的专条及在内地购置田产、房屋的协议文件。天主教在湖南得以发展。

九个教区的形成

1856年，湖南天主教从湖广教区划出，成立湖南教区，第一任主教为西班牙籍传教士方来远。

1879年，将湖南教区划分为湘南和湘北两教区。湘南教区首任由南熙主教担任，湘北教区由奥斯定会罗安希代理，直到1890年才委派西班牙奥斯定会方类思为正式主教。

这一时期，湖南天主教有了较大的发展，与前一时期比较，不只是据点，而是有了正式座堂和独立的教区，除了有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外，又增加了西班牙奥斯定会的传教士。由于这些传教士与清朝廷地方官吏勾结，人民的反洋教运动高涨。首先是宁乡的周汉（1843—1910年）在长沙的反洋教招贴，继而在各处发生教案，如临湘教案，湘潭清泉教案和岳州、衡州教案。倒毁教堂情况时有发生。

*肖鸿才 现任湖南省天主教爱国会、教务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长沙市天主教爱国会主任。

郭先开 现任长沙市天主教爱国会常委兼副秘书长。

1900年，外国传教士借与清朝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和赔款，到处建堂传教，教徒大增。

1924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天主教会议后，于翌年再将湘南教区划分为长沙和永州（即零陵）两教区。长沙教区首任主教为意大利籍方济各会会士翁德明，永州教区由奥地利方济各会会士颜定恒任第一任监牧。

1925年，湘北教区划为常德和辰州（即沅陵）两教区，常德教区首任主教仍为奥斯定会会士翟德隆，辰州教区分给了美国苦难会会士，第一任监牧为兰会理。

此时，西班牙奥斯定会、意大利方济各会、美国苦难会、卢森堡方济各会修女先后到常德、岳阳、长沙、沅陵、永州、衡阳等地开办修道院、育婴堂，各教区购置土地、房屋、修建教堂和神父住宅，逐步办起了学校和医院。

1930年衡阳教区从长沙教区划出，第一任主教为意大利方济各会会士柏长青。不久，长沙教区主教翁德明回国，由巴猷略代理，到1933年意大利籍传教士石道琦才为正式主教。

1931年，岳阳和澧县两教区从常德教区划出。岳阳第一任监牧为西班牙奥斯定会会士高凤翔，澧县教区第一任监牧为马匡珍，常德教区主教仍为翟德隆。

1937年，又在长沙教区中划出湘潭教区，第一任代理监牧为闵理。长沙教区主教仍为石道琦。

1938年，从永州教区又划出邵阳教区，第一任监牧为龙博义，系匈牙利方济各会会士。至此，湖南天主教已成为九个教区，即长沙、常德、沅陵、衡阳、湘潭、零陵、岳阳、澧县和邵阳。与此同时，各教区所辖市、县都建立了本堂和分堂，教堂遍及城镇乡村，全省共有大、小教堂600多座，单就长沙教区所辖一市六县总堂、本堂和分堂就有81个。除主教座堂、总堂和本堂有主教神父外，大部分分堂都是由传教员管理和传

教，在建国前，湖南共有天主教徒57462人。

1946年，梵蒂冈宣布中国天主教建立圣统制。翌年3月16日，梵首任驻华公使黎培里来我省视察教务，先到衡阳为柏长青主教举行圣统仪式，事毕赴湘潭视察，于18日抵长沙，又于23日上午9时在长沙天主总堂主持兰泽民晋升为总主教大典和大礼弥撒。此后长沙教区即为湖南天主教总主教区，成为省内天主教的中心。

从天主教传入湖南这300多年间，有来自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德国、南斯拉夫、美国和加拿大等十个国家的314位传教士在湖南传教，还有来自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匈牙利、美国、爱尔兰、卢森堡、法国等八个国家的66位修女协助传教工作。

在湖南晋铎和传教的国籍神父115位，国籍修女也不少。建国后，健在的国籍神父修女大多数能爱国爱教，逐步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有的神父已为自选自圣的主教，如常德教区主教相高坚，澧县教区主教王子澄（现均在中国天主教和北京神哲学院担任领导工作）、岳阳教区主教李树仁、长沙教区主教屈天锡等分别担任湖南省天主教爱国会和教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兴办教育事业

湘南教区由意大利籍传教士于1892年在衡阳一带办有教会学堂15所，庚子年衡阳教案发生后，全部停办。1907年又重新设立8所，1912年增至20所，1917年41所，1924年为107所。

湘北教区由西班牙籍传教士于1889年在岳阳、常德、临湘、澧县、石门等地办有教会学堂12所，1904年增至28所，1910年为55所，1925年为67所。

大革命后，教会学校数字急剧下降。

庚子年以前，教会学堂全是私塾，宗教课是主要课程，附带读些《三字经》、四书之类，学生都是教徒儿童，人数不多；辛亥革命以后，才开始教些国文、算术；五四运动后，教会才办正规化的学校，1919年衡阳创办的仁爱小学就是湖南天主教的第一所正规学校。

从五四运动到建国前，湖南天主教办有中学4所、高级卫生学校2所：即长沙丽文中学、衡阳仁爱中学、常德启智中学、沅陵辰粹中学和长沙丽文高级护士学校、沅陵天主堂医院高级护士学校。

长沙丽文中学创始于1921年，原为“先觉师范学校”，1922年改为丽文中学。1923年由长沙北门外长春巷“自得园”迁至盐仓街新建校舍，创办人为长沙教区主教翁德明，罗诚任校长，继任者有王恢先、蔡××、吴思敬等。1952年由人民政府接办，现为长沙市第八中学。

衡阳仁爱中学创办于1936年，创办人郭藩神父为校长，于斌任董事长，校址在衡阳黄沙湾，1944年衡阳沦陷，郭藩将仁爱中学先后迁至零陵、贵阳、遂宁等地复课，抗战胜利后又迁回原地复校。建国后，万次章任校长，1951年由人民政府接管，现为衡阳市第四中学。

常德启智中学系由启智小学发展而成。启智小学创办于1928年，中途停办，1940年复校，由杨高坚任校长，1949年由政府接办。

长沙丽文高级护士学校创办于1947年，校址设长春巷原天主堂育婴堂，建国后政府接办，现为长沙市卫校。

沅陵天主堂医院高级护士学校，1947年创办，建国后也由政府接办。

此外，常德、澧县、慈利、岳阳、华容、平江、沅陵、长沙、安化、大福坪、衡阳、耒阳、湘潭等地均办有小学。

兴办卫生事业

湖南天主教所办之医院大都出现在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为抗日战争前后（1936—1938年），如长沙天主堂医院、衡阳仁爱医院、沅陵天主堂医院。第二时期为抗战胜利后（1946—1947年），如耒阳仁慈医院、祁阳天主堂医院、邵阳圣母医院、湘潭天主堂医院、浏阳天主堂医院、益阳天主堂医院等，另外岳阳、澧县、常德、零陵、安化、大福坪等地天主堂于同期开办了诊所。

1906年，六名外籍方济各会修女来长沙教区开始为病人治病施药。1910年后，教会重建房屋，应诊人数增多，逐渐在堂内开设诊所。1936年又扩建房屋，加设病床，补充设备，聘请医师，将诊所改为正式医院，即长沙天主堂医院。1946年扩建住院部一栋，门诊部在原有的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基础上增设放射科和五官科。1947年附设高级护士学校为医院培训服务人员，使医院具有一定规模，赢得了群众一定的信誉。建国后由政府接办，现为长沙市第二医院。

1938年，衡阳教区在衡阳草桥附近筹建一座楼房，开办仁爱医院。1944年该院房屋被毁，曾停办。抗战胜利后，将草桥主教府改为医院复业。建国后政府接办，现为衡阳市第三医院。

1924年，沅陵教区成立后，即开办诊所，1938年将诊所改为天主堂医院。

1947年，湘潭、邵阳、耒阳、祁阳、益阳、浏阳、岳阳、常德、澧县、安化、零陵等地市相继开办医院或诊所。

总之，教会所办医院、诊所虽不能尽如人意，但对中西文化、科学技术交流和弥补当时社会之不足，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所办的难民所

〔长沙教区难民所〕该所创办于1937年日军首次轰炸长沙之日，当天日机三架，将车站路、校厂坪、小吴门、经武路、骥子桥等地街道房屋炸成一片焦土，炸死炸伤居民在百数十人以上，没死伤的人，扶老携幼，无家可归，比比皆是。适逢天主教办的丽文中学因无处迁移停办，于是天主堂即将其空出的校舍，开始收容长沙本市的避难者，首批约收200人，一切食宿费用皆由教会负担，以后随着战火蔓延，难民也从四面八方拥进长沙，教徒与非教徒皆有，非教徒还占多数。

不久，湘岸盐务办事处处长陈如金（浙江人，天主教徒）与长沙教区主教石道琦面商，合办难民所，双方各派管理人员一名，难民伙食费用由盐务处津贴，其余住房水电灯油柴炭和用具开支均由教会负责，这是难民所政教合办的开始，时在1938年1月。

这时难民所，能容纳一至三千人，湘北三次大会战，又由三千扩大到五千人，长沙大火时，猛增到数万人，一时校舍操坪，人山人海，拥挤不堪，简直无法插身。天主堂堂内和所属菜园里，亦搭盖临时棚屋，安插了1000余人。后经宣传动员，鼓励下乡投亲靠友，这杂乱拥挤现象，才于半月后消除。

当时难民所是由石道琦主教亲自督办，先后共收容来自沦陷区的难民近万人。石主教经常数日通宵达旦，为安置难民而奔波，终因辛劳成疾于1939年病逝长沙。难民所由接任长沙教区主教兰泽民兼管，1945年停办。

〔沅陵教区难民所〕沅陵教区共办了四处难民所，即沅陵、芷江、辰溪、泸溪等地，收容人数，沅陵计约千余人，辰溪三四百人，芷江七八百人，泸溪仅200余人。

沅陵县难民所分驻四处地方，所长为主教的秘书邓序岳，

这四处地方分别由樊术声、樊莫英、杨月波、樊家明负责，经费从1938年起，沅陵教区担任一部分，国际救济处供给一部分。长沙大火后，长沙分去1000名难民，仍由盐务处供给生活费。城市内设有难民医院，为难民治病施药，对难童负责教育，免费入学，安排在教会办的尚智小学念书，另外还在凉水井及吕公坪两地，设有难童学校。

〔衡阳教区难民所〕衡阳教会在黄沙湾慈幼堂办有难民所，收容人数约四五百人，多系妇女儿童，一部分是日机轰炸时无家可归的灾民，都由修女们负责管理，每日一粥一饭，皆由教会供给，闲时做一些针线活计，接取零星费用。

开办修女院

湖南教会差不多每一个教区都有自己的修女院或贞女院。

衡阳教区办的“圣母痛苦修女会”（又名玛利亚松达方济各第三会），是1933年成立的。在1930年，长沙、衡阳分教区的时候，衡阳主教柏长青就准备成立一个修女会。他召集一批在家生活的“贞女”到草桥天主堂过集体生活，进行训练，参加各种宗教活动，1933年正式成立修女会。1934年将修女院由草桥天主堂迁至南乡的欧家佃，将原来天主堂小学校舍改为修女院院舍，委派一外国修女任代理院长。1938年在黄沙湾主教堂的旁边开始修建新的院舍，1939年修女们便迁入新舍。直到1944年8月日军占据衡阳，修女院的房屋全部被毁，修女们一部分迁往北乡将军庙天主堂，一部分遣散归家。1946年修女院院舍在黄沙湾原址修复，修女都迁回，有四人发“终身愿”，同时也吸收了一批新的“初学生”。翌年又有8人发“终身愿”。到1949年全院修女和初学生有30余人，建国前有10余名修女由郭藩神父带往国外，余下的留在原处，后来各自走上了工作岗位。

长沙教区的“圣母无玷圣心修院”，于1945年由意大利籍传教士在安化开始筹备，当时有“初试生”10余人，大多数来自育婴堂，1947年在长沙正式成立，主办人为长沙教区总主教兰泽民，监督司铎宝仁，瑞士籍白衣修女蒲先辉为该院“初学师”。后来都走上了学习和工作岗位，一直独身留在教会的还有4位修女，现在长沙天主堂内过着平安的修女生活，但大都年近，年龄最大的80多岁，最小的也有60多岁了。

常德教区于1925年开设过一个“传教贞女会”，有未婚的女青年教徒10余人，由教会资送入学读书，以后修女院未成立。

岳阳教区也于1933年成立了一个“奥斯定第三会”（修女会），1937年曾有修女4人，建国后，他们转到汉口，参加了医务工作。

同时，零陵教区也有自己的修女会，还有澧县贞女会，沅陵修女会，邵阳修女会，人数不多，建国后自行解散。

修女院的制度是很严格的，要成为正式“修女”要经过几个阶段：

“初试生”，从12岁到15岁的女孩，开始在修女会指定的修女监督之下过集体生活。

“保守生”，一般从15岁到16岁，为期六个月。此时期必须中断普通学校课程，专学宗教课和从事宗教活动。进院时须向修会缴纳规定的套资，整个生活置于“初学师”的监督之下。

“初学生”为期两年，开始穿着“会衣”，应深居院内，如果因任何原因在院外留住一月以上者，则初学便算中断，应从新开始。二年期满后就可“发愿”，正式成为修女。先发一年的“愿”三次，再发三年的“愿”一次，年满24岁就可以发“终身愿”，成为终身修女。

发“终身愿”也就是发“三愿”：

一愿为“听命愿”，要求修女对上司的一切措施和意图完全接受、服从，不允许有任何意见。一个普通修女有层层的上司，如初学师、院长、神师、监督司铎、修女会会长、教区主教等，任何一点不满意都可被认为犯了“圣愿”。

二愿为“神贫愿”，要求修女除上司给的衣食外，不得有任何生活上的要求，也不得有处理任何个人财物的权利。按照规定，修女保有进会时向修会缴纳的奁资财产的权利，并有取得其它新的财产的权利。但是对自己的财产不能使用，不得放弃，也不得私赠于人，唯一的办法就是交给修会。“初学生”在病重垂危时，可准其发愿，随着发愿，她的所有财产也就归于修会。

三愿为“贞洁愿”，就是约束修女不能结婚。院规规定修女不得与外人，特别是与男子来往亲近，休息的地方和餐厅、寝室均称为“禁区”，严禁外人进入。

虽然“圣愿”分为定期的（一年或三年内有效）或终身的，按规定，发定期愿的修女，期满之后，可以离开修院，不作修女，但这样作，在实际上会遇到很多阻碍，修女还“俗”被认为是“不体面”的事。

修女按照缴纳奁资的多少或学识的高低，分为不同的等级，她们在会内的生活享受，职位都因之不同，有的修会还把这种等级差别从服装穿着上标志出来，一般修女只能作日常服役的工作，比如打扫和点缀“经堂”，绣制宗教“祭服”，教儿童或成年人的宗教课，或在医院作护士，一切领导权利不会有她们的分。中国修女同外国修女之间，在地位和待遇上也有很大的区别。

修女从初试到发愿一般要经过12年，由于长期在修女院内简朴生活的训练，她们逐渐养成了对世俗淡薄，无个人欲望，整日潜心祈祷诵念，只得把自己的身心献给天主，以甚多的爱

服务人群，就是最光荣、最神圣的事情。

传教员和传教研究所

每一堂口在教徒中推选一位熟悉教理的年长教徒为堂长或会长，他们是传教员的手足，但他们不同于传教士，没有传教士的“神权”，他们可以结婚，有家室，土生土长，和一般群众没有什么区别，便于在群众中活动。

传教员大约分为两类：一类为宣道员，主要任务是作讲道工作。另一类为管理堂口的传教员，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管理教徒的宗教生活和协助办理教徒们的婚丧事务，教授经言教义，解决教徒之间和教徒与非教徒之间的纷争。

鸦片战争后，随着天主教的发展和教区的形成，教徒人数及教堂都大大增加，光靠传教士是不够的，所以传教员在教徒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大革命前的传教员一般没受过什么特别训练，靠简单的传教方法不得不有所改变，对传教员的要求也与过去有所不同，在1930年后，传教员大多经过挑选并进行专门集中训练。1930年，衡阳、长沙、常德、岳阳、澧县、沅陵等教区先后开办了传教研究所或短期培训班，专门培养训练传教员。

经济情况

湖南天主教在建国前各教区都拥有相当数量的房地产，建立了数百座教堂，还兴办了学校、医院，其传教经费是从何而来呢？从我们所了解和掌握的资料来看，经费来源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鸦片战争前〕 湖广教区传教士分别属于耶稣会、遣使会、方济各会，此外还有不属任何修会者，由纳玻里圣家学院受训归国的中国神父，按国籍分，有葡萄牙、法国、意大利、德国、奥

地利。这些不同国籍不同修会的传教士又分为两个系统，即葡萄牙保教系统和传信部系统，由于国籍、修会、系统的不同，其经费来源也就各异。

葡萄牙国王对保教系统的传教士给以经济补助。葡籍传教士特·高勿亚1669年10月6日的信中说明：葡耶稣会士全年预算，接近两千五百果诸拉（葡币），其中一千由葡王拨款，其余为房产和投资收入，在这以前，还有海上贸易收入。

德国的巴伐利亚，曾为在中国的德国传教士征收传教税。

罗马教廷传信部，在澳门设立办事处，供应部分经费，如1704年给德国传教士穆天尺一千银元作办修院之用。

法国国王给予每名法籍来华的传教士六千法郎。

〔鸦片战争后到庚子年〕 经费来源大致为传信部津贴、修会津贴、教案赔款和圣婴善会津贴。

传信部津贴，除了传信部本身的产业收入外，有传信会的“捐款”，此项捐款主要来自法国。

修会津贴，湘北教区的经费在这段时期内主要由菲律宾耶稣圣名省供给。

教案赔款，这段时期的主要教案赔款有1862年湘潭教案赔款三千两（赔修教堂费用在外），临湘教案赔款四百两，河伏教案及石门教案赔款等。

圣婴善会总部设法国里昂，主要经费来自法国“捐献”。

这段时期传教士的生活费用，1900年2月湘北奥斯定会命令每人全年不得超过三百元。

〔庚子年后到抗日战争胜利〕 其经费来源主要为：

教案赔款：衡阳教案赔款三十七万两海关银子，还有沅陵和长沙抢米风潮烧毁教堂房屋的赔款等。

田产收入：湘北教区在安乡拥有田地近万亩，这些土地有的是购买的，有的系由富豪捐献和政府赠送；衡阳天主堂有田

500亩，年租谷为1600石左右；在沅江、华容、澧县、祁阳、常德等地，亦拥有田产。

房地产收入：湖南奥斯定会曾在汉口和上海都购买了房地产，并设立经理处，取名望德堂，有部分地皮系法国租界当局“赠送”。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西班牙教士以为前景不好，将大部分房产出卖。但所有望德堂出卖的房地产多在法国租界上，而租界上是不许中国人有产权的，所以房产出卖后，名义上仍属望德堂，买主为了使用望德堂的名义，得付“挂旗费”，即借用外国旗的费用，同时其经租权仍由望德堂保留，取百分之十的经租费。

经商收入：1894年西班牙奥斯定会传教士在上海成立经理处望德堂，开设“奥斯定会公司”，拥有码头、仓库、工厂和房产等，并进行金融投机，它的收入除了供应湘北教区传教经费外，主要是供应菲律宾耶稣圣名省的费用，包括该省在西班牙、菲律宾以及南美的活动经费。

外国政府津贴：意大利政府1924年3月20日公报，墨索里尼给意大利在中国的教区拨款1000万里拉，作为特别拨款，分10年拨给，每年100万里拉。当时意大利在中国有十四个教区，湖南教区便是其中之一。

传信部津贴：传信部收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大部来自法国，后来大部来自美国。传信部津贴的多少，系根据教区的大小决定。以澧县为例，1935年年例津贴为50000里拉，此外还有非常津贴二万里拉；1938年年例津贴为81000里拉，例外津贴7000里拉；1939年年例津贴为85000里拉，例外津贴为3000里拉。

圣婴善会津贴：以澧县为例，1936年至1937年，每年为10000法郎，1938年为11050法郎。

教徒捐款：估计全省教徒每年捐款约在7000元左右，包括

弥撒献礼、耶稣苦难节捐、传教节捐、主日捐等。

〔抗战胜利后至建国前〕 这几年的经济来源，除原有的房地产、田产收入外，多半来自美国，包括传信部年例津贴、救济物资及教区、修会在美国的募捐、美金弥撒等。又以澧县和长沙为例，1947年获得年例津贴 12000 美金，长沙教区1948年在美国募得捐款48000美金。

【责任编辑 朴永子】

长沙基督教青年会的创始与活动

冯崇毅*

历史沿革

基督教青年会于1844年在英国伦敦成立。当时有个英国商人乔治·威廉邀集12位青年店员，组织了第一个基督教青年会。这种青年宗教组织发展很快，不久就传遍了英伦三岛，随后又出现在欧美各国。

1851年，基督教青年会从英国传到美国。美国将这种单纯的青年职工宗教团体发展为从事“德、智、体、群”四育运动的社会活动机构，建筑庞大会所，聘用专职干事。

1855年，欧美各国的基督教青年会在巴黎举行第一次国际性的会议，组成“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并于1878年在日内瓦设立了办事处。1889年，美国和加拿大的青年会联合组成“北美协会”。1885年，中国福州的英华书院和北通州的潞河书院就有美国传教士发起组织的学校青年会出现。从1895年起，美国派来很多“西干事”，先后在天津、上海、香港等地成立城市青年会。1912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组合”成立于上海，1915年改名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以下简称全国协会）。协会的宗旨是“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全人格，建设完满社会”。会训是“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会徽是一个等边三角形，三角中间有一条蓝色横杠，表示德、智、体、群。

1911年，循道会教区长任修本、圣公会湘鄂主教吴德施和会长黄瑞祥、信义会监督戈德白、内地会牧师葛荫华、雅礼学

*冯崇毅当时系长沙基督教青年会干事。

校校长盖葆耐、雅礼医院院长胡美和副院长颜福庆、遵道会监督德慕登、自立福音会会长曾季融、湖南咨议局议长谭延闿和副议长廖名缙、商会会长李达璋、明德学校校长胡元倓及栗戡时、曹典球、聂其焜等十多人，联合向全国协会请求派员来湘协助筹设长沙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即派挪威人穆格新来长沙，暂借西牌楼雅礼学校房屋一间，从事筹备工作，并聘陈步舟为襄理。1912年春，租赁浏正街聂宅为会址，正式成立了长沙基督教青年会（以下简称长沙青年会），推选颜福庆、黄瑞祥、曾季融、梁家骝、梁宗实、王海珩、刘云珊为董事，颜福庆为会长，聂其焜为名誉总干事，穆格新为总干事。

1913年，全国协会将穆格新调走，另派美国人饶伯师来湘担任总干事，同时派挪威人夏义可前来倡导体育，并聘请欧阳峙为干事。1914年秋，欧阳峙辞职，改聘谭信一为德育部干事兼舍监，并聘请肖志恒、李俊、余克安为干事。先后开展了宗教演讲、运动会、交谊会等活动，开办了英文夜校、体育班、查经班等。因工作日益增多，房屋很不够用。1917年春，雅礼学校迁移北门外新校址后，长沙青年会遂改租西牌楼雅礼学校旧址，设置了礼堂、内外操场、交谊室、教室、会员宿舍、浴室及食堂等。增加了2名英、美干事和一些中国干事。经过补充和调整后的阵容为：总干事饶伯师，德育部干事谭信一，智育部主任干事为英国人费雅，青年中学校长吴家任（后由杨嘉炯继任），体育部主任干事为挪威人夏义可、干事王毅诚，会员部主任干事杨怀偕，文书兼事务李懿初，干事易怀清、柳之俊、祖荫祺、张孝荣等，童子部主任干事为美国人蓝安石，干事游义群、欧阳纯光、李亦怀、易耀南、刘子榆等，学生部干事张登瀛（后为徐庆誉），职工部干事刘岷庵、张子谋等。自此至1926年秋大四方塘新会所开幕时止，为长沙青年会的“全盛时期”。

经 济 来 源

“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和“北美协会”的经费大部分由美国提供，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煤油大王洛克菲勒、钢铁大王卡内基、汽车大王道奇、百货公司大王华纳麦卡都出了一笔基金。后来北美协会负责人穆德提出了一个向远东和拉丁美洲扩展的预算，目标是集资150多万美元，计划在10个国家建盖49座会所，其中有8所在中国。长沙青年会建盖大四方塘新会所的时候，即由全国协会从北美协会分得10万美金作为一部分建筑费，不足之数，向长沙当地官僚、地主、民族资本家募捐一部分，其余在长沙青年会经常费用中开支。

长沙青年会的经常费用，主要来源是会员会费和当地捐款。长沙青年会每年要搞一次征募活动，全部干事及部分董事和职工都参加。由外国传教士出面找军政界首脑担任征募会长，再列一个机关、团体、商店、学校负责人捐款名单，由干事们登门拜访，收取捐款。

当时饶伯师收款最称能手，他常穿一套颇于破烂的旧西装，踏上一只烂皮鞋到处拜访，凡是一般难得会见的人都由他去接洽。莫看他穿得褴褛，但因他是洋人，出入衙门却畅通无阻，他要会见的人是不敢故意回避他的。他见了人就作揖打拱，在外面的生活也比较随便，因拜访不及回家吃饭，就站在街上吃糖油粑粑。这样就使一般人对他发生好感，认为他的生活是“平民化”的。

其次是会所收入。长沙青年会设有一些服务性的营业场所。球场、弹子球房、电影院、理发室、澡堂等都对外售票，加上会费、学费、寄宿费等收入，以此来养会。

德育部的“查经与布道”

长沙青年会经常有中、英文查经班，目的是研究基督教的

经典著作——《圣经》。内容包括：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关于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耶稣基督的降生、行道、医病、殉道和复活。中文查经班由德育部干事主持，当地各教会教牧师轮流主讲。参加的人多半是在生活上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他们很“虔诚”，不久就加入教会成为信徒。英文查经班是由外国传教士主领，参加的人多是富家青年子弟。他们想学点地道的英文，以便将来考入教会学校，毕业后报考邮政、海关等职业。

除了上述查经班外，长沙青年会与协会联系，请来几个外国传教士在布道大会上传道，如1915年秋，联合各教会，在汤梦铭的协助下，于省教育会前坪，搭上临时大会场，举行艾迪布道大会，进行系统的连续布道，聂其焜担任翻译工作。经过7天的水陆道场，有400余人立志签名愿加入教会。1934年，针对很多青年徬徨失望，协会又把艾迪请来中国，再次到长沙进行大布道，翻译是曾宝荪，曾约麓。布道题目是“青年与宗教”，大意是引导青年皈依上帝，那次搞了8天，签名信教的又有几百人。1948年，艾迪第三次到长沙布道，翻译是欧阳峙牧师。这次听众不太多，签名“皈依”的也不多。此外还有神学教授陈文渊和宋尚节、顾子仁、沈文卿等来长进行了布道。通过几次大布道，前后签名信教的有1000余人。

德育部的办学与讲演

长沙青年会德育部主任干事是英国人费雅，他的长沙话说得很好。德育部办有英文夜校和日校、英算补习班，后来又办了一个青年中学。费雅虽不是中学校长，但学校大事都要请示他。学校除了上课外还利用青年学生好动的特点，让学生在课余时间参加青年会的社会活动。英文夜校和青年中学培养

了一些青年会的工作骨干。如全国协会的副总干事江文汉、上海青年会的总干事杨怀僧，都是由英文夜校毕业后，以青年会工作为终生职业的。张以藩由青年中学毕业后，担任长沙青年会20余年的总干事。

长沙青年会除了举办补习学校和青年中学外，还由协会请来一些外国专家、教授先后举行了几次大演讲，如1916年秋，举行卫生展览演讲大会，由彼得主讲，参观和听讲演的有10余万人。当时中国人民对教会办的医院不太信任，听了演讲后，来看西医门诊的多了。随后胡宜明作了卫生演讲，湘雅医院胡美及该院学生张维、王昌作了医学演讲。1917年春，举行了凌道扬的森林演讲，秋季举行了余日章的教育演讲。1918年秋举行了饶伯森的单轨铁道科学演讲。1922年春季，又举行了饶伯森的无线电科学演讲。1927年，黄仁霖作了振兴教育为救国的演讲。此外还有韩镜湖的盘旋机演讲，方昶的理化演讲。这些演讲一般都连续几天，并以仪器、模型、图表作辅导，边讲边演，有声有色。听众又听又看，很感兴趣。

体育部的夏义可

长沙青年会体育部主任干事为挪威人夏义可。1914年，他在长沙青年会举办体育训练班，长沙的老体育教员黄凤岐、李惠迪、盛国俊、彭泽沛、陈海帆等人都参加过这个班。1916年，长沙青年会聘请王毅诚为体育部干事协助夏义可工作，他们到长沙各中等学校介绍美国篮球和田径运动。据说长沙前几届运动会是在夏义可指导下举办的，除球类、田径外，他的体操和游泳，跳水技艺也很好。他还和朱恩德（曾在远东运动会上取得十项第一名）、杜荣棠到湘潭、衡阳、殷殷、常德及岳阳一带介绍体育运动。1934年夏，他在益阳带学生游泳时，不幸淹死。

会员部的征友会与电影

青年会的基本群众为会员，但长沙青年会是先成立董事部，由董事部聘请干事，雇佣职员及工友，俟组织机构就绪，才开始征求会员。会员分为两类：一类叫会员或称会友，是社会上一般人士。凡愿缴纳会费者，都可以参加；一类叫宗主会员，是各基督教会的信徒。其入会的手续与一般会员相同，但不同的是，至下届选举董事时，只有宗主会员才能参加选举。董事和干事必须是基督教信徒；职员与工友则不加限制，听其自愿。会员以缴纳会费的多少分为普通、特别、名誉几种。普通会员的入会费为4元；特别会员为12元；名誉会员为24元。

（后来严文祥代理总干事时，又增加赞助会员，会费为50元；永久会员，会费为百元以上。）学生会员，入会费一律为2元。此外还有所谓乐捐，只要出钱，数目不拘，可不入会。

除宗主会员在选举董事时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外，一般会员并无任何权利，亦不承担任何义务。缴纳会金后，可领到一个会员证。每年除开一两次会员会，免费赠送入场券外，参加会内一切活动，可凭会员证按八折取费（如住宿费非会员每天1元，会员凭证8角）。有的会员很少到会里来，送给他们开会的入场券，就打发小孩或雇请的佣人来看看热闹。此类会员只纳会费，不参加活动。长沙青年会会员人数最多时是西牌楼时期（1917—1925），那时南北军阀混战，有的大户人家公馆门上，只要贴上“长沙青年会会员住宅，不得滋扰”的纸条，那些散兵游勇便不敢进去。因此，有被人家都高兴入会。

会员部还负责放映“无声电影”。长沙正式映放电影公开营业是以青年会为先。青年会为配合宗教演讲，有时放映幻灯片和16毫米的活动电影（关于耶稣一生的故事——“天路历程”）。会所搬往西牌楼后，每逢周末正式售票，放映大银幕

无声电影，影片有：“月宫宝盒”，“银汉红墙”等。当时影片既无声响，又是英文字幕，映放时，需请翻译讲解。当时讲解最多，最受观众欢迎的“讲片泰斗”是会员部的主任干事杨怀管。

童子部的“四育运动”

长沙青年会的活动场所，开始是为成人服务的，用于青少年方面的不多。西牌楼会所内，仅有两间小小的房间为年轻人的活动场所。后来觉得与“青年会”牌子太不相称，就租赁了三王街裕商银行一栋旧房屋，将青年中学搬入，同时设置童子部大厅和童子部办公室，后门通西牌楼会所。主持其事者为美国人蓝安石。童子部活动分为德、智、体、群四育。德育主要由中英文查经班，每逢星期三和星期日晚间组织唱诗、读经、祈祷、宣讲活动；智育是设置一些图书杂志，供阅读借读；体育是以乒乓球为主，其余还有象棋、跳子棋、溜台及投环、游戏等；群育主要是开交友会，有时也有游戏。使人从小受到基督教影响。参加的人大都是青年中学及英文夜校的学生，有时也邀请外校的学生参加。主要利用青年中学下课后及英文夜校上课前的业余时间展开活动。后来又组织了童子养成团，并派代表参加了1923年全国协会在庐山牯岭举行的全国基督教学生夏令会和是年10月在广州举行的青年会第九届全国大会。使他们“增加印象，服膺教义”。

职工部的“劳工运动”

1920年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长相继成立。湖南工业学校毕业生黄爱、庞人铨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继而组织了湖南劳工会，社会上出现了各种思潮。针对这种情况，青年会组织“劳工运动”成立社会服务部，任张登瀛

为干事。1922年夏，张因故去职，社会服务部改为职工部，调刘岷庵、张子谋为干事，设职工日校和夜校，刘张二人负责轮流值班。

职工教育：从1922年至1926年秋止，每4个月办一期，每期分4个班。学习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基尔特主义、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等，随学生自由选择。

1921年，长沙青年会社会服务部工作有：开展劳工演讲活动，组织平民小学同乐会、码头挑夫同乐会、车轿夫同乐会，参加听讲。讲题有：“贫穷的原因”、“工人经济与教育”、“劳工界精神生活在哪里”等。此外还成立了平民女校，设工人读书会，组织工人参观贫民工艺厂、孤儿院及习艺所等。

1922年职工部工作还是进行德、智、体、群四育活动。德育演讲题目有：“天国禧年”、“互助”、“耶稣的资本观”、“耶稣的事迹”、“圣诞与人类的关系”。智育工作是成立工余夜校，功课有国文、算术、谈话、科学常识、英文、体操等。并讲演“工人读书问题”、“服从与反抗”、“女工应有的觉悟”、“旧社会与新社会的比较”、“劳工神圣”、“罢工的利害”、“劳工法案”等。体育工作有体育练习班，举行卫生演讲，爬山，检查工人体格。群育工作是在工余学校组织学友会，由学生自搞讲演、游艺，举行各工团职工联谊会等。

举办平民教育

1922年春，全国协会以长沙为“平民教育试验区”，派干事晏阳初来湘，商请长沙青年会协助筹办。长沙青年会欣然从命，借长沙各小塾教室，招收学生一千名，分为100个班，免费供给灯油、书籍等用品。副总干事谭信一为校长，干事彭泽电为教务主任，教员每月津贴费4元。秋季续办90个班，两期共计费用7000余元。后又得到热心平民教育人士所捐经费，以至

1927年春季，尚有75个班，前后在长沙各小学和祠堂庙宇附设平民学校200余所。课程是识1000字，叫做“千字课本”，同时配合宗教教育。这些平民学校，直到1927年才停办。

“新会所”之筹设与落成

1919年，长沙青年会因各部“事工发达”，又感房屋不敷应用，即谋建一宽敞完善的新会所。是年秋搞募捐购地，聂云台、聂其焜两兄弟，以聂崇德堂名义，首捐光洋1万元，以示支持。继之各界人士捐助光洋4万元。旋由明德学校胡元侠介绍，价购黄一欧先生的大四方塘地皮一块，计883方丈有余，计业价光洋4万元。但正要交接地皮时，省会警察厅长佟国安出面阻止，说此地是湖南省政府划给警察厅作建设公娼地址用的，并以此为由，侵占了这块地皮。1920年，张敬尧被驱逐后，谭延闿回湘主政（谭是联名向全国协会请求派人来湘设立城市基督教青年会发起人之一），于是确定此地归还长沙青年会管业。

1921年，着手拆迁工作。西北两方塘壩，有民房20余栋，计173户，住户都不愿意搬走，青年会只好用高价收买劝其拆搬。其余地面是水塘，渐次用灰渣填平。拆迁工作完成后，开始建筑围墙，按照当时规定，四周让街7.5尺，围墙从青年会东测门算起，东起延寿街，南径吕祖巷，西通藩城堤的王家坪、何家坪直至鸡鸭巷口，北出总佛街，复回到东边一路吉祥止，接壤几条大街小巷。平整地面时，探测基土深浅不一，经基建专家数月研究后，方确定建筑方定。

1923年春，全国协会向北美协会请得建筑费10万美金，夏义可向挪威友人集得12.5万美金，合计约光洋25万元，捐得建筑款后，马上组织建筑委员会，会计为雅礼学校校长张福良，协会聘请工程师来湘督修，工程由黄绍田营造厂承包，于秋季

2. 整个建筑预算约需光洋30万元。

1924年6月,新会所举行奠基典礼。在典礼仪式上,将会所从开始筹备时起至西牌楼“全盛”时代各项“事工”暨筹建新会所经过,写成册页,用石盒装了,埋在进门右首第一个基柱内。

1926年10月10日,长沙青年会新会所举行了落成典礼。长沙军、政、教、农、工、商负责人都来祝贺。唐生智亦派民政厅长冯天柱前来赠“嘉宾云集,盛会空前”颂词一副。

新会所由延寿街东侧门进入甬道左边是绿茵满地,树木葱茏的花园,另一边是露天电影场,后来兼作网球场及篮球赛场。右边座北朝南是巍然矗立的大厦。前面凉台的正中嵌着青年会会徽,两端墙壁上,有谭延闿直书的“长沙基督教成人部”及“长沙基督教青年会童子部”两块金字招牌。由成人部玻璃门入内是水磨石地面的大交谊室,设立了阅报大厅,从大厅尽头左转进去是图书室,壁橱内摆满了图书杂志,大都是上海广学书局出版的。此外,新会所里还设有总干部、少年部、童子部、体育部、会员部、办公室,有健身房、弹子房、游泳池、中西餐厅、小礼堂和20余间宿舍等。新会所室内墙上,挂了许多国内当代书画名家的字画。最引人注目的有孙中山先生书写的“博爱”及“礼记大同篇”、梁启超写的“小心翼翼,昭事上帝”、齐白石的葫芦瓜,上面书“葫芦瓜、葫芦瓜,葫芦开口笑哈哈,自从结蕊紫新蒂,会向人间斗岁华”,礼堂讲台两侧是熊希龄书对联“人无论东西,但博爱大同,都是皇穹赤子;学岂分新旧,愿乐群敬业,勿愧模范青年。”。

参加抗战活动*

长沙基督教青年会在抗战期间,曾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慰问伤病员,举办时事讲演会、讨论会,出墙报、黑板报,教唱抗日革命歌曲等活动,最受群众欢迎和拥护的有这样

几件事：

1.请徐特立先生作公开演讲。1937年7月，芦沟桥事件爆发，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在此形势下，长沙青年会通过北京的同学与地下党联系，约请徐特立来长沙演讲。讲演那天，青年会礼堂坐无虚席，连走道窗户上都站满了人。徐老慷慨激昂的说：“不团结抗日，就不能求得民族的生存。我们的抗战一定要经历很多艰难曲折，但我们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徐老的演讲激动人心，会场不时爆发出一阵阵掌声。

2.请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作报告。史沫特莱是《伟大的道路》一书作者，她一直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事业。1937年来中国后，她发表了许多声援抗战的讲话和新闻报导。当她来长作报告后，群众深受振奋。会后还有许多人找她谈话，向她提问题，史沫特莱都一一作答。

3.组织市民救护队。抗战爆发以后，青年会组织了担架队，有10多付担架。1937年11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日寇飞机突然窜入市区，丢下的炸弹落在火车站不远的地方，炸塌了好几栋房屋，等日机离去后，青年会担架队20多人带着铲锄和急救包赶赴现场救护（当时参加抢救的还有“新生活运动劳动服务团”救护队）。因初冬天黑较早，电线又被炸断，只得点着火把抢救。一直搞到晚上9点多钟，终于从倒塌的断墙残垣中挖出了几个负伤的居民和一具尸体。

4.协助安置难民。“长沙大火”前后，有几万难民一下子涌到长沙。当时青年会的人员较少，便帮着政府的难民安置机

*《参加抗战活动》与《迎接解放》两部分系本文编者从朱铁零所撰《抗战爆发及解放前夜的长沙基督教青年会》一文中节选的。

物，给难民发放给养，联系车船，再分批将难民送往祁阳、东安等地。

迎 接 解 放

1949年7月，程潜、陈明仁通电起义，为了配合这一行动，地下党决定动员一些社会知名人士联名发出一个拥护起义的通电，长沙青年会总干事张以藩毫不犹豫地签了名，并找雅礼中学、福湘中学负责人和几位牧师签了名。随后，青年会与各教会团体、医院商量，决定成立“医院教会团体联谊会”。组织成立后，决定各单位不迁移，不疏散，坚持工作，安定人心。同时，妥善保护好单位的设备、房屋等财产。1949年8月，长沙青年会与省会60多个群众团体一道成立了《长沙市迎接解放联合会》积极投入了迎接解放的运动。

【责任编辑 徐晓吟】

与外国传教士抗争的二三事

徐灵石*

从无神论者到基督教信徒

1910年，我出生在新宁县西乡的烟村（即现高桥乡张姜村）。我的童年，带有浓厚的泥土气味和封建色彩。

旧社会，农民没有“人定胜天”的思想，一切都得服从天意，靠天吃饭。有一年，久晴无雨，旱灾严重，禾苗枯萎，田土龟裂，眼看颗粒无收。农民束手无策，只好请“神”来帮忙。于是蜡烛辉煌，香烟缭绕，大拜木雕泥塑的菩萨。我背着拜菩萨的善男信女，把香炉从供桌香案上推翻下来，闹了大祸。

我的父亲是一个基督的信仰者，我却对崇拜耶稣的基督教不怀好感，对十字架抱仇视态度。因为在学校里听老师讲过，它是紧跟外国侵略者的步伐来中国搞“文化侵略”的，是不背枪杆子的敌人。

1927年，我到新宁县立中学读书。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我被同学们推选为新宁县学生联合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李超，县师学生）。我们唱着：“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到了新宁东乡的白沙镇附近参加“打土豪，除劣绅”活动。首先拿李秋成等劣绅开刀，给他们戴高帽子“游团”……，那时我的名字叫徐生汶。

大革命失败以后，我被追捕，只得托亲赖友介绍到湘乡县，在电报局当收发电报的学徒。这个“衙门”里，上自局长，下至一般职工，大都是吞云吐雾的鸦片烟鬼。他们的生活情趣，我实在看不惯。半年之后，我到了省会长沙。

*徐灵石当时任基督教内地会教师、干事等职。

到长沙后，我进入协均中学读书。协均中学是基督教会的雅礼大学毕业生办的。学校虽未开设《圣经》课程，但学校总带有或多或少的基督色彩。我是协均中学走读生，住在湘春街仁安旅馆，餐宿费用靠父母从新宁老家寄来。真是“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因为双亲对我实行了“经济封锁”。他们总觉得已经“风平浪静”了，要我回家乡去，在他们的膝下，曲尽孝道。但我认为还不是“平安无事”的时候。为了摆脱反动派对我的迫害，我克服了一切困难，于1930年进入了湖南圣经学院。三易寒暑，我终于由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了有神论者，一个虔诚的基督信徒，我的名字也在1929年圣诞节领洗入教时，由我父亲命名为徐灵石。

与外国传教士首次交锋

圣经学院的美国监督及其他外国传教士的住宅区，绿草成茵，万紫千红，玉砌雕栏，另有一番风味。同学们每当课余饭后，多漫步其间，三五成群，谈笑自若，觉得这里别有天地。但好景不常，学院的管理郑咏陶竟在太庭广众向学生宣布：

“禁止任何人在葛监督及其他外国传教士的住宅区散步，”我们听了不免气愤填膺。在中国的土地上没有中国人的自由，这不是丧失了自己的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吗？《圣经》里《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上讲：“自由——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而外国“洋人”不给我们中国人自由，这是炎黄子孙的奇耻大辱，绝不能容忍。我和同学们商讨后，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对外国传教士有损人格的行径表示强烈的抗议。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与外国传教士交锋。

与德国传教士魏耀生的斗争

1933年，我结束了学生生涯，回到新宁县。我已由学生变

成先生，以教师身分在基督教内地会从事传道工作。当时，新宁内地会的主任牧师，也就是内地会的太上皇，是德国传教士魏福生。他使用方块汉字，改用中国名字，以使中国人觉得他是朋友而不是敌人。

魏福生在讲道时，不止一次地说，中国人坏，坏到极点，他还列举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来说明。我每次听了他这种有损中华民族人格的胡说八道，总觉得不是滋味。有一次，我愤然向魏福生提出质问：《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神的荣耀”，这里并未专指中国人有罪，也包括德国人在内。中国人是有个别坏人，但为数不多。德国人中也有罪人和坏人，如果德国人是好人，是无罪的，那你们就不会信仰基督耶稣了。《圣经》中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救罪人，不是救义人。”你们德国人，必和有病求医一样……他听了面红耳赤，十分难堪。不久，魏福生的妻子难产死了，魏便去武汉，与一位德国教师结婚，在这段时间里，由德国的倪永生牧师代理主任牧师职务。

这时，我年过五旬的姑妈徐联荣也在教会里担任教师，从事女传道工作。她头上蓄有中国传统的“巴巴”发型，每天早晨梳理长发，不免要花去时间，影响工作。她想将长发剪成短发，不再扎“巴巴”。于是找我商量，我认为将长发剪成短发，这与信仰无关，虽然《圣经》上提到犹太人蓄长发，那是他们犹太人的习惯。我们中国人以前也有蓄长发的习惯，不仅女人蓄长发，男人也蓄长发，就是小孩头上也扎成双髻。并不是蓄长发者可进天堂，剪短发必下地狱，因此，我极力支持她剪发。

徐联荣终于将长发剪成短发，梳洗利索，显得更精神了。可是倪永生却深怀恶意地指责她这也不是，那也不该，使她受尽了气。后来，魏福生带着再娶的老婆回到新宁。在倪永生的

支持下，魏福生竟在一次有三四十人参加的集会上，借剪发之事公开责备徐联荣。我挺身而出，严肃地指出：《圣经》里说的蓄长发是与当地的生活习惯有关，与得救不得救是两码事。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人们，各有各的生活习惯，不能强求一律。如《圣经》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节及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节里，提到亲嘴就是“彼此务要圣洁”地吻一吻，外国有这个习惯，但在中国却是男女授受不亲。外国人之间彼此相见时互相握手，而在中国则是鞠躬或作揖拱手。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四至十四节里提到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这是犹太人在客人来到时的习惯，而中国人于客人来到之时，总是款待烟茶。我常去你家，但从未与你爱人亲嘴，你也从未为我洗脚，这不能说我们都违背了经典上的规定。剪短发的事，你这样小题大做，是不尊重中国人独立的人格，是欺侮中国人。开始，我和他坐着讲，后来彼此站起来大声争论，以至动手动脚的要演“全武行”了。由于他理亏，口语堵塞，灰溜溜的收了场。我也挑着被包衣物离开了新宁内地教会。魏福生在我离开以后，到处发电发信，说徐灵石反对外国人，不能共事。后来，魏福生夏天到新宁县城对河的金峰岭避暑。当他返回新宁县城招摇过市时，正在路旁游戏的儿童们一见这黄发碧眼者迎面而来，便有人大嚷：“洋鬼子来了！洋鬼子来了！”一哄而散。魏福生凶神恶煞地拔腿追上去，抓住一个小孩，用自由棍把他打得遍体鳞伤，路人目不忍睹，与之论理，他无词以对，赶快逃回教堂去了。谁知被痛殴的小孩，并非大嚷“洋鬼子来了”的那个，而是虔诚的基督信徒、教会执事陈永千的独生子。这件事在教会里掀起轩然大波。教友马有德，大字小楷写得很不错，文章也做得挺好，大打抱不平，写了一篇有关这场事件真相的文章登在《新宁民报》上，又剪下这篇文章，控诉到湖南内地总会。内地总会在社会舆论面前不得不作出魏福

生“人地不宜”的结论，将其撤职。就这样，魏福生夹着尾巴滚回德国去了。

我离开新宁内地会后，回到家乡，闲居半年，心里打算去南京。当时我的十一叔徐昆在中央军官学校任练习营营长，我想到南京弄得个一官半职，借以糊口。1934年冬天，我与圣经学院的同学，后在攸县教会工作的刘慧清女士订婚了，此时，我五叔徐最五，反对我去南京。这位虔诚的基督信徒说我去南京是学非所用。经圣经学院教务长肖暮光的介绍，我第二次来到了湘乡，在布道三队担任干事（实际是队长）。1935年春天，到石柱塘、大育墩一带传播福音。暑假后，我接沅陵孙集五牧师的函召，到溆浦县教会工作。从1935年到1944年的10年岁月里，我都在此工作。由于外国传教士都住在沅陵，而湘西一带，土匪颇多，所以很少到溆浦来，即使来了，当天到第二天就走，逗留的时间很短。因此，我和外国传教士直接接触不多。

与德国女教士梅道荣的斗争

1944年夏天，我由溆浦转到了武冈县教会工作。当时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已踏入新宁（新宁与武冈相距仅九十华里），日军由新宁进犯武冈，朝发夕至，武冈岌岌可危。在武冈的德国女士梅道荣一见不妙，带着细软逃到重庆歌乐山去了。

梅道荣逃走后，我一人守住教堂，使教堂设施没有受到破坏。当时，教会无经费来源，教友们便组织董事会，以自治、自养、自传的形式，共同设法。董事长是仁慈医院院长钟吟秋，我作为教会工作人员，每月只得两担大米工资，维持八口之家的生活。当时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但我还是一片忠心为教会工作。

日本投降后，梅道荣由重庆回到武冈。我主动让出四间房屋供她一人使用，而我全家八口人挤在另外四间房子里。梅道荣

是德国人，与意大利、日本，同是战败国的侵略者。而她却贪得无厌，强迫我将所住的四间房屋都给她。这时，我重温《圣经》，在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四节至三十五节里说：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教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认为梅道荣这样的人，横蛮不讲理，没有彼此相爱之心，我宁可饿死，也不能与她为伍，于是决定不干了。当时孩子们正在读书，只好寄居到亲戚朋友家里。我和刘慧清回到故乡。

我在农村住了一段时间，精神上、物质上、特别是经济上的压力是很重的。“八年抗战”，虽未效命疆场，也弄得“九死一生”，十分悲惨了。我决定外出找点工作。当时我的胞弟徐生洪在衡阳江东岸车站工作，他知道我的苦衷，给我出了一个点子，由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从铁路部门搞张免费乘车证，让我往来于衡阳广州之间做做生意（“跑单帮”），自可大捞油水的。可是我这个“书生意气”的人，从不通生意经，经商是个门外汉。趁他出差去长沙的机会，又结伴到了长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在长沙遇到了侯子云。他这时正在长沙市东牌楼遵道会监督办公室任秘书。他知道我和外国传教士闹翻了，在长沙难有容身之处，便要我去溆浦大江口。

我第二次去溆浦正是1948年的三九天。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突破天堑长江，溆浦解放，指日可待了。外国传道士在这紧要关头，忙于逃命。教会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在此情况下，我只好回到武冈。

武冈的教友对我非常关心，安排我住在教室前栋的几间房子里。真是冤家路窄，那个德国女教师梅道荣正巧住在教堂后栋。前栋无井，取水必须到后栋去，但前后之间有一道门，梅道荣紧闭不开，不让我挑水。我严厉指责梅道荣，基督教讲仁

爱，信徒“彼此相爱”，还要爱众人，“爱人如己”，这些在马太福音廿二章三十六至四十节说得清清楚楚，“十条诫命”概括成一个爱字：爱神、爱人、爱仇敌。这在路加福音六章廿七节里也说得明明白白，你身为基督的门徒，却连井水都不让人挑，你的爱心在哪里？我说得她张口结舌，难以自容。

1949年，中国人民迎了解放。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作威作福，愚弄人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解放后，我接到侯子云的信，第三次去湘乡在基督教会担任司牧师职务，直至现在。

【责任编辑 徐晓吟】

我的从教生活纪略

李 雍 吾

入“雅礼”教会中学求学

1916年我出生于湖南永兴县一个基督教家庭。1920年我父亲考入长沙圣经学院，毕业后成为传教士，从此，我全家信奉基督教了。

我五岁即入学就读，先入本圩英才小学，1927年秋天，小学毕业后，到永兴县城投考初中，因学校停学，我只好回乡务农，帮助料理家务。1928年9月底，我得知长沙“雅礼”教会中学招生，经衡阳基督教会介绍准备报考，谁知“雅礼”早已开学。1929年6月，“雅礼”寄卷到衡阳考试，我终于被录取。年底，我即在长沙城内北门基督教会接受洗礼，正式成为基督徒。

当时的“雅礼”，是美国雅礼学会在湖南主办的教会学校，与普通中学相比，自有其特色，一是读书多为富家子弟，学费昂贵，每期学膳等费近90块光洋。二是每日有早祷或晚祷，星期天做礼拜。三是高中课程有一部分用英文授课，英语教师大多是美国人。四是管理严格，全校学生不论远近，都要求在教寄读。我在“雅礼”6年，只回永兴3次，其余时间，除了搞勤工俭学外，便是帮助教会做些工作。其时，学校有个基督教青年会，我义务帮他们做查经布道，组织教徒开展宗教活动，开办平民识字班等工作。

1935年，我高中毕业后投考了美国教会主办的华中大学，攻读化学专业。刚读了2年，就因病休学了。1939年，国土焦

论，我面对这战乱不安的生活环境，感到悲观失望。我这基督徒便把心灵完全交托给上帝，为国家和民族而祈祷，相信上帝能普救众生。就这样，走上了专门从事教会工作的道路。我决心做一个诚实的基督徒，按照《圣经》的教义来约束自己。

当时郴州有一个布道团，我随同他们去各地传教、讲经、布道，这样工作到1940年。这年秋，经湖南中华基督教会推荐，入华西神学院学习。1944年，我从该院毕业后，又投考了当时由南京搬迁到成都的金陵神学院读研究科。1946年秋，抗战结束，学院返回南京，第二年春，我在南京毕业。

在湘的传教生活

1947年秋，我在金陵神学院将要毕业之际，从燕京宗教学院来了一位外国教师。他请我赴燕京教课，并许诺工作2年后让我留美。我认为自己作为一个专职传教者，应回湖南发展乡村教会。于是我谢绝了这位外国教师的邀请，毕业后即到湖南衡阳的农村教会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我经常往返于衡县、耒阳、常宁、衡山等地农村，发展信徒，开展讲经布道等各项活动，使当时衡阳一带农村教会的工作大有起色。1948年1月，我来到长沙中华基督教会的永恒堂担任牧师工作。

同年秋天，湖南中华基督教会总干事、美国传教士郝来法回美，我被推举担任代理总干事。1949年6月，中华基督教会湖南大会第三届代表会议正式选举我为湖南中华基督教会总干事。湖南中华基督教会下面有循道会、信义会、圣公会、内地会、浸信会、圣洁会、宣道会、自立福音会、青年会、真耶稣教会等许多派别和教会组织。说起教会工作，一般人认为这只是一种传教工作。殊不知教会正是通过宣传教义，主持宗教仪礼，来从事有关文化、慈善、福利等方面的工作。如湖南中华基督

致会就与美国长老善会、复新善会、遵道善会合作，在长沙、湘潭、株洲、醴陵、湘乡、衡阳、耒阳、安仁、茶陵、攸县、常宁、郴县、永兴、桂阳、资兴、临武、蓝山、嘉禾、宜章、岳阳、临湘、南县、华容、常德、桃源、沅陵、泸溪、辰溪、溆浦、保靖、乾城、花垣、永顺及贵州省的铜仁、江口等30多个市县设有大小教堂189处。除此之外，还拥有长沙的雅礼中学（与美国雅礼会、英国循道会合办）和福湘女子中学、衡阳的广德中学、醴陵的遵道中学、岳阳的湖滨中学和贞信女子中学、沅陵的朝阳中学和贞德女子中学、湘潭的惠景护士学校以及贵州铜仁的明德中学共10所学校。医院有湘潭的惠景医院、衡阳的仁济医院、郴县的惠爱医院、醴陵的遵道医院、岳阳的普济医院、常德的广德医院、沅陵的宏恩医院和贵州铜仁的遵道医院共8家。这些医院和学校，为国家培养了许多有用之才。一般人在教徒的影响和启发下，信奉耶稣基督后，还需明白教义，参加教会的各类活动，经过教会1年以上的考查，认为合格再进行洗礼。洗礼有2种：一种叫浸礼，教堂都设有浸池，教师将受礼人的头在浸池里按几下。二种叫洗礼，受洗时，信徒跪在地上，由牧师将水点在头上。无论洗礼、浸礼，受礼人都要明白《圣经》，并遵守诫命。

作为宗教，设有各种神职，即执事、长老、教师、牧师、主教。除长老、执事是从信徒中选出外，教师、牧师和主教，必须是神学院毕业，并在教会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传教者，经信徒同意和教会推荐，教会领导机构通过后才能担任，成为专职的神职人员，终生从事神职工作。

参加教会“三自”爱国运动

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长沙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城，基督教会也成立了迎解团。在当时的情况下，很多

教徒对共产党缺乏认识,有的人害怕共产党,听了反动宣传后,跑往国外。当时我在思想上虽然存在一些模糊认识,但在去与留的问题上,我坚信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允许宗教存在的。于是我带头宣传共产党安国安民的有关政策,使多数基督徒从思想上对党有了新的认识。1950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1号文件,号召各宗教团体割断与外国教会在经济上和组织上的联系。我们响应党的号召,从1950年1月起宣布拒绝接受外国教会津贴。建国初期,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生活条件是相当艰苦的。教会工作人员每月只有6—18块的生活补助费,但大家工作积极性很高,做到既爱国又爱教,希望多一个基督教徒,就多一个遵法守纪的好公民。

1950年9月,中国基督教发表了“三自”爱国运动宣言,决心走“三自”爱国的道路。所谓“三自”就是中国基督信徒自己办理教会,经费由自己解决,自己传教。这个运动发起后,得到了我国广大信徒的拥护,很快在全国各地的教会开展。

过去中国教会由于外国教会传入时宗派甚多,通过“三自”爱国运动,所有各教派都联合起来,团结起来,组成中国基督教会,这在世界基督教运动中是未有过的。通过“三自”爱国运动,一般信徒都为信教而来,教会得到了纯洁,信徒人数不断增加。解放前全国基督教信徒只有70万人,现增加到300余万,湖南近3万人,各地、市、县教会亦都相继得到了恢复。

十年动乱过去,党和政府恢复了我在宗教界的工作,担任了湖南省“三自”爱国委员会主席、全国基督教常务委员等职务,并被选为市政协常委、省政协委员。我与教会同仁一道深入到全省各县、市,鼓励信徒,坚决走爱国爱教的“三自”道路。为发展我国宗教事业作出新的贡献。(晓旦整理)

【责任编辑 徐晓吟】

我的佛门生涯

戒 圆*

我从14岁出家为僧，至今已48个春秋。我的一生基本上是在佛门度过的。现将一些片断经历，记述于后。

出家前后

我1926年9月出生在湘潭县孙湖塘，我的童年是在这里度过的。父母生我兄弟6人，我排行老大，俗名王球。

1937年抗战兴起，国民党军队驻扎在我伯父的庙里，那时我方13岁，亲眼见到那些逃兵被抓回来后打得死去活来的情景，便对当兵很畏惧。由于我兄弟多，家里又无钱“买壮丁”，所以产生了出家当和尚的念头。第二年，征得父母的同意，到湘潭县西禅寺出家，住在雨湖路的长寿亭送子观音阁。

当时，由于年纪小，虽当上了和尚，并未正式受戒。

我的剃度师傅，叫出淤和尚，“有出淤泥而不染”的意思，他的法号叫觉悟，但他不注重学问，每天只念经拜佛，为父母和自身的解脱忏悔。我除做一些清扫和零星事外，也跟着“念经拜佛”打发时光。三年学徒生涯，是在愚昧和无知中度过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对历史产生了兴趣，经常看一些有关的历史书籍。在这寺庙——安定的绿洲，算是免除了“抽壮丁”之苦，家里也不再过问我的生活了。

当和尚是要受戒的，受戒时，除学习戒条外，还要剃光

*戒圆，俗名王球，建国前先后在南岳大善寺、长沙开福寺任书记，现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湖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

头，深夜，在脑门心上烧“九个香疤”，以显示自己正式受戒出家当和尚的诚心。烧香疤是要忍受肉体上的痛苦的。我受戒是在1943年9月，那年我刚好18岁，法号叫戒圆。戒圆就是表示“戒德圆满”的意思。

记得和我同拜一位师傅的师兄，他叫修圆，比我书读得多。不仅写得一手好字，文章也写得不错，还会打算盘，我羡慕他，也尊重他。有一次，师傅把他叫来说：“修圆，易俗河的郭温良欠了我们寺院50块光洋，现年关在即，你写一封信催他还给我们。”修圆却带着讥讽的口气说：“我不写，请你的得意弟子贵少爷写吧！”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明明你比我强，为什么要捉弄我呢？

没隔多久，有个叫黎涤尘的教师在湘潭办起了业余文化夜校，招收30多名学生，我便报名参加了。我们的课题是应用文。有一次，老师出一题：湘潭晋一巷路灯坏了，向湘潭电灯公司打个报告，要求他们进行修理。我根据要求写了一个报告，其中有这么一句：“深恐二头相撞”。老师阅后，把它作为了病句，还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这家伙，其愚不可及也。”我听了也非常恼火。后来，有的同学一见了我便笑着说：

“‘二头相撞’，你到哪里去？！”

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我一直把它作为学习提高文化的动力，没隔好久，我的师傅又请了一个叫王梅羹的老师，教我们读古书，每天坚持学两个小时，读《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从此，我对古文和唐诗发生了兴趣，一边读书，一边练习写文章，也学习写旧体诗。后来，又读到南岳一个叫补奇和尚送给的五本《狮子吼》月刊。通过两年的努力，便掌握了写文章和写旧体诗的基本技能，也能读一般的佛经，并能有所理解。

戒期作客

1945年秋，西禅寺住持祇修和尚（我的师伯公）到长沙县坪塘桐溪寺担任住持，在护法居士的资助下，决定在寺内开期传戒。我在这年冬初，从湘潭来到桐溪寺做客，这里是一个较大的佛教丛林，闻说传戒，不少善男信女前来求戒，他们在此受戒后，取得了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所谓佛门四众弟子的合法身份。

主持戒坛者，有“三师七证”，三师是传戒和尚，羯磨和尚，教授和尚，都是负责传受戒法的大和尚。七证是负责证明的七个和尚，叫做尊证和尚。此外，东边有“开堂”一人，又叫开导师，俗称大师傅，西边有“陪堂”一人，又叫训导师，俗称二师傅。其余不论多少，统称引礼师，其中第一名俗称三师傅，余叫四师傅。此外，还有衣钵师、侍者师、值坛师等，这就是开期传戒不可少的执事名称。还有经常性的寺院执事，如都监、监院（俗称当家师）、知客、僧值、书记、维那、典座、副寺等八大执事及其他小执事，也要配合一起活动。由于人手不够，又补充一些临时性的寺院执事，大多是在与传戒和尚有关系而又熟悉和受器重的人中挑选。我因师伯公祇修和尚的关系，也被指定为临时书记。

传戒时间持续约一个月，每次开期传戒，大小执事至少五六十人。新受戒者，每人要缴纳戒费银洋4元，每人发戒牒一张，最引人注目的是“烧香疤”，凡新受比丘、比丘尼戒的人，每人头顶上都要贴上已焙熟了的药物和香粉混合物做成的坭，然后举火燃烧约三分钟。香疤颗数不一，有三、六、九、十二颗之分，烧多少个由受戒者自己选择。烧香疤者，各人吃黄豆稀饭一碗，其目的是让伤处日后发烂，过两个月后，每人头上就出现一块没有头发的白点，这就是“戒疤”。受戒一般是在深夜11时以后进行。进行时，鸣钟击鼓，受戒者和执事异

口同声地唱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既严肃又虔诚，出家人甘愿承受烧香疤的短暂痛苦，而进入佛门。此一习惯经学者考证，是在我国元代形成的，凡汉僧受戒，皆要进行烧香疤的活动，既表示诚心受戒，又表示与藏族僧侣有所区别。

寺院执事

这次我到长沙县桐溪寺作客，由于担任临时执事，不仅了解到关于传戒的程序，还结识了一位青年和尚自智，两人谈得很投机，他很诚恳地对我说：你年纪轻轻，老在小庙里专做“经忏”，把宝贵的时光浪费了，不如到南岳各大丛林里去，那里办了佛学讲习所。后来他回去了，我也未贸然到南岳去，因为那里是号称：“天下南岳”的地方，寺庙众多，我人地生疏，也不知道投奔哪个寺庙好。

时间过得真快，又过了两年，到了1947年梅花开放的时候，自智法师给我写了一封信，要我去南岳，我非常高兴。当即向师傅陈述，他不同意我离开，后来我又找到师伯法慧师，他非常支持我，当即给了我两块大洋作旅费。我乘车到了南岳的大善寺，寺里办了佛学讲习所，所长是方丈熹谷法师，他见我能说会写，便叫我在大善寺里担任书记兼大善佛子讲习所管理员。

熹谷法师同知客盛量矛盾很大，他诬称知客企图杀害方丈，因此，盛量被关押起来，准备充军。明真法师站出来坚决反对这样做，我也感到气愤，后来自智普陀邀我和学生一起起来，写快邮代电，通电全国。长沙的《中央日报》报道了这一事件，迫于舆论，盛量被保释出来，这事也就了结。

这年6月，国民党政府要到和尚庙里征壮丁。当时衡山有祝圣、大善、南台、福严、上封、清凉寺等所谓“衡山六大丛林”。祝圣寺办了“南岳佛学讲习所”，南台寺办了“南岳佛学

研究社”，大善寺办了“大善佛学讲习所”，整个南岳僧侣约有400人，其中青年僧侣约100人，在明真、暮笏等法师的倡导下，组成了湘桂僧青年联合请愿团，发表宣言，反对征壮丁，我也签了名。请愿书刚一散发，南岳各寺庙里所有的青年和尚全都走光了，我也回到了湘潭自己的庙里，躲藏起来，一躲就是三个多月，待到征壮丁的事平息后，我于9月奉熏谷法师之命，又回到了南岳大善寺，这时，正好赶上开期传戒，仍然委任我担任书记。

当时南岳著名高僧只有二人，一个叫灵涛法师（1889—1950年）号忻东，湘乡人，著有《摄大乘论髓录》、《因明入正理论髓录》两书；一个叫明真法师，1902年生，湖北荆门人，经常在《海潮音》、《弘化月刊》等佛教刊物上发表文章。这两位法师，精通佛学，淡于名利，最受僧侣尊敬。

同年12月底戒期完毕，我离开大善寺，和自智法师一块进入了长沙开福寺，我仍任书记。不久，由悟性和尚等人发起创办了“湖南佛学讲习所”，招收学生30人，授以佛学，也有文化基础课。悟性和尚任所长，大定任事务主任，自智任教务主任，我担任了国文、历史老师，边教边学，教学相长。讲习所一共办了二期，后因监院（俗称当家师）易人，经费无着，宣布解散。这一段时间里，我除教书外，也写了《略谈佛陀生卒之年代》、《湖南佛学讲习所的现状及其展望》等文。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大军南下，武汉告急，长沙吃紧，开福寺也换了当家师，此人叫瑞智，他反对大定（现为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办讲习所，我自然也站不住脚了，于是，又回到了出家为僧的地方——送子观音阁，闲居在那里无事可做，每天靠读书打发时光。

生产自养

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9月的一天，我获悉佛门大

德巨赞法师（曾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当上了全国第一届政协委员，参与国家议政，并代表我们僧尼说话。年底我再次进入长沙。次年3月我和自智两人迁居船山学社，拜社长周木崖先生为老师，请他教我们《诗经》和做旧体诗。并在船山学社群众识字班兼课。4月，自智法师当选为长沙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市政府决定组织长沙市地方财务整理委员会，下设若干工作组，聘请博明、自智担任佛教寺庵产款整理工作组组长、副组长，我被聘为组员，参与寺庵财产的整理工作。1951年又组织了长沙市僧众生产合作社，我任理事主任，在抗美援朝中，我们僧尼两众又参加了群众性的宣传、游行活动。我当时还被选为长沙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并担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长沙市分会执行委员。1952年秋，开福寺恢复，我当知客（八大执事之一），同时筹建长沙市佛教工作委员会（佛教协会前身），我担任副主任委员。同年底，长沙市尼众生产合作社与僧众社合并改为长沙市第一染织生产合作社，先是明清、定云两人先后担任理事主任，1954年10月由我兼任该社理事主任，直到1956年8月。后赴京学习。

1960年7月1日，我担任了长沙市手工业联社第五织布厂厂长，尔后，又几易其厂名——1961年7月改为长沙市手工业联社长沙织布社，我又任理事主任。1964年改为长沙市碧湖织布生产合作社，1966年改为市四新织布厂（1971年1月合并为立新织布厂）。到1968年9月止，我都担任主任或者厂长，至此，长沙市的出家佛教徒都各得其所，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靠自己的劳动维持各自的生计。在十年动乱中，我不仅被免除了主任、厂长的职务，还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直到文革后期，才基本解脱，复出任立新织布厂的副主任、副厂长，“文革”中，不仅佛像作为四旧被破除，整个开福寺里的殿堂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里边一切宗教设施荡然无存，我作为佛教徒而且

担任过寺院执事，不免感慨系之。

唯一的寄托是和僧尼一道把生产搞好。当时，寺宇成了厂房和宿舍，停止对外开放，除掉机声轧轧以外，听不到晨钟暮鼓，也听不到木鱼声声，寺院荒凉，僧徒星散，颇有些“今非昔比”之感。

京 华 深 造

我因家境清贫，只读几年旧书，进入佛门之后，边教边学，文化知识和佛学知识均有一些提高，但自己并未满足。1956年8月，中国佛教协会决定在北京办一所中国佛学院，以提高佛教中青年僧人的佛教理论水平。解放前，长沙市有“八大丛林”（即万寿寺、上林寺、开福寺、宝宁寺、桐溪寺、果山寺、灵云寺、华林寺），这八大寺院是比丘丛。此外，护国寺也算一个新兴的丛林，加上小寺庙30余处，僧尼不少。当时佛教团体有“中国佛教会湖南省分会”，“中国佛教会湖南省长沙市支会”，“中国佛教会湖南长沙县支会”。八大丛林联合举办了一所“湖南佛教慈儿院”，收容孤儿100名，授以初等教育，开福寺还办了一个“湖南佛学讲习所”，我在该所任教。为此，我得以有机会进北京中国佛学院深造。

中国佛学院院址，设在北京宣武门外的教子胡同附近法源寺内。我是1956年9月24日报到的，被分配在本科班学习。我们班有两个同学佛学根底很好，一个是贵州的明照法师，另一个是上海的常净法师，他们对我的帮助较大，我也虚心向他们学习。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的佛教理论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我认为佛学从整个思想体系来说是唯心的，但某些论点也有唯物的成分。于是写了一篇《舍利弗的生活及其意处属色阴说的特点》，在《现代佛学》上发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佛学院副院长巨赞曾赞扬说：戒圆进步很快，过去只能写通讯，现

在能写佛学论文了。

1957年整风运动中，学院出了一道讨论题：佛学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我认为佛学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当时，学院组织上百人对我进行批驳。辩论的结果，认为佛教徒通过改造，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不久，我们100多名佛学院的学生参加了十三陵水库的劳动，我因患肺病，未能参加，教务长关松把我叫去：戒圆，给你一个任务，写一篇文章。我根据总结写了一篇《一队出家健儿战斗在十三陵水库工地上》的通讯，在刊物上公开发表了。后因肺病，只读了两年书，便于1958年8月20日回到长沙开福寺。回来后仍任市佛教协会副会长。我现在在佛学上的基础，都是在两年佛学院的学习中打下的。建国后我在中央和省市各种刊物上，先后发了52篇文章。主要著作有：《舍利弗的生活及其意处属色阴说的特点》、《读“法乐毗丘尼经”》、《试论大乘佛教对于“真如”的不同看法》、《中国僧徒劳动生产史初探》、《沩山密印寺史略》等，在佛教界产生一定的影响。

古寺重光

我从佛学院回到开福寺，便再没有离开了，可以说四十个春秋，基本上是在开福寺度过的。

1973年9月，政府任命我为长沙市立新织布厂革委会副主任，后改任副厂长，直到1985年12月退休止。在这段时间里，我担任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工作，并从1979年9月起开始参加《湖南省志·宗教志》的编写工作，到1983年完成《湖南省志·宗教志·佛教篇》第二稿约30万字，是我和我的老师明真法师合作编写的。1986年又为《长沙市志·宗教志》写了7万字的初稿。

1980年开福寺恢复宗教活动，我任开福寺寺务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着手考虑恢复开福寺的本来面貌，从80年代初

期到中期，通过多次报告和在各种会议上呼吁修缮，通过中国佛教协会工作的净慧法师向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反映，以及向省、市各级领导要求，终于先后拨款42万元，并通过化缘和佛教协会节余以及功德箱的收入，陆续恢复了三大殿（前殿——弥勒殿；中殿——大雄宝殿；后殿——毗卢殿），并恢复了29尊大小菩萨，加修了红色围墙和山门，使土地面积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的活动场地，回归开福寺管理，而且使其面貌焕然一新，于1987年7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现在开福寺除老年僧尼外，又培养了一批年青僧人，共有僧侣50余人，生活来源，老者凭退休金，新人发生活费，并开始了正常的宗教活动，早晚上殿，中午上供，菩萨诞辰举行佛事，现寺院显得庄严、肃穆、宁静、清洁，佛教徒们在这里过着清静无为的佛家生活，没有其他干扰，古寺重光今胜昔。

我也于1986年1月到武汉归元寺重新受戒，并在受戒前写下冠用“戒圆”对联，以铭胸臆：其联如下：

戒德有亏随世俗；

圆融无碍证菩提。

我现在虽已年近古稀，仍担任湖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长沙市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理事、长沙市政协常委、湖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等职。我一定尽一个出家佛教徒的绵薄之力，牢记自己的戒行，将自己的余热贡献给人民和佛教事业，作开福寺内丛生的芭蕉树上的一叶芭蕉：

几树芭蕉对月生，争妍竞俏似含情。

人间最爱天然美，叶叶风摇叶叶轻。

（王俞 整理）

【责任编辑 朴永子】

李仁山阿訇传略

李子厚* 马文彬

(一)

李仁山阿訇，又名先慈，回族，湖南常德人。生于1881年，1939年农历七月十六日病逝，终年59岁，定葬于常德县前乡夹溪岭。

其父李远法，母方氏，生一女四子，前二子早夭，先慈行三，弟名先开，字庚卿。其父原往常德前乡西庄坪(李族村庄)，后迁往常德城东门沙河街(现名民族街)，在码头做工，后改作牛肉小商贩。由于家境贫寒，仁山无钱上学，弟先开仅读私塾两年。

当时，常德回族中有较殷富且热心宗教事业者，为培养阿訇的接班人，愿资助川资，选定数名回族青年赴河南、西北念书，以攻读阿拉伯文、古兰经及伊斯兰教典教律。仁山和另几位青年被选中，于1901年接受资助前往。他一人赴西北，其余几人均就读于河南。仁山到甘肃河州果园清真寺，聆教于该寺经堂哈志门下。哈志(系阿拉伯语意)是一位曾赴圣地麦加朝觐，完成“五功”(即命、礼、斋、课、朝)，精通古兰经典及伊斯兰教旨义、教律，德高望重、品学兼优的大阿訇、大学者。仁山在甘肃苦学十年，学成后，由果园清真寺经堂授予阿訇称号。

1911年初返回常德，不久，娶妻黄氏。婚后在沙河街租屋开豆腐坊谋生。不久，受聘于常德县阳山马家湾清真寺，任“依玛姆”(教长)，后又受聘于常德清真古寺，任教长。数年后，

*李子厚系李仁山之子。

妻不幸病逝，后，续弦邵阳马氏。1921年应上海南市小桃源伊斯兰师范学校之聘，任教务主任。1925年，马氏又不幸病逝。

1928年又应四川万县伊斯兰师范学校聘任教务主任。

1932年，任江苏镇江清真寺教长。同年，常德清真古寺阿訇、乡老等为振兴常德宗教事业及回族教育事业，坚决要求仁山阿訇返回常德，这样，他婉辞了镇江之聘，返回家乡，任清真寺教长，并负责对少数“海里凡”的教学。不久，在他的倡导下，成立了“常德回教教育辅助会”。他和张春山阿訇被选为该会负责人。1934年，又成立了“中国回教公会常德分会”，被选为负责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成立，李仁山阿訇受聘为该会名誉理事。同年，常德也成立了“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常德分会”，他被选为负责人之一。

1938年长沙大火后，因形势所迫，他前往沅陵，后应回民马天常、马天哲、马天伦兄弟之邀全家迁至乾城。

1939年初，日军飞机在常德投了细菌弹，李仁山阿訇与翦质辅先生及其他教友，得悉家乡回民中有些人受细菌感染，且有已亡者。他因惦念家乡亲友、故旧和各乡老等，遂于1939年7月返常。先后到城区阳山、西庄坪、夹溪岭等乡下探望。不幸，他也感染了病疫，到达夹溪岭后得了伤寒病，医治无效，于是年农历七月十六日不幸与世长辞。

(二)

笃信宗教 勤奋求学

他去西北念经求学时，已是青年，从零开始学阿拉伯文、古兰经等，似稍过晚，加上他是汉文盲，且学习内容多，难度较大。在这种情况下，他为了获得“挂幛穿衣”（即取得“阿訇学衔”），除了学习阿拉伯文、波斯文外，还勤奋自学汉文终，于达到了较

高的阅读及表述水平，掌握了阿拉伯文经典、古兰经典、圣训教律的丰富知识，对宗教经典、教义的研究和探讨颇有造诣。自西北同常开豆腐坊后，他每日均去清真寺礼拜。当时，清真西寺聘请一位外省较有名望的罗阿訇任教长。这位教长平时钻研古兰经及其它典籍，遇有疑难处，常于礼拜后留仁山阿訇探讨或请他作些讲解。罗阿訇盛赞仁山阿訇在古兰经典方面的高度水平。他开始担任常德清真古寺教长时，常德回教内部因对宗教某些规章、习俗有看法，认为古兰经没有不吃无鳞鱼的规定和“黑迭也”请阿訇诵念天经不应收费等问题。为此，常德各寺方发展成为以黄声祥阿訇为首的什叶派和以李仁山阿訇为首的逊尼派的派别相争，极为激烈。为了解决两派分争，仁山阿訇引证古兰经典和圣训教律，说服两派人士。同时建议两派选出有名望并善于说理的长者翦春皆、马仿吾等前往县衙请出出面调解。当时县长薛笃弼亲自到清真寺召集两派头面人物，劝说双方以共同尊奉的古兰经典为依据，消除隔阂。后来，仁山阿訇及本派同仁，采取心平气和以理服人的态度，阐述了对宗教某些问题的正确看法，并互相研讨，使两派统一了认识，解决了矛盾，纳入了光明正大的逊尼派的正道。从此，常德各寺方教义兴盛。在仁山阿訇受聘于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后的一段时间内，上述问题在上海回教内部也产生过分歧，抵触最大的是上海浙江路外国清真寺的某些散班的老师傅。由于仁山阿訇引证了古兰经典和圣训教律，使他们消除了内部的争端。

发展宗教 矢志办学

仁山阿訇一生致力于发展宗教事业，广泛传播宗教旨义、教律。1919年，仁山阿訇与常德回族知名人士翦质辅先生倡导，由各寺方协助，成立了“常德回教教育辅助会”，举办业余夜校，仁山阿訇与张春山阿訇编辑出版了初级《回文读本》

全八册，高级《回文读本》全四册。初级读本内容有阿拉伯语基础、回教常识等，成为回文启蒙课本。高级读本的内容有古兰经典要义及圣训教律等。初、高级读本出版九次，1万余册，均采用中、阿文对照编写。阿拉伯文部分，可供识阿拉伯文者而不能讲经者之用；中文部分使具有较高学识，研究教理，而不识阿拉伯文者之用，成为穆斯林必读之物，受到全国各地清真寺教徒的很高评价，风行一时，纷纷函购。现在北京市经书流通处、呼和浩特所出版的《回民常识》，就是在仁山、张春山阿訇合编的《回文读本》基础上编印的。

1921年，他在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担任教务主任时，与上海热心宗教之穆斯林达静轩、石哲夫合办了“振兴经书公司”，影印了古兰经、阿拉伯文语法等书籍。

他不仅编辑出版普通读物，还亲自到各地宣讲“卧尔孜”（圣人及宗教典故）。他宣讲的“卧尔孜”，达到明理、笃信的良好效果。

为了发展宗教事业，他还多方结交，研讨宗教理义。他交往的穆斯林中有不少著名人士。如1938年底，他在湖南乾城居住时，著名数学家翦奎吾老先生曾来他家聊天，翦老对仁山阿訇有关宗教问题上的见解，连连点头称是，仁山阿訇对翦老说：“将来欢迎老先生回到伊斯兰教的道路上来。”翦老回答说：“是呀，是呀！要同来的！‘云无心已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嘛。”当时的军政要人，如宁夏人马福祥（曾任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河北人马良（曾任山东省省长）等都是他的教友。马福祥虔诚信仰伊斯兰教，在上海时，仁山阿訇与他交往甚密，经常在一起磋商宗教典籍。马良信教甚笃，曾出资办济南伊斯兰成达师范学校。

1931年，他与翦质辅先生在常德清真古寺创办了全省第一所伊斯兰中学。在校就读的有常德、益阳、桃源、邵阳等地学

生60多人。学杂费、伙食费一律由清真古寺供给。学生分甲、乙、丙三个班次。所学课目以阿拉伯文为主，亦学各种学科，1933年因遭水灾而停办。他除了亲自创办学校外，还多次资助乡村办学。1934年，常德县西庄坪李族村没有学校，为了帮助李族村办起学校，他为当地清真寺请来中年阿訇担任教长并兼办学校。同时，他又用自己多年的积蓄在当地购置水田八亩，交由本族李先儒耕种，将全部收益交西庄坪清真寺作为办学经费。这样，西庄坪在各方面的资助下，办起了小学校。

1921年由翦质辅（常德市清真寺董事长）创办的常德清真私立务本小学，免收学费，使回、汉贫苦子弟有了入学的机会。当时该校的校歌是“阳山毓秀，玉带凌霄，英气壮东郊。莘莘学子，总角垂髫，联席共冶陶。学科研究，经典推敲，昌明兮吾教。义勇勤朴，穆民素照，勛勉兮吾曹。”该校是当时办得最出色的学校之一。1931年该校遭水灾，为了修复校舍，仁山阿訇不辞辛劳，奔走于上海、南京一带募捐。在上海时，京剧界名艺人、回族教胞马连良先生听到仁山阿訇为修复校舍募捐的情况后，当即挂牌义演，将义演所得银圆300多元全部捐献给常德清真寺修复校舍之用。1933年该校又遭水灾，仁山阿訇前往西北地区募捐，得到马鸿逵捐款5000元，仁山阿訇将募得的捐款全部用于重建校舍，1936年学校恢复了原貌。1939年日军敌机轰炸常德时，该校全部被炸毁。

白常德回民翦涣兰创办于光绪24年的常德清真私立高级小学（后改为清真完小，即现在的东升小学），初期学杂费全免。后来，由于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学生不断增多，学校经费虽有古、东、西三个清真寺提供，开支仍有不敷。当时回民宰牛房较多，每日宰牛不少，牛血也多，牛血销路好，收入很可观。但伊斯兰教禁食血，宰户出售血虽不算直接食血，毕竟是不相宜的。为了解决经费来源，仁山阿訇通过一些头面人物、阿

阿訇、乡老等在宰户中进行宣传说服，动员他们将卖牛血收入捐给学校，以解决学校进行免费教育的经费。

仁山阿訇为了办好常德清真高级小学和务本小学他广泛征求回民意见，物色办学人才，并积极向清真古寺董事会推荐。从1935年起，经他荐举，聘请了当时教育界的名流黄声锡、曹世昌、黄逸、黄振武、黄聘武、黄子贞、马以诚等人，他们先后担任了这两个学校的校长。

他在各地主持伊斯兰师范学校教务时，一改伊斯兰教经堂学校不学中文的状况，在课程安排上，增设汉语课。1934年他在常德伊斯兰教学校任教时，增设《孟子》、《古文观止》等课，聘请颇有声望的汉文教师黄静轩老先生讲授汉文。在四川万县伊斯兰教学校执教时，增设了英语课。同时，重视对学生实践知识的培养，购置几台木质纺织机，让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在实践中增长才干。

总之，他一生关心并从事宗教教育事业，先后在常德、上海、万县等地任教，“桃李满天下”。如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张秉铎、四川省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方少斋，湖南省伊斯兰教协会名誉主任、省政协委员、常德市清真古寺阿訇马道美、现在沙特拉伯工作的海维谅、曾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的纳子嘉以及上海的马自元阿訇、广西的蔡时俊阿訇等都是他的学生。

热心公益 体恤贫困 乐于助人

1937年初，湖南恒丰纱厂拟在常德德山建厂，所选厂址之一部分，系回教人墓地。因回教人去世后，仅穿“克凡”（为白布做成的入葬服）而入土穴安葬，无棺槨，难以迁移。当时，该厂筹建处对厂址内的回教人坟墓，发出了迁坟通知。仁山阿訇应回教人要求，分别与常德回教救国协会负责人、各清

真寺阿訇、乡老等多次商讨，组成“护墓会”，派代表王裕国与该厂商谈。恒丰纱厂厂长在视察现场时，回民组织了约200人的请愿队，在墓地呼口号，要求将回教墓地从该厂厂址内划出，无结果。之后，仁山阿訇与回教护墓会负责人研究，决定选派他的长子云程（鹏举）为代表，前往当时设在武汉的“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请求帮助解决。数月后，“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理事长白崇禧与湖南省长张治中联系，说明回教人安葬特点，难于迁移。后经张治中允予，并嘱有关部门对厂址设计图纸稍作修改，将回教墓地从中划出。不久，因日军侵华，该厂一直未建。

1934年，中国回教公会常德公会成立后，仁山阿訇考虑到回教人民贫困者较多，建议由回教公会对无本、少本之回教小商贩，发放小额无息贷款，以解决或有利于他们的谋生问题。经回教公会研究，同意了他的建议。这对帮助回教中特别贫困的小商贩，起到良好的作用。1938年，上海“八·一三”以后，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省有不少逃难者相继来到常德，其中有不少回教难民到清真寺请求解决住宿问题。仁山阿訇与常德回教救国协会负责人翦质辅等会同各寺阿訇、老师傅、乡老等，发动大家共同想办法，组织安排好回教难民的住宿。仁山阿訇还对个别家庭人口多、生活困难者，予以关心，尽力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如回教难民中江苏镇江之李顺兴，家庭人口多，生活很困难，此人擅于做烤鸭等食品，仁山阿訇便会同清真寺负责人及有关教友，帮助李顺兴在市区繁华地段西围墙（即现青年路）租一间门面，开设了烤鸭店。由于技艺高超，售价低廉，生意兴隆，解决了李顺兴全家生活问题。又如，江西南昌来的难民魏大愚教友，也是人口多，生活困难，魏擅长书法，对古文也颇有根底。仁山阿訇便把他介绍到四川重庆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去工作。1922年，仁山阿訇在上海

伊斯兰师范学校任教务主任时，回民傅统先、黄荣甫到上海读中学，因食宿费昂贵，生活困难，仁山阿訇得知此事后就让傅、黄住在他的学校，帮助解决其食宿困难。后来，傅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该校任教，解放后，在山东大学任教授。1932年，澧县回民青年杨光富考入常德竞新中学，因饮食不便，不想住读。仁山阿訇便让杨在清真古寺借住搭伙，为其解难。解放后，杨在上海交通银行工作。

仁山阿訇不仅是一位通晓经文的学者，而且是一位生产经营的能手。他自幼家贫，勤奋好学，热爱劳动，加上他自身特殊的生活经历，掌握了制革、机织、印染、雪花膏、豆腐、香干牛肉等多方面的生产技能。他与翦质辅等人在沅陵合营“协兴制革厂”，与其弟先开在常德合营“振兴制革作坊”，与其姒子黄天成在湖北宜昌合营“振兴制革作坊”。同时，他还将生产、经营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后人。

他在个人生活上不管经济条件好否，总是粗茶淡饭，布衣简从；在办学、办企业、主持清真寺事务等公务中处处精打细算，俭节操业。1935年下半年，他与其子子厚同住常德清真古寺。有一天，子厚洗衣时，漂洗次数过多。他当即指出：“只将肥皂水挤掉，漂洗两次就行了，漂洗次数太多，浪费水了……。”1938年，他家住乾城时，春节前的一天，著名数学家翦奎吾偕同其子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来他家探望，他见翦伯赞身穿长袍，外罩灰布衫，当即对其子子厚说：“你看，翦伯赞先生是个大学问家，而穿着却这么朴素，多好呀！”

【责任编辑 朴永子】

回忆我在酃县的革命斗争经历

周 里*

走上革命的道路

1922年，我在酃县第二高小九班毕业后，报考了设在衡阳的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当时师范的条件优越，一是教员比较好；二是学生不交学费、伙食费；三是毕业后当教员是个“铁饭碗”。因此报考的人很多。“三师”在湘南24个县招生，因名额有限，大县录取4名，小县录取2名。酃县是小县，报考“三师”的有五六百人，只录取2名，考生竞争很激烈，还时常发生考试舞弊的事。

我读高小时，每学期成绩都在前三名，考“三师”是有几分把握的。在县里预考，我的成绩是第一名，小学教员黄元吉的儿子是第二名，第三名姓名忘了，县督学周炎卿的儿子周海清是第四名。如果我们都去“三师”复试，周海清考不赢我们。周炎卿便利用职权，将前三名考生的试卷抽掉，让周海清录取了，我们愤愤不平，闹到主考的县长那里。可是县长庇护周炎卿，我们没有闹出结果来。

1923年，我在长沙道南中学读了一年书后，因交费太多，家里经济困难，又想去考“三师”，可又怕试卷被周炎卿抽掉。怎么办？我找小学时的老师黄元吉商量，他出了一个主意，要我改名周礼，于是我再报考“三师”，以县里预考第一

*周里当时任中共酃县支部书记、酃县特别区委宣传委员、中共酃县委员会宣传部长等职。

名、“三师”复试第一名录取了。

当时“三师”有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有许多进步的教员和学生，学生会很活跃，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学生运动（我是第28班学生）。在接受革命思想之初，我和一些同学还只讲爱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反对帝国主义。1925年我们积极参加了五卅运动。6月6日，衡阳成立“湘南青沪惨案雪耻会”，8日举行了数千人的游行示威，并罢市、罢工、罢课一天。游行时我们走在学生队伍前面，高喊“打倒英日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我们还到湘江码头检查“洋船”，抵制英国、日本的货物。

学校里的共产党员发现我们这些积极分子，便送一些进步书刊给我们看，引导我们走革命道路。23班酃县同学刘寅生，在学校入党后任“三师”党支部书记、湘南学联负责人。他介绍我看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和《向导》等进步书刊，经常与我谈革命形势、革命道理和共产主义理想、前途。他是第一个给我革命启蒙的良师益友。

我和一些同学还参加了夜校工作。“三师”的工人夜校，是毛泽东同志1921年和1922年两次来校讲演后，党组织遵照他的指示办起来的。夜校吸收校工和附近农民入学，教他们识字，读书，打算盘，讲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当时农民运动正如暴风骤雨般地兴起，这场革命运动对我教育很深，促使我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在夜校，我们讲出是农民种，为什么缺吃少穿，贫穷困苦；地主不劳动，为什么吃得好，穿得好，有钱有势。从剥削阶级的压迫，讲到工农要翻身，就要参加工会和农会。用“一根筷子容易断，一把筷子折不断”的比喻，说明工农团结组织起来，就能打倒土豪劣绅等革命道理。以此教育和发动工人、农民参加革命群众运动。

在“三师”，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很激烈。1923年曾发生驱逐反动校长刘志远的学潮，50多名学生被开除，教员张秋人（共产党员）被迫离校。1925年彭德芳任校长，他是国家主义派，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利益，反对共产党。1926年，学校又发起倒彭运动，我们把他赶走了，推举共产党员蒋啸青当了校长。大革命时期，广大师生拥护在广东成立的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北伐，支持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支持讨吴（佩孚）驱赵（恒惕），革命形势发展很快。1927年“马日事变”后，革命运动处于低潮，蒋啸青和一些党员也被迫离开了学校（蒋是耒阳人，后来参加湖南暴动，在耒阳牺牲。同时被害的还有他的儿子蒋乐群、弟蒋次青、堂弟蒋式麟，他们都是“三师”学生、共产党员）。

我在“三师”读了三年书，刘寅生要我去长沙的国民党湖南省党校学习。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1926年北伐军占领了湖南，1927年3月在长沙筹办了一所国民党省党校，培训党务、农运和军事干部，实际上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合办的。刘寅生知道我的思想进步，有入党要求，就介绍我进了这所党校。考试科目为政治、国文、常识，主要考政治。招生人员找每个考生谈对形势和革命的认识。一位招生的同志和我谈话后，感到满意，并说我考得不错。4月间，我们被录取的学生从衡阳坐船到长沙入学。

省党校设在长沙市教育会坪，有政治、农运等班，我在政治班学习。全校有男女学生800多人。校长是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北伐军前敌总指挥、湖南省政府主席唐生智，当时随军到汉口去了。副校长凌炳是国民党左派，不久加入共产党。共产党员谢觉哉任秘书长，李达任教务主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夏曦和谢觉哉、戴述人都是省党校委员会委员。我们政治班于5月1日开学，夏曦、易礼容讲农民运动，郭亮讲工人运动，谢

觉哉讲党史，李达讲哲学，还有讲妇运、青运和军事的。学生穿蓝色制服，佩符号，戴军帽，女生剪短发。早晨出操，半天学军事，半天学政治。后因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的“马日事变”，党校只办了个多月就被迫停学了。

“马日事变”的晚上，我们入睡后，突闻枪声四起，大家惊慌中纷纷往外跑，一些学生冲击校门，遭到机枪扫射。校门出不去，许多学生又退回校内操坪。我和一些同学踏着围墙边的一堆杉树，爬墙跑出。我跑进水风井附近的小巷子一位老百姓家里，他听说我是逃难的学生，就留我住宿。第二天，我请他儿子去打听情况。他儿子回来告诉我，党校门口站了岗哨，有很多学生在搬被包箱子。我向这家人道谢后，回到学校。卫兵看到我是学生，也没阻拦。进校后，只见一些门窗捣烂了，到处乱七八糟，许多学生的被子、箱子被敌兵抢走了。一些回校学生纷纷议论说，省总工会、省农会被打死了人，抓走了人。他们匆匆拿着行李走了。这时党校已被宣布取缔，我便搬到省立第一师范同乡同学黎育教和刘平章那里住下。

我在“一师”住了几天，敌人不断地来搜枪抓人。有一天，黎育教告诉我，现在全省到处抓人杀人。而自己的党员身份暴露了，没法继续在此工作，要去汉口找党组织，问我怎么办？还干不干？我表示，就是砍脑壳也坚持干到底。他问刘平章干不干，刘也说干。他便派我俩回鄢县去，秘密恢复和发展农民协会。

5月底，我和刘平章一起回鄢县。刘平章回到五都两江口家里，我回到七都黄擢潭梁桥家里，做发动农民的工作。

那时鄢县也是一片白色恐怖。党的负责人有的被捕，有的逃散，县委书记李却非不知下落。农民协会被取缔，农民自卫队的枪支被缴，省农会特派员、共产党员朱子和等同志被敌人杀害了。我回家后，发动贫雇农周策长、周策勉、谢祥福等五

六人，组织了一个农会小组，7月间发展到3个小组。此外，我和五都的刘平章、九都安坑的姚晓园等都有密切的联系。

7月下旬，黎育教和邝光前到我家告诉我，汪精卫在汉口叛变，他们在汉口呆不住，只好回酃县。我汇报了发展农会小组的情况。他们说搞得不错，要继续干下去，把秘密农会搞起来。他们看我对革命满怀信心，工作积极，又知道我在省党校填过入党志愿书，便在我家里举行了入党仪式。他们告诫我，当前的任务就是要把工人农民发动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党的指示要坚决执行，不讲价钱。党的秘密对父母妻子都不能讲。遇到危险，就烧掉文件，拿刀子和敌人拚。

入党后，由黎育教、邝光前和我三人组成一个临时党支部，黎要我当支部书记，我说我是新党员怎么能当书记？他坚持说，许多人知道我们是党员，我们如果在本地呆不住，还要走的。别人不知道你是党员，你可以秘密开展工作。

有了党的领导，我们更加积极地宣传革命主张，发动群众，发展党员，恢复农会。我首先在梁桥农会小组中吸收贫农周策长、周策海、谢祥初等入党，继续发展农协组织。我又介绍三师同学刘平章、姚晓园、张平化等入党，要他们都做发动农民、恢复农协的工作。我还联系了西乡的段凤、段瑞等，恢复了西乡的农协。于是，农民运动又在酃县各地发动起来了。

向毛委员汇报

1927年9月，毛泽东同志领导湘赣边境秋收起义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酃县。我们支部几个党员听到这个消息后很兴奋，都说，毛委员要是能够来酃县领导我们起义就好了，农民运动又可以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

10月中旬的一天，我在杨溪湾同学廖珩家里，看到一支队

伍从梭树坳过路，往水口方向走去。我赶上去一看，军旗上写着“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上面还有斧头、镰刀的标记。我高兴地赶回梁桥，找了周策长等几个党员商量。因我是支部书记，大家要我去接头。梁桥离水口四十多里路，第二天天刚亮我吃了早饭，朝水口走去。在快到水口的路上，我看见了一支队伍，便问他们是不是工农革命军，负责人在哪？他们说是的，负责人在前面团部。路上又碰到一位高个子军人，他问我这里有没有农会和共产党员。我告诉他，农会被反动派取缔了，但党支部还在，正要我来找部队负责人汇报哩。他先问了我的姓名，又问我知不知道毛泽东同志。我说，毛委员在浏阳、平江一带领导了秋收起义，要是来我们酃县就好了。他很爽快地带我去团部见负责人。

团部设在朱家祠。一位30多岁、高身材、穿便服的同志正坐在四方桌边写字，高个子军人向那位同志介绍说：“这是周礼同志，酃县的党员，来找组织关系，汇报支部工作的。”又对我说：“这就是毛委员，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马上起身亲切地和我握手，招呼我坐在旁边那条凳上。

毛委员问：“你们还有支部？”我马上回答说，是“马日事变”后秘密成立的临时支部，我是支部书记，开始三个党员都是长沙回来的学生，以后又发展了几个农民入党。他接着问：“原来的党员呢？”我说有的被抓，有的被杀，有的跑了，县委书记李却非不知去向。我接着汇报：“省农民协会的特派员朱子和同志，是湘潭人，被反动派枪杀了，农民自卫队几十支枪被缴了，农会都解散了。现在，我们又在一都、五都、八都、九都恢复了几个农会小组。”他高兴地说：“你们还搞了这个，很好！就是要把农民协会恢复起来，先找那些受剥削最重，受苦最深，对土豪劣绅最恨的农民参加。”

当我汇报找了一些学生做工作时，毛委员说：“知识分子活动能力强，起桥梁作用，干革命要有知识分子。但是我们主要依靠工农。农民是农村里的主力军，要多找满脚泥巴满脚牛屎的人做朋友，把他们发动起来革命。”又说：“你算算看，农村里是地主多还是农民多，谁的力量大？就说你的家乡，有多少土豪劣绅，又有多少农民呢？”我回答：“劣绅有周德玉、周炎卿，还有几个地主。农民占绝大多数。”他说：“是嘛，你们把那么多农民组织起来，力量就大了，就可以把土豪劣绅打倒。”

谈话中，有人送来一封信，毛泽东同志看完信后，又问我酃县敌人的情况，我汇报酃县没有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南乡和东乡有挨户团。南乡挨户团头子叫陈大观，有30多条枪；东乡挨户团头子叫贾少隶，缴了农会自卫队一些枪，共有七八十条枪。

毛泽东同志听完后，向我谈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他说：“由于蒋介石的反革命叛变，以及我们党内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使这次大革命遭到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目前我们的处境非常困难，工作十分艰苦，但是要看到光明和希望，要看到敌人内部矛盾重重，要看到受剥削、受压迫的工农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敌人在农村的力量比较薄弱，我们要发动农民，恢复农会，搞武装斗争。”他还说：“革命就要不怕杀头。现在到处是白色势力，你们还搞共产党，办农会，这就不错嘛！你们在酃县要发展党的组织，要放手发动农民办农会，要敢于向土豪劣绅作斗争。农民不组织起来，一盘散沙是不行的。组织起来还要搞武装，先搞梭标鸟枪，再夺敌人的枪，我也可以给你们发枪。”

接着，毛泽东同志又问酃县的地形，要我详细画个地图给他。我说有的地方不太熟，去找一张酃县地图来行吗？他点

点头说：“那更好。”于是我同高个子到朱家祠小学校，找到一张酃县旧地图给毛泽东同志。他还要我给部队找一个向导，并留下通讯联络地点。我说可以通过黄挪潭苦菜冲我妻弟刘家俊联系，写下联络地点后，我便向毛泽东同志告辞回去。高个子送我出门时嘱托我到茶陵侦察一下敌人的情况。我答应明天就去。

回家后，我向支部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找了党员刘清黎到部队去当向导。周策长经常去茶陵挑运货物，对茶陵比较熟悉，我便邀了他翌日清晨动身，去茶陵探听敌人情况。第二天下午到达茶陵县城，找了伙铺后，就到茶馆里去喝茶。茶馆里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大多在谈“清乡”的事。我们打听到湘东清乡司令罗定即将带领一千多人，兵分两路，一路走酃县西乡，一路走酃县县城，“进剿”工农革命军。探得消息后，我们赶快回酃县，向团部的高个子汇报了这一情况。当晚我住在水口。第二天吃过早饭，动身回家时，听到吹集合号，部队准备出发了。高个子告诉我，毛泽东同志说罗定人多，这次不跟他打，他来，我们就走。

后来听说，毛泽东同志带来水口的一团人，只有七八百人枪，走时也是兵分两路。一路由1团1营党代表宛希先率领一个连急行军，经船形往安仁县，转过去掏罗定的老窝，一举攻破茶陵县城，缴了几十条枪，打开牢门，救出了被监禁的“政治犯”和受难的老百姓。部队当天撤出县城，经和尚庄去江西宁冈，上井冈山去了；另一路由毛泽东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主力，经八都、下村，折向江西遂川的大汾圩，遭到地方反动地主武装肖家壁部袭击。于是部队又分两路，3营由营长张子清、副营长伍中豪带领往桂东一带活动，毛泽东同志率领团部和其余部队经黄坳、荆竹山上了井冈山，在大井与当地的王佐部队会合。

当湘东清乡司令罗定带领部队气势汹汹地进入酃县，扬言要“剿灭”工农革命军时，突然听说工农革命军攻占了茶陵，马上掉转屁股往回跑，到茶陵县城时，工农革命军已经撤走了。

11月中旬，我到井冈山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工作，听说毛泽东同志穿草鞋磨烂了脚，没有见到他，见到了宛希先。汇报后，他要我再去茶陵侦察敌情。我又回家邀了周策长一起去茶陵，了解到茶陵敌军人数不多，罗定本人也不在茶陵等情况。我向宛希先汇报后，工农革命军第1营立即突袭茶陵，打败罗定部队，第二次攻占了茶陵县城。11月28日，成立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谭震林任主席。

那次我在水口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后，毛泽东同志给湘南特委写了信，要特委派人加强酃县工作的领导，并将我的联络地点告诉了特委。11月间，从衡阳来了一位姓欧阳的工人，找到我岳父家，说要找周礼。我岳母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他在衡阳开饭馆，周礼在那里吃饭欠了帐，是来讨帐的。我岳母不相信，推说周礼不在这里，不晓得哪里去了。欧阳同志没有办法，只好走。路上碰到乡丁，盘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还说是找周礼讨帐的。这时恰好刘寅生的哥哥、打入黄陂潭乡公所的地下党员刘承向来了，他对乡丁说，是讨帐的，莫管他。乡丁走后，刘承向问我周礼到底有什么事，和他讲没关系。欧阳同志说，有人托我送一封信，说要找周礼才晓得地方。刘承向马上告诉了我。我知道是湘南特委派人给毛泽东同志送信的，就要周策长把他送上井冈山。

1927年冬，黎育教和毛泽覃一起到我家，周策长把他们送上井冈山。“马日事变”前的酃县县委书记李却非事变后跑到长沙去了，这次从长沙回来，要去找部队。我又陪他一起上井冈山。毛泽东同志外出了，没有见到，见到宛希先。李却非拿出

一张白纸，说是省委的介绍信。信是用五倍子水写的，用明矾水一浸就显出字来了。宛希先问省委有什么指示？李却非说，省委现在的方针是暂时停止发展党员。宛希先说，哪有什么停止发展的方针。他把我叫到另一间房里，问我认得他不，是不是党员？我说认得，是以前的县委书记。他这才放心，但不赞成停止发展党员。李却非当时留在部队工作。我回家后，仍然积极而慎重地发展党员。

12月，湘南特委又派特委委员刘寅生来了。他原在未阳担任县委书记，这次是来酃县加强党的领导的。我在羊角岭附近碰上他，他后面还跟着一乘空轿子。我们见面都高兴极了。他告诉我，因为酃县水口一带认得他的人多，怕暴露，所以请两位同志抬轿子作掩护，经过水口一带时就坐在轿子里，这次回酃县也只能隐蔽活动。他问我到哪里去，我说到这里的黄元吉家。他说和我一起去，他将藏在轿杠里的文件拿出来放进口袋，要两位护送他的同志回去。在黄元吉家，我向刘寅生汇报了工作。晚上，他就秘密回家去了。

刘寅生回县后，工作进一步开展了。我和他一起到了南乡、西乡、东乡（酃县没有北乡），发展党组织，指导各地恢复农民协会，搞农民武装。一些进步学生知道我在水口和工农革命军接过头，就主动来找我，要求参加工作。如中村的周介甫原先办过农会，和我们联系后不久入党，工作积极，中村一带很快恢复了农会，打开了局面。张平化也是这时入党的，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在我家屋后山棚里举行的入党仪式。那次还有两个农民同时入党。刘寅生勉励他们发挥党员作用，努力革命。我们在西乡找到段瑞、段凤等党员，成立了支部。党员潘祖浩也在潘家一带积极开展工作。西乡和十都背石冈等地工作进展较快，发展了农会，正在组织农民武装，作暴动的准备。

1928年1月，我们计划把南乡挨户团的30多条枪拉过来。

那天，按照约定的时间，何建础、何国诚、何史良从龙潭来，经过中村时邀了周介甫，周介甫路过塘又临时邀了刘先觉，一起到羊角岭黄元吉家吃了中饭后，到我家开会。我们商定过了旧历年在水口开会改组挨户团，推选何国诚当队长，把枪杆子抓到手。何是黄埔军校四期生，其父是南乡大士绅何鼎臣。何鼎臣和操纵南乡挨户团的大豪绅李芝是好友，推选何国诚当队长，估计李芝和一般豪绅都会同意。谁知开会的事被打醮坪的劣绅张少棠、张济昆知道了，便告诉了挨户团队长陈大观。他们把刘先觉抓到打醮坪学校里审问，刘经不起威胁和利诱，全部招供。劣绅们凶相毕露，议定旧历除夕晚上派挨户团将参加黄塘潭秘密会议的人抓起来杀掉。陈大观是个文人，不懂军事，他不敢作主，去请示李芝。李芝考虑到其中何姓三人与何鼎臣有关，何鼎臣不会同意杀人。旧历12月30日下午，李芝请了何鼎臣和南乡几个豪绅开会商量。会上有主张“都杀掉，以免后祸”的，也有提出“年轻人误入迷途，不可不教而诛，今后由各家长严加管教”的。何鼎臣更不同意杀。因此，当晚便没有抓人杀人。李芝的二媳妇刘仲寰是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生、党员，她请人连夜送信告我。我立即通知大家隐蔽，春节后再计划新的行动。

这时全县党支部和农会发展较快，我们准备成立酃县特别区委，领导全县工作。2月春节后，刘寅生和我去井冈山找毛泽东同志请示和汇报工作。在井冈山见到何长工，他是新成立的第二团的党代表。他告诉我们，毛泽东同志带领第一团到遂川县的黄坳去了，此去有几十里路，我们便请了当地一个老百姓带路，天黑才赶到黄坳，在一个祠堂里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我介绍：“刘寅生同志是湘南特委派来的。”刘寅生说，我们是来向您汇报请示工作的。毛泽东同志亲切地和我们握手说：“你们走累了，明天再谈，今晚就睡在我这里吧！”我和刘寅生都是穿的

草鞋，洗脚睡觉时，毛泽东同志从里面房里拿了他的一双布鞋给刘寅生，接着望了我一下说：“你也没有鞋子。”又从房里拿了一双布鞋给我。我们随毛泽东同志走进里屋，房里有两张床，一张靠墙角挂了帐子的是毛泽东同志睡的；一张是临时搭的木板子床，已经睡了一位同志，我就是穿了他的布鞋。毛泽东同志要刘寅生和他睡一张床，又对我说：“你和那位同志搭铺。”毛泽东同志睡时，还问刘寅生多大年纪，哪年入党，在“三师”哪个班读书。

第二天上午，我们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酃县工作情况。毛泽东同志说：“你们发展了党组织，恢复了农会，工作有了基础，可以准备武装暴动了。部队4月间到酃县来，配合你们暴动。”他批准我们成立酃县特别区委，刘寅生任书记，邝光前任组织委员，我任宣传委员。我们临走时，毛泽东同志还送了一百块钱元作工作经费。

从黄坳回酃县后，我们在刘寅生家开了特别区委会。这时全县已发展到10多个支部、100多名党员，农会会员也发展到上万人。特别区委研究了暴动计划，准备3月下旬全县举行武装暴动。

三 月 暴 动

酃县1928年的3月暴动，是遵照毛泽东同志指示，在工农革命军的支持和配合下举行的。农民暴动遍及东、南、西三乡，参加暴动者达3千多人，在酃县具有深远的影响。

2月下旬，酃县特别区委在下坪开会，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作出了全县东、南、西乡同时暴动的计划后，特别区委就分工到各乡支部部署工作，要求各地充分发动农民群众，组织农民武装，作好斗争当地土豪劣绅的准备，3月下旬举行全县暴动。会后，刘寅生和我走南乡水口、中村，经船形、塘田去

西乡，一路上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传达到各支部，积极组织暴动。在西乡路上碰到段凤，他留我们住在他家，又把支部书记段瑞找来，一起研究西乡工作。这时刘承向派人来西乡找我们，说毛泽东同志派戴奇、邱笛来有急事，要我们赶快回去。我和刘寅生马上抄近路回黄挪潭。

我们经过县城时已天黑，为了避开岗哨，就抄小路从湘山寺翻山而过。山上林密草深，又下着大雨，穿的是长袍子，眼前黑糊糊的，连连摔跤，爬不上去。我们只好回头走接龙桥、画眉桥，一个通宵走了几十里，第二天上午赶到刘寅生家里，见到了戴奇、邱笛。戴奇是东乡人，“三师”同学，在部队任连党代表。他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说部队提前在3月中旬来酃县，暴动也要提前，在部队到达之前行动，否则部队一来，土豪劣绅逃了，就找不到斗争对象。于是我们决定将暴动提前在3月上旬举行。当时分工，我指挥十都、九都、七都，邝光前指挥八都，刘平章指挥五都，段瑞等指挥西乡，周介甫指挥中村，邝远喧指挥茅坪，朱才亮指挥水口，刘清黎指挥泥湖、派溪，刘承向指挥黄挪潭，通知各地同时暴动。

特别区委重新部署后，我到了九都的石洲、安坑，找张平化、姚晓园等分头发动组织农民武装。石洲有个劣绅张少文，他和东乡团防局头子贾少棠（外号“贾屠夫”）往来密切，很反动，是个地头蛇。我们决定先拿他开刀。这天晚上，我和姚晓园带领200多人，打着红旗，手拿梭标、大刀、鸟枪，悄悄包围了张少文家。首先派人去敲门，说是送信的，他家不开门。我们便将门冲开，可是搜了半天也没有搜到。原来张少文一看情况不妙，躲在二楼的天花板里，没有搜到，让他漏网了。当晚我们打开他家的粮仓，把粮食分给了贫苦农民。

暴动迅速在全县各地展开。邝光前、肖冒范、杨以达等在下村成立暴动队，斗了肖冒其等土豪。朱才亮等在水口组织暴

动，二三百农民围攻了大土豪李芝的家院，抄了他的家。刘平章在两江口组织了暴动。西乡反动势力虽控制很严，但仍然发起了暴动，在潘祖浩领导下，还成立了西乡游击总指挥部，发展到一千多人，杀了霍凤梧等大土豪。

我们在石洲、安坑组织暴动后，听说毛泽东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师分三路进入酃县，便带100多名武装农民，循着从县城过来向水口前进的那支部队赶去，途中汇合了两江口刘平章指挥的暴动队伍，一道经水口到了中村。部队已在中村驻下，我和刘平章带领的暴动队伍，加上中村和其他地方的暴动队伍共400多人，也驻在中村街上。

中村位于酃县南部，洣水上游，与桂东、资兴接界，四面环山，地势险要。毛泽东同志带领部队在这里休整了10来天，亲自给部队上政治课，组织部队开展群众工作，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

3月20日，部队师党委和酃县特别区委在中村周南学校召开联席会议。会议研究了进一步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武装，建立地方政权，打土豪，分田地等问题。经批准，酃县特别区委改为中共酃县委员会，刘寅生任书记，邝光前任组织部长，我任宣传部长。还成立了共青团酃县委员会，万达才任团委书记。接着又成立了中共中村区委会和区工农兵政府，何建础任区委书记，盘坤华任区政府主席。县委从农民暴动队伍中选出100多人，组织了酃县赤卫队，由何国诚任大队长，戴奇为指导员。毛泽东同志还给赤卫队发了8条枪。

为了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毛泽东同志带头访贫问苦，作社会调查。当时有的农民对打土豪没收来的粮食、财物不敢要，担心部队一走，挨户团回来杀头。毛泽东同志向农民说：“一块小石头，能够砸破大水缸。只要我们组织起来，就象一块坚硬的石头，不仅能砸破土豪劣绅这些小水缸，还能砸烂

蒋介石这个大水缸。”这一生动的比喻，对大家教育很深。

3月下旬，毛泽东同志在中村圩头召开了3千多人参加的农民诉苦大会。大会由刘寅生主持。毛泽东同志在会上讲话，他用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的革命道理，启发大家的阶级觉悟，号召大家联合起来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接着有十多个穷苦农民上台诉阶级苦、血泪仇。大会根据群众的要求，当场处决了两名有罪恶的土豪。

毛泽东同志和酃县县委刘寅生等同志经过研究，决定派出一批部队和地方的干部，在道任、中村、联西、心田、深渡、龙潭等乡作社会调查，发动农民开展分田运动，周介甫等同志首先在道任乡分土地，由农会造册，统一用竹牌子，写上户主、座落、田界、亩积，由各户将牌子插在分到的田里，群众叫“插牌分田”。毛泽东同志和县委认为道任乡搞得好，要其他乡都照道任乡的方法分配土地。

这次毛泽东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师来酃县，是按照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的指示，去湘南策应朱德、陈毅等同志和湘南特委组织发动的“湘南暴动”。部队在支持、配合酃县暴动后，即开赴桂东。县委考虑县赤卫队新成立，只有100多人、8条枪，又没有作战经验，便要赤卫队跟随工农革命军去锻炼一个时期。

部队一走，县委估计敌人会疯狂反扑，为了防止敌人破坏，县委机关秘密设在离中村不远的茅坪大山里一个瑶族农民家里。县委在茅坪开会研究，要继续发动没有暴动的地方组织暴动。县委派我去八都坳头，我在那里和邝光前一起又组织了第二次暴动。

在坳头，我们很快发动了二三百农民，打土豪，开仓济贫，还组织了农民武装。我把这次暴动情况写了报告送给县委，刘寅生阅后跟我说，坳头搞起来了，你们真有办法，你再

黄挪潭乡，把那里的暴动也搞起来。

黄挪潭的暴动原先是刘承向负责，没有搞成功。这时正好黄元吉带了3个农民从黄挪潭来坳头接头。我便带着一个小鬼和黄元吉等回了梁桥。

这时已是4月上旬了，我第三次在梁桥组织暴动。暴动那天，梁桥一带到处是标语：“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政府”、“打土豪，分田地，农民大翻身”。我们先派赤卫队将住在上张家坳的土豪周炎卿抓了来。在梁桥附近山上的婆婆仙庙里开大会，方圆三四十里来了五六百人，农民赤卫队员手拿梭标、大刀、乌枪，红旗招展，声势很大。大会斗争了周炎卿，会后，又押着游街到梁桥，在那里把他处决了。

4月中旬，毛泽东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团，在资兴与肖克领导的宜章农军独立营会合了。这时，湖南吴尚第8军和江西杨池生、杨如轩的两个师“会剿”工农革命军和湘南暴动队伍，毛泽东同志率领部队会合后，从资兴来到中村。刘寅生和万达才到中村去，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工作。毛泽东同志说：

“酃县暴动是有成绩的，但是我们要注意，不要到处杀人烧屋，不是罪恶极大的土豪劣绅不要杀，对一般地主和土豪劣绅要区别对待。土豪劣绅的房子也不要烧，房子可以分给农民住嘛！为什么要烧掉？搞这种烧杀政策是脱离群众的。”后来我们才知道，3月初湘南特委派了特委委员周鲁当代表到宁冈，批评前委“太右”，“烧杀太少”。3月上旬，取消了由毛泽东同志任书记的党的前敌委员会，改组为师党委，何挺颖为书记，毛泽东同志只任师长。当时在“左”倾思想影响下，湘南不少地方搞“左”倾盲动，王佐的部队烧杀也比较厉害，酃县农民暴动时烧了地主一些房子。毛泽东同志当时不赞成乱烧乱杀，但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加之对阶级敌人的仇恨，一

些地方乱烧乱杀的现象，仍然没有制止下来。

毛泽东同志率领部队从中村出发，经过水口，进入酃县县城。在接龙桥与吴尚第8军一个团及茶陵挨户团打了一仗，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然后撤出县城，掩护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暴动农军向井冈山胜利转移。部队经沔渡到了十都，刘寅生、万达才也随部队去了，并通知我到十都开县委会。会上，刘寅生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不要乱烧乱杀的指示，研究了当前工作。开完会我又回到梁桥。

江西敌军一个团从梁桥尾追工农革命军，已被拉得精疲力竭，又怕工农革命军捣江西老巢，便急忙走黄挪潭抄近路回江西。当时，我们正在婆婆仙山开农协大会，忽听说十多个敌兵由农民领着上山来了，我们立即作好战斗准备。这时先上来的农民对我说，这是敌军的一个班，要投奔共产党，便把他们带到这里来了。我们欢迎他们起义投诚（这个班有12条枪，3支号）。他们一路又饿又累，听到我们宣传士兵要提高觉悟，不要为国民党反动派卖命，便投诚过来了。我把这个情况写信告诉了刘寅生，建议接收这一班人，编入赤卫队。这时县赤卫队已随工农革命军去宁冈，刘寅生便派刘承向来梁桥，带领这班人暂到八都黎树洲大山上驻下来。刘寅生又通知我到五都张平化的舅父家去找他，要我回县委机关工作。

敌人疯狂反扑

1928年4月，毛泽东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离开酃县到宁冈，与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胜利会师。酃县的敌人等我们的部队一走，立即反扑过来，大搞“清乡”。地主武装挨户团到处搜山抓“暴徒”，抓到枪杀。敌人还到处贴布告，悬赏捉拿“共匪”刘寅生、周礼、

刘承向等。许多革命同志牺牲了，许多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的房子被烧了，斗争十分残酷。但是，我们怀着坚强的共产主义信念和一颗革命的红心，为了党的事业，坚持革命到底。

县委机关原先秘密设在中村附近的茅坪，那里的群众基础虽好，但地方偏远，不便领导全县工作。经张平化介绍，县委机关搬到靠城区五都下江洲他一个姓吴的亲戚家里。当时县委机关除刘寅生和我外，还有张平化、黄元吉、邝远暄、刘家相、周策长等工作人员。为了开展工作，县委派张平化回九都，周策长、刘家相回七都，同时派邝远暄去衡阳与湘南特委接头。不久我们听到不幸的消息，邝远暄途经西乡时被捕，挨户团将他押到中村杀害；周策长回梁桥后，也被挨户团抓住用刑，他们都英勇牺牲了。

县委派张平化回九都工作后，我们不便再住在他的亲戚家里，于是又通过刘平章新发展的党员林立卓介绍，把县委机关搬到南岸段家垅离林立卓家一里多路的贫苦裁缝段积善家里。段家在山冲里，单家独户，段裁缝经常外出做工，他爱人肖吉秀帮我们做饭。刘寅生、黄元吉（县委秘书长）、刘平章（县委干事兼五都区委书记）和我都住在右边小房里，白天不出去，平时购买食物用品，都由林立卓代办。

这时，我们听到了周介甫、邝光前、朱才亮等同志英勇牺牲的消息。周介甫是部队离开中村后，挨户团来“清乡”，他躲在白米石山上被搜捕，受尽敌人各种酷刑，遍体鳞伤，宁死不屈。敌人将他从中村押往县城时，用铁丝穿过他的手心拖着走，在去水口途中将他枪杀，并砍下头送到县城示众。

5月中旬，我们请林立卓去水口买些硫磺、白硝，准备做瓶装炸弹，还请他帮我们买点菜。下午他就把硫磺、白硝和一些鸡蛋送来了。晚上，他又送来一只鸡，说怕我们没有菜吃。他喘着气，手有些颤抖，引起了我们的怀疑。我们没要他买鸡，

为什么突然晚上送鸡来？为什么又这么紧张？他出门回家时，我便和刘平章偷偷跟着他，准备去他家探听情况。那天晚上下大雨，我们跟到半路，想起他家有一条恶狗，狗一叫就会被发现，于是转回来了。晚上大家不放心，鞋也没有脱就和衣睡下。半夜时突然狗叫，我们起来从窗户看了一阵，没有发现什么动静，又睡了。天刚蒙蒙亮，肖吉秀起来做饭，开门发现住屋对面小路上有几个敌兵，慌忙关上门告诉我们。这时敌人在外面大喊大叫“抓住！抓住！”刘寅生很镇静的要我们不要慌，并沉着地把一些秘密文件都烧掉。这时我们知道林立卓是叛徒了，是他告诉敌人，我们有炸弹，敌人怕死，围了屋不敢冲进来。黄元吉打开左侧门一看，屋前都被敌人包围了；再打开后门一看，屋后高塍上也有枪兵。我看到情势危急，一声喊“冲”，黄元吉和我首先从前门冲了出去。刘平章接着冲出时，被打死在门口。我提着一个装文件的红色空皮箱，往田里跑时，情急生智，将皮箱往田塍下一丢。敌人以为里面有钱，都去抢皮箱。我和黄元吉便趁机爬山跑了。这时刘寅生还在屋里没出来，敌人便放火烧屋。刘寅生爬上茅屋顶，想跳到屋后山塍上跑走，可是没跳过去就被枪打中，滚到塍下牺牲了。县委机关就这样被叛徒告密，遭到了破坏。

事后我才知道，林立卓是被当地大地主家的周树职威胁利诱叛变的。那天林立卓去水口买东西回来后，周树职把他抓去审问，他便自首了。于是周树职带了挨户团一排人深夜包围了我们。

这次事件给我们的教训很深。当时湘南特委“左”的指导思想，还是要攻占城市，强调做好近城区的工作，对我们也有影响。五都靠近县城，敌人力量较强，群众基础又不太好。林立卓是新入党的富裕中农，又没有经过严格审查和斗争考验，县委机关不应该设在这里。而我们对林立卓产生怀疑后，仍然

育采取果断措施，当晚迅速转移，使党组织受到损失。

我和黄元吉逃上山后，敌人仍然穷追不舍，一边向我们开枪，一边喊“抓活的”。我们攀着树枝，一连爬了两座山。黄元吉鞋子也掉了，喘着气说，最好不要走散了。他身上还有三块银元，分了5块给我，怕我走散了没有钱用。我休息时，才发现左手受了枪伤，忙用手巾把伤口包好。可能是我爬山时留下了血迹，不久敌人又跟踪追来了。我们赶快跑下山，穿过田垅，再爬过一座小山，藏到田垅中一堆茅柴里。透过茅柴空隙，看到前面有两个人在耙田准备插秧，一会儿来了一个送饭的对他俩说，你们不要走，早上打死了两个，跑了两个，有个带了花，路上有血迹。他们跑不了，周围都放哨卡死了，你们发现了就抓活的。我们才知道，这两人是挨户团放哨的。我想起了离这地方不远的杨溪湾同学廖珩家，于是和黄元吉商量，先到他家去躲避一下。

我们饿着肚子躲到天黑，等那两个放哨的走了，便改了方向往西爬山走，终于爬到了水口去县城大路的山上，沿着山沟溜到山下，往县城方向走了约五里路，从横树坳乘渡船过河，到杨溪湾廖珩家外已是深夜了。我向黄元吉介绍说，廖珩中学毕业后在长沙开了一个机房，他家在当地有权有势，家里只有一个母亲。我们等天亮再进屋，只说是从廖珩那里来的，听听消息。你扮挑夫，就说担子放在伙铺里了。于是我们忍着饥寒，等待天明。

天亮了，我们便去廖家敲门。廖母开门见到我便问，你们这么早从哪里来呀？我说从长沙廖珩那里来的，她忙把我们让进屋里。我悄悄告诉她，廖珩和我都是共产党员，他要我回来听听消息，问一下你，这个时候能不能回家。廖珩其实是无政府主义者，此时我只好扯一个谎。廖母说，不要怕，你叫他回来。她随即招呼我们坐下，接着说起昨天南岸打死刘寅生、郑

平章两个共党分子，跑了两个的事。她望了我们两人一眼，似乎有些怀疑。我请她找个人打听一下，从这里到板溪圩场的路上，有没有挨户团的岗哨。

吃过早饭，她便要长工去打听消息。我提出来还是到山上去躲避一下，说是怕摆渡的去告密，其实也是怕她家长工去告密。我们躲在廖家屋后山上，远远看到一排军队走樟树坳大路往龙溪方向去了，猜想就是那些围屋要抓我们的家伙。他们没过河来，我们才放心。中午廖母提着饭篮子来山上，装着我牛的样子，口里喊，牛哪里去了？我们知道她是来送饭的。但有些不放心的，没有出来，饿了一餐，傍晚我们才到她家去。她家长工已经回来了，说沿路到板溪圩场都没有看到放哨的。我们吃过晚饭要走，廖母炒了两升糯米，煮了30个鸡蛋，给我们带到路上吃。临走时我们向她道谢，给了她一块银元做伙食费。天刚黑，就动身回黄挪潭了。

我们想回黄挪潭后，再去找部队，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县委机关被破坏的情况。一路安全过了板溪，再走茶垅，沿途都没遇到情况，到花树坳山顶时天已亮了。我们找到一个偏僻的石洞，在洞里吃炒糯米和熟鸡蛋，还采吃了杜鹃花止渴。随即又上路，当晚走到秧田坳上，离梁桥还有20多里。我和黄元吉感到很累，山风吹来又觉寒冷，想去当地一个姓黄的熟人家休息。黄元吉敲了敲窗子，黄家老爹听到了，问是谁？黄回答是黄元吉和周礼。老爹担心地说，你们还冒走呀！到处在放哨，巡夜，还出了布告抓你们，抓到一个赏银元300块，藏你们要杀头哩！他要我们快走。我和黄元吉辞别老爹，边走边商量怎么办。黄元吉说离这里不远，就是九都板坑楼，那里过去有个很要好的家门，是个小土绅，到那里去靠得住。我同意了。

走到板坑楼过去的-一个村子，还没有天亮。黄元吉去敲黄土绅的窗子，他打开门，要我们睡到天亮，晚上再换个地方

躲一躲。我们睡了不到两个钟头，天蒙蒙亮时就把我们喊醒，带到一个山棚里，白天送饭来吃。我们休息了一天，晚上又改道动身，回头经过秧田垅，然后走下坪拱桥，从羊角岭上坳，到了黄元吉家里。在他家住了两天，白天躲在山上，晚上回来睡觉。我们听说县委派出和部队联系的刘清黎在梨树洲的下洲，决定去找他一道寻找部队。

我们一早出发，夜晚到了梨树洲，在下洲一个姓黄的家里找到了刘清黎。这个姓黄的参加了农会，又是红帮圈子会的人，刘清黎告诉我们，县赤卫军在大院一带活动，到大院要经过红水冈，那地方山高路险，人烟稀少，野兽出没，土匪枪劫，当地老百姓多数参加帮会，要由帮会成员带路才好过去。于是我们三人请黄带路。我们担心路上遇到敌人报复，每人拿了梭标，经过张天坳时没有出事，但看到黄挪潭方向冒烟，是反动派烧房子吗？我的房子早被反动派烧了。我说，可能是赤卫队来了，烧地主豪绅的房子。

我们路过苦菜冲时，到我岳父家里打听消息。岳父告诉我们，的确是赤卫队来过了，赤卫队一来，土豪劣绅和挨户团跑了，赤卫队得知大劣绅周德玉躲在上洞姘妇家里，便围屋冲了进去，搜了一阵没有搜到周德玉，便放火烧屋，谁知周德玉躲在楼上的天花板里，被烧死了。赤卫队开仓济贫后走了。我们吃了饭，又往大院方向去追赶赤卫队，走到桥头，看到赤卫队正在做饭吃。大家见面时，非常高兴，当听到刘寅生、刘平章牺牲了，又不禁悲痛万分。赤卫队（包括投诚的那一班人）有了五六十条枪。我们便领着赤卫队去井冈山，在茅坪又见到了毛泽东同志。

我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县委机关遭到破坏的情况，请求派干部重新组织县委。毛泽东同志说：“我这里有两个鄱县干部，一个李却非，一个黎育教，你要哪一个？”我说：“最好

两个都回酃县工作。”毛泽东同志说：“可以”。于是由李却非、黎育教和我负责组建新的县委。一个晴朗的日子，毛泽东同志在慎公祠召集酃县县委工作人员和县赤卫队一起开了大会，作了政治报告。他指示县委带领赤卫队回酃县开展工作，坚持斗争，建立政权，发展武装，进行土改，建设中心区域。然后波浪式地扩大根据地。

六月上旬，酃县县委在大院重新建立，李却非任书记，黎育教任组织委员，周礼任宣传委员，委员还有张平化、万达才、姚晓园、邝光前等。随即酃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主席徐鼎燕。县委确定以靠近井冈山的大院、青石冈为中心地区，县委设在家坑。下设三个区委会：第一区姚晓园任区委书记，以青石冈为中心向十都发展；第二区张平化任区委书记，以九都石洲为中心开展工作；第三区周礼兼区委书记，以大院为中心向七都、八都发展。我们按照这个部署，很快开展了工作。县委还派出赤卫队，到五都处决了叛徒林立卓。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湘赣边界特委的领导下，酃县的党组织和工农兵政府不断得到巩固发展，县赤卫队也一天一天的壮大起来，7月上旬，大院区、青石冈区以乡为单位插牌分田，一片兴旺景象。从而形成酃县苏区在1929年1月井冈山失守前的最好时期。（黎风 整理）

【责任编辑 徐晓吟】

湘中二支队始末*

谢德明

解放战争时期，战斗在湘中地区的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第二支队（以下简称二支队），是遵照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工委）指示，在中共邵阳中心县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心县工委）领导下的一支革命武装。

1949年2至6月，莫新春、李建中、张大野、尹如圭、宁瑞林在党的影响下，先后宣布武装起义。同年6月，中心县工委根据省工委决定，把上述各起义部队组织起来，在邵阳组建了湘中二支队。

一、在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的各部起义

1944年冬，中共地下党员龙仲同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礼取得联系后，由贵州回到湖南敌占区，开展抗日斗争，省工委任命龙仲为特派员到邵阳开展党的地下工作，1945年5月成立中共万安支部，重建“青年救国会”。1948年初即筹划开展武装起义，当时已有党员15人。1948年2月，中共湖南省工委又派党员叶苓来邵阳任《劲报》总编辑，以此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6月又派党员刘少川来《劲报》担任采访部主任。7月发展副刊部主任江鹭（女）入党，不久成立了党支部，叶苓任书记。这年下半年，又在报社发展了覃文魁、郑有理和禹问

*该文根据40余位知情者的回忆整理而成，后经原湘中二支队主要负责人龙仲、叶苓等同志定稿。

樵、尹如圭等入党(禹、尹曾于1939年入党，后脱离联系，此系第二次入党)。禹回樵后奉派回邵阳东乡团山(今邵东县团山乡一带)重建党组织。在县城教师中，先后发展了左维、李云海、肖云端、吕剑澄、吴步程等人入党；在学生中发展了莫昆州、丁锡祥、黄笃民、曾一、曾惠平为党员；在工人中发展了王哲敏等人入党。分别成立了党的教师、学生支部和工人小组。此时北大的学生党员刘劲和中山大学的学生党员伍魁元的党组织关系也由省工委转到邵阳。接着中山大学学生周泽民经该校党领导的地下组织同意，回到邵阳参加革命活动，随即入党。省工委派党员熊松、刘湘元、雷腾、雷普文来邵阳作统战工作；不久，又派李龙牧、谢翼、杨奉达等人来邵阳参加武装斗争。1948年8月，为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省工委决定成立中心县工委，统一领导邵阳地区城、乡党组织，以加强党对革命斗争的领导。中心县工委由龙仲、叶苓担任正、副书记。到1949年上半年，除已有的万安支部外，又重建了团山和金秤市(今属邵阳县)两个支部。这时全区党员总数已达120余人。他们以不同的社会身份，进行秘密工作。在城乡先后建立了“工人纠察队”、“新民主主义研究会”、“农协会”“贫农团”、“联络站”、“妇女会”、“少先队”、“青工会”，还有“音乐会”等外围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宣传解放战争形势和党的政策，把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吸引到党的周围，并组织他们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书籍和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觉悟，明确方向，认清形势，积极参加革命斗争。

1948年秋冬至1949年春，在湘中地区，继湘中一支队后，邵阳南乡莫新春、邵阳东乡李建中、张大野、尹如圭、宁瑞林等先后举行了武装起义。

莫新春起义

邵阳南乡白仓（原武冈县四望乡）乡队附莫新春和进步青年唐道光、李梦麟三人。经过充分酝酿准备，于1949年2月22日晚上，趁四望乡乡长蒋寅宾去武冈之机，由莫新春指挥起义，夺取乡警队、白仓警察所、白仓、塘田寺、五皇冲三个联保队的步枪200余支，轻机枪5挺，各式手枪40余支，子弹二万余发。他们发表了起义宣言——《告四望乡人民书》，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第九支队”，有人枪200余，编为三个中队和一个警卫队。由莫新春任支队长，唐道光任政委，李梦麟任参谋长。

白仓起义后的第三天，该部即遭到武冈、邵阳、新宁三县反动军警数百人的联合围剿。经过一个来月的英勇奋斗，取得了胜利，站住了阵脚。为了求得党的领导，他们先后派曾明洲赴桂林，唐道光走东安，李江去香港寻找党的组织。邵阳地下党负责人龙仲、叶苓得知莫部起义后，立即派莫昆洲（省立六中学生党员，白仓人）秘密回乡了解情况。根据莫昆洲的汇报，邵阳中心县工委随即决定由龙仲前往考察。莫部向龙仲汇报了部队情况，提出请派党员来部队进行领导的要求，并请示如何对待程潜派来的少将高参何畏的问题。龙仲表示：在部队接受地下党领导的前提下，可以与他们谈判，但只能“听节制，不听调遣”，以暂时取得合法地位，争取时间，加以整顿。在何畏答应上述条件之后，莫部才在一段时间内，以“邵阳警备司令部直属绥靖大队”的名义进行活动，整顿扩大队伍，开展宣传教育，培训军事，农运骨干，建立广阔的游击区。4月下旬，邵阳地下党派了莫昆洲、丁锡祥、黄笃民、曾惠平四人（均系省立六中党小组成员）到莫部工作，以加强领导。5月初，又派何牧（陈禾力）去莫部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发展了莫新春、唐道光、曾明洲、李梦麟、张必烈、唐南华等人为团

员，正式成立团支部，推选曾明洲为书记，在党支部未建立以前，团支部实际上成了莫部的领导核心。6月上旬，在邵阳发展了曾明洲、李梦麟、张必烈（原属金秤支部，此是第二次入党）为党员，在叶苓主持下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由曾明洲任支部书记。接着又派地下党员谢翼、杨奉达和进步学生肖中楚等人去莫部工作。6月16日，这支部队又一次遭国民党197师589团的突然袭击。正当莫部调集各中队准备还击时，敌人即逃离了白仓。此时，邵阳中心县工委又派林大伟（江鹭）、刘少川、覃文魁、张杰、郑有理（均系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唐铿、左都伟等10余人第三批去莫部加强领导力量。

林大伟、刘少川、覃文魁等抵莫部后，根据邵阳中心县工委指示，成立正式党支部，林大伟任书记。随即对部队进行整顿，清除个别不纯分子，处决了通敌叛变的李明俊（原一中队队长），取消了“邵阳警备司令部直属绥靖大队”名称，公布了中心县工委授予的“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二支队三团”的番号（7月1日对外打旗），宣布组织建制并调整领导成员：将原十一个中队改编为七个中队和一个警卫侦察队（手枪队）。团部设政治处、武工队、军需处和副官联络处等机构。全团下辖第四、五两个大队和一个直属中队，每个大队各辖三个中队，部队从分队以上多数配备党员负责政治工作，林大伟任政委，曾明洲任副政委，莫新春任团长，李梦麟任副团长，吕基贤任团附，唐道光任政治处主任，刘少川任武工队队长，何水源任军需主任，唐春节任副官主任，谢翼、张必烈分任四、五大队教导员，莫昆洲、覃文魁、丁锡祥、黄笃民、张杰等分任中队指导员，唐运蓬、唐健吾、莫书卿和左都伟等也先后担任过中队指导员。部队整编后，更广泛地开展了政治宣传工作，不断加强党组织建设（到邵阳解放时三团共有党员30余人）。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都有明显提高。

李建中起义

1948年秋，邵阳东乡万安乡进步青年李建中，从香港运德学院学习回到家乡，秘密串联了龙周武、赵保生、赵益祥等14人，准备武装起义。

1949年2月26日，李建中率领21人一举夺取了万安靖台两个乡公所长短枪110余支，轻机枪一挺，花机枪两支，手榴弹数十枚，子弹近万发，他们将起义部队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湘中支队”，李建中任司令员兼政委，曾子建（赵画强）任副司令员。起义后，由于内外压力，部队一时处于离析状态，在这关键时刻，万安支部立即派龙成伯（总支书记）、赵锡生（总支委员）、王启山（赵赞魁）、刘茫（龙隅）、左邱（羊知非）、李平（赵蕊芳）、胡平（赵伯云）、胡紫（陈求崧）等地下党员进入李部，同时动员一批贫农团员和少先队员入队，并对部队进行整编，由龙仲任政委，王林任副政委，李建中任司令员，曾子建任副司令员，下辖三个中队，成立了党支部，王启山任书记，从此这支队伍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整顿和开展政治教育，军事训练，迅速得到提高和发展。

张大野起义

1948年冬，邵阳东乡陆枝（张立吾）、彭俊文、胡铮、张大野（张秋岩）、姜牧军筹划武装起义，联络邵阳王佐、王导等参加。1949年2月，张大野、胡铮去香港与中共华南局取得联系，张、胡回乡后于清明节由陆枝、王佐率领20余人凭3支枪夺取了邵阳四明山警察所的全部武装，有长短枪50余支，机枪两挺及全部弹药，在归途中又缴获了正在鸣枪扫墓的邵阳某乡乡长曾金成的短枪数支。部队迅速扩大到80余人，宣布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祁邵衡纵队”，暂编一个大队，下辖三个中队。5月，该部扩大到120余人枪。由于思想不统一，王佐率邵阳战士回祁东活动，张大野，陆枝率邵阳战士回东乡活动，

并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第三支队”由张大野任司令员，李燕任副司令员，陆枝任政委，石楚(姜牧军)任副政委。后与原在东乡活动的李建中部取得了联系，采取联合行动，部队又进一步扩充到一百七八十人。随后，接受了邵阳地下党的领导，起义部队改编为湘中二支队第三大队，下辖三个中队和一个直属手枪队。部队得到迅速发展。

尹如圭起义

邵阳东乡尹如圭，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与党失去联系，1948年5月，在邵阳《劲报》社经地下党组织批准重新入党。次年春，尹如圭遵照邵阳地下党组织的决定，回到家乡团山，准备将其父尹伊仲（先觉）控制的第三防剿指挥部所属部队夺取过来。这支300余人的武装，成份十分复杂。为了改造好这支武装，3月初，邵阳地下党先后派党员何牧、刘陶畅（刘劲）、李龙牧去该部工作。4月，吸收了王正直入党，建立了党小组，开展了政治思想和军事训练，使这支武装基本上掌握在尹如圭手中。6月下旬，湘中二支队组建后，该部正式脱离了尹伊仲控制，参加了武装起义。

宁瑞林起义

1949年4月，从湖南大学回乡（邵阳东乡仁风乡）的学生宁同魁与羊敬德、李儒超、宁振华等人，策动在当地有一定影响的宁瑞林利用本乡的地方势力起义，赶走了外乡人——仁风乡乡长曾沛卿，由宁瑞林出任仁风乡乡长，掌握乡自卫队的武装。不久，宁同魁等人即同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5月初，王林陪同龙仲找到宁瑞林、宁同魁等，在尹和公祠商谈，确定了仁风乡自卫队武装起义的计划，同意宁瑞林任大队长，这支即将诞生的游击队一开始就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6月24日，经过周密策划，由宁瑞林率领乡自卫队、进步青年及当地农民组成的队伍（70余人），缴了当地地主恶霸

刘化育等人的武装，在野鸡坪宣布起义。6月底，湘中二支队司令部将宁瑞林起义部队编为第七大队，任命宁瑞林为大队长，宁同魁为副大队长。随后调原二大队教导员何牧任教导员，下辖三个中队，羊春秋、李儒超、羊敬德分任指导员，宁文彬、林良玉、宁纯正分任中队长，这支部队很快发展到120余人，与正在仁风乡高桥会师的尹（尹如圭）、李（李建中）、张（张大野）部汇合，参与攻打地方反动武装张极恒部，后遵照司令部分散活动的部署，一直在祁、邵边境一带活动。

二、湘中二支队的组建和调整

邵阳中心县工委是1948年8月初成立的，以龙仲、叶苓为正副书记。它的主要任务是：配合解放战争，领导各起义部队走向正确道路，举行全区性的武装起义；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统一战线和策反工作，积极进行护厂护校，维护社会治安，迎接邵阳解放。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后，直逼湖南。国民党顽固派白崇禧妄图把他的桂系部队撤回广西老巢，湖南是必经之路。他为了不让退路被截断，一方面用重兵威胁控制程潜部队，阻止湖南和平解放，另一方面妄图破坏地下党组织及其武装力量。他派了大批特务和宪兵团到长沙，并伸向湖南各地，制造白色恐怖。为了配合主力彻底消灭白崇禧逃部，和平解放湖南，1949年5月上旬，省工委在长沙秘密召开关于组织武装斗争，截断白匪退路，配合大军解放湖南的会议。邵阳地下党派李云涛赴会。李云涛向省工委汇报了邵阳地下党和武装斗争的情况。省工委决定在邵阳成立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二支队，简称“湘中二支队”，并确定了正副司令，正副政委的人选，各大队干部由中心县委决定，起义时间在“七一”前后。

邵阳中心县工委根据省工委关于武装起义的指示，决定将

莫新春、李建中、张大野、尹如圭、宁瑞林武装起义部队合编为“湘中二支队”，建立司令部和政治部，任命尹如圭为司令员，王正直为副司令员；龙仲为政委，叶苓为副政委；李龙牧为政治部主任，李云涛为政治部副主任。

支队辖五个大队，一个武工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李建中，教导员胡紫；第二大队大队长尹如圭（兼），教导员何牧；第三大队大队长张大野，教导员王家栋，副大队长陆枝；第七大队大队长宁瑞林，教导员何牧（二大队建制撤销后调七大队），副大队长宁同魁；大队武工队队长李云涛（兼），副队长王林。第四、五大队合编为三团，团长莫新春，副团长李梦麟，政委林大伟，副政委曾明洲，政治处主任唐道光，武工队队长刘少川；第四大队长李江，教导员谢翼；第五大队大队长唐南华，教导员张必烈。

中心县工委在安排上述人事的同时，还作了如下战略分析和部署：

关于武装斗争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有利条件：一是百万大军渡过长江，全国胜利在望；二是群众斗争情绪普遍高涨；三是党在邵阳东乡有了一定的武装基础和群众基础。但不利因素也存在：第一，反动军队麇集湘中，敌我力量悬殊；第二，我们武装斗争的地区处于衡宝、潭宝两条公路沿线，地形于我十分不利，加之邵阳又是湘桂铁路的侧翼，白崇禧必重兵坚守；第三，农村正处于青黄不接之际，部队给养困难。根据以上分析，做出如下部署：决定以公路较远的邵阳四望山为根据地，三团在武（冈）、邵（阳）边境活动；一、三、七大队在祁（阳）、邵（阳）边境活动，形成犄角之势，东北面受到压迫，可向西南面转移；二大队随司令部作机动力量；粮食取之于国民党的赋谷和大户的粮仓；支队领导机构设于地势重要的东乡，以利指挥作战。同时对城市、农村的工作也做了通盘考虑，决定从

部队的党员中抽调龙成伯、左邱、赵赐生、赵刚等去做地方工作，调王林去组建武工队，使地方党组织有力地协助各起义部队开展广泛深入的武装斗争。

1949年6月26日，部队在邵阳东乡火厂坪赵宾公祠集合，宣布“湘中二支队”正式成立。从此各起义部队，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在全区开展武装斗争，声势浩大，威震湘中。

湘中二支队组建约一个月后，支队司令员尹如圭不幸牺牲，第二大队因曾国华叛变而处境困难；副司令王正直、政治部主任李龙牧设法脱险抵长沙；龙仲因赴衡阳处理李建元部内部纠纷，在途中被捕，于是省工委于8月初派刘寿祺来到邵阳，一面设法营救龙仲出狱，一面协助调整湘中二支队领导成员和建制。经省工委和中心县工委研究决定，重新调整如下：

司令员兼政委叶苓，副司令员张大野，参谋长李建中，政治部主任李云涛，支队武工队队长李云涛（兼），副队长王林（实际负责全盘工作）。

支队下辖三个大队（一、三、七大队）和一个团（三团），撤销第二大队建制。第一大队大队长李建中（兼），教导员胡紫；第三大队大队长陆枝，教导员王家栋；第七大队大队长宁同魁，教导员何牧；三团团团长莫新春，副团长李梦麟，政委林大伟，副政委曾明渊，政治处主任唐道光；第四大队大队长李江，教导员谢翼；第五大队大队长唐南华，教导员张必烈，武工队队长刘少川。

领导机构调整以后，认真总结前段的经验教训，对部队的现状作了具体分析，对今后战斗任务作了部署。通过调整，加强了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使部队的素质有了明显提高，战斗力得到相应加强，部队很快发展到1400余人。

三、主要战斗和重大事件

收拢和打击反动武装

1、三团从1949年2月起义后至6月，采取了军事行动和政治攻势，先后收纳了双清、古峰、金龙、长乐、唯一、紫云六个乡公所及警察所、地主、土匪的武装。全团共有长短枪700多支，轻机枪14挺，建立了以白仓为中心，纵横百余里的游击区，经受了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反动武装一、二、三次疯狂“围剿”。

2、同年5月，国民党交警第十六总队长、军统特务头子刘直英从邵阳窜来白仓，对莫部进行利诱和恫吓，刘自称在雪峰山区成立一支美械部队，诱莫部撤离白仓前去参加，并许以一个团的装备，否则，国民党要派大部队前来围剿。莫部领导针对敌人调虎离山企图消灭起义部队的阴谋，将计就计，表示愿考虑其意见，并派联络副官王京芳随同赴邵商定部队开往雪峰山区的行军路线，以麻痹敌人，另派李江率领侦察战士6名，预伏在刘直英的归途要地七里山，待刘行至该地，侦察战士出其不意将其击毙，还将他事先派在白仓潜伏的两个特务处决。

3、尹如圭直接领导的第二大队起义后，即按原定计划，扫除东乡地主武装。6月26日，大队到达中二乡边境，即分二路出击，中一乡的恶霸地主罗彪闻风携枪而逃，中二乡的枪枝全部被缴，共有长短枪40余支，内有重机枪1挺。首战告捷，军威大振，给地方的反动势力以致命的打击。

4、7月，三大队在三都铺附近的天子山与国民党匪军谢鹏飞部打了一次遭遇战，毙敌3人，伤数人，7月底，手枪队去收缴亲睦乡枪枝时，又与敌胡惕部在霞光岭遭遇，激战一小时，重挫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5、正当白匪对我部实行全面围剿时，东乡万安乡境内土匪日益增多，特别是廉桥、黄陂桥一带更为猖獗，土匪彭春萱趁机从山门乡回廉桥活动，并得到反动士绅、保长彭光廉的支持，胡作非为，扰乱社会治安。为镇压这一嚣张气焰，一大队第三中队进行了侦捕，首先在长冲坪抓住了黑四胡子（系彭春

常一伙的)等两名土匪,就地枪决了。随后,又在彭家祠堂抓捕了彭春萱,紧接着又抓捕了彭光廉,经审讯后,将其枪毙于周官桥边,并以司令部的名义列罪七条布告示众。9月26日,三大队张杰先率领手枪队,从渡头桥返回桵木山游击区时,在途中发现匪军一个中队正在抢劫,便在晏冲给予突然袭击,打死匪中队长1人,伤匪兵数人,缴获长短枪20余支。

6、5月,民盟邵阳支部刘善夫派人到敌100军策反,拉出了一支三四十人枪的队伍,主动与宁瑞林联系,表示愿将这支队伍交给宁部节制。经龙仲、叶苓同意,由宁部派人到叶家冲接洽。当时民盟已不能控制这支队伍,被廖宝成的儿子廖树人带到皇帝岭、双板桥一带成了游散股匪,在那里拦路抢掠,危害百姓,群众纷纷前来控诉。宁部多次与他们交涉,毫无成效。最后决定以智谋解决。宁部请他们前来谈判,事先把部队埋伏在要道上,然后杀猪设宴表示慰劳。敌连长马××有所戒备,在酒席上,手持拉下撞机的冲锋枪,面对宁瑞林,手指不离扳机;宁达安左手抱着水烟壶,借找火吸烟为名,绕到马连长的背后,乘其不备,将他一把搂住,并卡住撞机,事先等候在门外的宁宝云,一个箭步窜过去,以迅雷之势解除了马的武装。同时宁文彬、林良玉、宁纯芷率领几个分队长缴了其余人的枪。该部人枪30余,愿干的编入部队,不愿干的资遣回家。

攻取张极垣匪部

尹如圭率部扫除中一、中二乡地主武装后,部队随即在中二乡集合,又开往仁风乡高桥与相约在那里等候的李建中、张大野、宁瑞林部会师,沿途开仓济贫,散发传单,受到群众热烈拥护,部队在雨中行军,道路泥泞,农民纷纷担煤渣铺路,晚间持火把迎送,情绪十分高涨。

7月1日清晨,司令部集中大部分兵力围攻张极垣部,张极垣驻扎在两市塘附近的坝上张家,有100余人枪,张极垣守

在祠堂里负隅顽抗，我部攻打一个上午未克，发现敌军增援，部队不得不迅速转移，这一仗不仅没有吃掉张极垣，我部反而伤了1人。司令部总结了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又得知敌人陆续增兵对我部进行围剿，于是改变了到四望山建立根据地，与三团连成一片的原定计划，决定第七大队留守仁风乡，第三大队撤回桤木山、仙槎桥一带，第一大队重回万安乡，司令部和第二大队前往团山，待取得给养后再作决定。

尹如圭壮烈牺牲

在攻打张极垣匪部的战斗失利之后，按照司令部的决定，尹如圭率领第二大队转移到了太一乡团山，尚未站住脚跟，敌人就开始“围剿”了。这次“围剿”的指挥人是专员丁廉。他动用了两个保安团，三个警察大队以及陈琦、匡国军、张极垣、邓杰、谢鹏飞等地方土匪部队共5000余人，十倍于我，分三路向我袭来。在进攻一、三、七大队扑空以后，又集中兵力围剿第二大队。面对敌人猖狂进攻，司令部在军事上又作了新的部署：一方面，从二大队派出六个游击小组，绕到敌人的两侧，进行骚扰，以拖延敌人的进攻，另一方面，将二大队主力向邵阳、湘乡边境转移，避免和敌人正面作战，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当二大队主力转移到湘乡边境时，狡猾的敌人已占领了邵阳太一乡乡公所所在地团山，与我部相距15华里，其后续部队由万安乡经流光岭源源开往团山。7月7日晚，为阻截敌人的后续部队，二大队组织了一支100人的突击队，埋伏在敌人行军通道两旁，由于有些战士缺乏战斗经验，一见少数敌人就先开枪射击，当敌人还击时，又乱了阵脚，因而不得不迅速撤退。此时，敌人已分三路向驻在团山的司令部发起进攻。拂晓，部队在返回途中，得知敌人分几路正在攻打团山，随即折回衡邵边境。第二天，得悉司令部的留守人员、武器、资财被

敌人虏劫。此时司令部决定将二大队转移至衡宝路以南，留一个中队在路北打游击。11日上午，部队正准备通过水东江时，即与敌军遭遇，一部分冲过水东江到达路南，一部分过不了江留在路北。司令部针对这种情况，召开紧急会议，部署行动，会上有两种不同意见：大多数同志主张化整为零，另一部分同志主张适当分散，保持一部分主力。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当场决定将部队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在太一乡与湘乡边境活动；一部分在太一、太二乡之间活动；一部分在太二乡与卫东乡之间活动。由叶苓、尹如圭率领的一个中队回到太一乡和湘乡边境隐蔽了四天。当时，反动派的围剿部队几乎全部集中在太一乡境内，这个中队孤立无援，处境艰险，尹、叶决定将部队转移到万安乡与一大队会合。在此同时，一、三、七大队也受到围剿，三大队化整为零，开展游击战。一大队凭熟悉的地形和较好的群众基础穿梭于祁、邵、衡边境，与敌人周旋。

7月20日黄昏。尹如圭、叶苓把二大队的一个中队集合起来，下半夜开始急行军，行至一个峡谷地段时，当尖兵组通过后，突然响起枪声，部队遭到敌人伏击。叶苓突围逃出，腿负重伤。尹如圭因右脚受伤被俘，在廉桥附近六合亭遭敌人杀害，将首级悬挂在邵阳县政府门前“示众”3天，敌人惨无人道的暴行，更加激发了湘中二支队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无比愤恨。

七大队重整旗鼓

1949年7月，七大队在仁风乡遭到敌人的全面围剿，迫使部队化整为零，宁瑞林带领一支队伍来到东土庵，何牧、林良玉率领一支队伍驻东土庵附近，宁同魁率领一支队伍驻在下张家冲，形成犄角之势，以便互相策应。一天晚上，宁瑞林悄悄地回到他的老家庆余堂，被坏人向“剿指”刘京华部告了密，当晚刘匪串同匪部星夜赶来包围了宁瑞林的住宅，宁瑞林被捕交

节，交出机枪1挺，长短枪10余支，此后，敌人更加疯狂了，七大队的战士、家属横遭搜捕、拘禁和杀害，战士刘香生在大坝附近被捕，在简家龙惨遭杀害；宁同魁的父亲宁银臣被白匪抓去，受到严刑拷打，敌人逼他写信要宁同魁交枪，他严词拒绝，险遭杀害。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七大队的何牧、宁同魁、林良玉、羊春秋、羊敬德等10余人在羊家冲背后的一个庵堂里召开紧急会议，一致提出要重整旗鼓，坚决与敌人奋战到底。公推宁同魁为大队长，林良玉为副大队长，并报请司令部获得批准。随即把隐藏的枪支转移到宁夔公祠附近。同时通知各中队把枪支起出。第二晚到猪楼街宁绍公祠集合，人枪50余，当晚向皇帝岭、铜子冲一带挺进，其他分散人员又陆续赶到。一直坚持在祁邵边缘地区进行游击活动。

王家栋英勇就义

1949年8月下旬，第三大队奉命化整为零。一天，情报员陪同莫良弟送来一封信给大队部，其内容是：请部队派人和陈清华联系祁阳洪桥一支武装起义问题，就在这天晚上，教导员王家栋带领杨福绥、赵胜魁等人前赴祁阳洪桥。张极垣匪部事先从刘得禄（原系土匪小头目，后混入部队，解放后被处决）口中掌握了这一行动情况，预先命朱子贤等匪徒在其必经之路设伏，进行突然袭击。王家栋被捕，被惨杀于仙槎桥。

反击白匪重兵围剿

8月中旬，我解放大军分两路向邵阳推进，东路已达湘乡青树坪邵阳东乡界岭一带，西路已进抵邵阳至新化公路的龙溪铺一带。这时，白崇禧部队已全部撤至衡宝地区，负隅顽抗。白匪为拔除后撤交通线上的障碍，乃下令对湘中二支队进行全面围剿，时间达50多天。白匪每到一地，就清乡、查户口、捉我部干部、战士的亲属，妄想截断群众和部队的联系，在行动上极其诡谲，昼伏夜出，分股搜索。而对这种险恶局势，司令

部立即决定：一、三、七大队化整为零，组成若干精干的短枪队，声东击西，分散战斗，不断袭击敌人的交通线，镇压为虎作伥的恶霸地主，同时指示三团，对敌作战要从战略全局出发，以保存自己的力量为主，避免同敌人决战，要紧密配合衡宝战役，把来犯之敌全部牵制在游击区，协同大军解放邵阳和武冈两个县城。

8月9日，桂军廖辉团从塘田寺分两路向三团驻地发起总攻，中队长唐贵元英勇牺牲。为保存力量，部队化整为零，分区活动，并轮流派小股部队袭击敌人，加强情报工作，采取游击战术，使敌人无法围剿三团主力。

在对我部进行“围剿”中，敌人又收买当地流氓和地主走狗刺探情报和带路，四处搜捕三团人员，同时在许多地方张贴布告，悬赏收买三团几个主要负责人的头颅。以莫菊垣为首的恶霸地主公开出面成立所谓“善后维持委员会”，胁迫三团指战员亲属劝其亲人脱离部队。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三团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奋起还击，首先镇压了那些敢于公开与我为敌的穷凶极恶的反动分子。在一夜之间，就处决了唐有虞、唐禹华、谢青云、莫福庆四个恶霸地主和一个保长，重挫反动气焰。

当我解放大军摧毁敌人的衡宝防线时，三团又全力以赴，阻截向广西溃逃之敌。在塘田寺、杨田、陈士垅、柳山和一渡水等地截击敌人，战斗中共俘敌官兵100余名，缴获各种枪枝60余支及美制无线电台一部。

三团在将近两个月的反围剿中，虽因敌我力量悬殊，没有把敌人消灭或击溃，但敌人的两个正规团，两个地方自卫总队，一个自卫大队的兵力，在衡宝战役中，始终被我部牵制住，为配合解放大军向西南方向进军，起了一定的作用。

支援大军过境

9月下旬，我解放大军以雷霆万钧之势突破白崇禧防线。敌军土崩瓦解，纷纷逃窜，支队司令部迅速集合部队，有力地配合大军解放了邵阳、武冈两个县城。

10月5日晚，获悉衡阳金兰市驻有大批敌军，有可能转向邵阳撤退。6日清晨，一大队集合三个中队开往火厂坪履视亭山坳上，准备截击敌人。上午10时许，一辆载有敌人的卡车向邵阳方向开来，遭到我部伏击，敌人跳下车仓惶逃跑，在我部追击之下，抓获三人，经审问是白军第七军的。当天下午黄昏时，我部会见了北平支队指挥部的负责同志，得知大军的主要任务是快速迂回前进，直插湘桂铁路线，包抄歼敌于衡宝公路南端。我部向大军提供了敌情，派了20多名战士为大军带路，担任向导。

大军一到，我部指战员欢喜若狂，10月7日，部队进驻周官桥，司令部召开会议，要求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支前工作，备粮备鞋，迎接大军过境，人群似海，送茶送水，送鞋送蛋，手举红旗，敲锣打鼓，一片欢腾。

四、党的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

开展政治宣传工作

湘中二支队十分重视党的政治工作、宣传工作和群众工作。在宣布起义前(即6月中旬)，就决定成立武工队，主要开展游击区的群众工作和加强各起义部队的政治思想建设。支队部武工队成立以来，主办了四期培训班，为各起义部队培训了80余名干部，以加强起义部队的领导。此外，还编印各种油印刊物，开展宣传鼓动，如自编的《解放军报》专门报导从电台收到的解放军的胜利消息。每期成批油印，由武工队分发各地。还印发了《约法八条》等大型布告，遍布邵阳、衡阳城乡。武工队还到部队和驻地附近做宣传组织工作，上政治文化

课，组织地下农会，开展减租运动。三团在未编入二支队前，为了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和培训农运骨干，巩固游击区，在白仓何家祠堂举办了两期农运班和一个军事骨干班。同时在白仓建立了乡人民政府。还编印了《广播简讯》，转载新华社播发的重要消息、文章、社论等，每期800份分送各中队游击区内的学校、团体及友邻部队。1949年6月，三团还以武工队为主，组织领导“燎原社”“新民社”和四望乡的进步青年数十人，编成了四个宣传队，分赴四望、双清、古锋等乡开展宣传活动，协助组织农民运动，减租减息，开仓济贫，解决农民夏荒（粮食）困难，宣传党对解放区的十大政策。通过政治宣传，密切了党和部队及群众的关系。支队司令部经常联系实际向指战员进行思想、形势教育，组织他们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以及解放区关于“减租减息”游击战争之类的书籍，使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不断得到提高，政治素质有根本的改善。从而增强了战胜困难和革命必胜的信心。

严格革命纪律

各起义部队之所以能不断开展壮大，根本的一条在于他们能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人民群众的利益秋毫无犯，紧紧地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对那些违法乱纪者，都要严于纪律制裁。如李建中部起义后，出身地主成份的赵显卿因偷老乡的一支玉石钏子，就被清出队伍；一名临阵脱逃，敲诈老百姓，一名奸污少女的，都被处决了。张大野部起义后，发生一个司务长强奸妇女的事件，当即打军棍五十，驱逐出队，部队领导亲自向受害者与其家属赔礼道歉。6月初，七大队情报员宁湘南在简家陇拿了老乡的水烟壶及其它物品，还有一个土匪，冒充我部战士拿着一支假枪，拦路抢劫，被侦察兵捕获，通过临时法庭审理，都予以处决。整个部队军纪肃

然，人心大快，深受群众的拥护和赞扬。部队还具体规定，行军驻扎，决不进妇女的卧室，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照价赔偿。有一次，三大队一个炊事员借了老百姓一把菜刀，忘记退还，部队开出好几里地又返回驻地将刀还给原主。部队每到一个地方，还帮助老百姓挑水、挖土、车水、抗旱、救灾及调解民事纠纷等，深受群众的拥护，老百姓把起义部队看成是自己的队伍，有的宁愿受敌人的毒打，也不肯把敌人带进起义部队驻地，有的不顾个人生命和家庭危险，日日夜夜为部队带路，有的发现了敌情，不怕走几十里路来为部队报信，晚上行军，沿途群众把灯光放在路旁，把茶水放在门口，有些妇女还主动为部队洗补衣服。军民逐步建立了鱼水关系。

加强统一战线工作

邵阳地下党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进行大量的宣传教育和策反工作，使很多统战和策反对象弃暗投明，增强了对敌斗争的力量。永宝警备司令魏镇，副司令宋涛，积极参加和平起义，他们曾两次营救中心县工委书记龙仲出狱，对邵阳地下党的工作起了一定的掩护作用。1949年7月，邵阳和平起义夭折，宋涛带30多人枪辗转来到邵阳东乡与地下党领导的二支队会合。邵阳警察大队分队长匡松于同年农历八月中旬率领40余人枪举行起义，而匡松年迈的父亲，妻子（已怀孕五个月）一家三代被敌人枪杀于大祥坪。又如县田粮处处长唐典、绥靖公署的机要秘书、军统特务艾雨军等都是经过争取而投诚或起义的。

城市党支部通过“新民主主义研究会”的会员，广泛联系各个方面的人士，共同作好迎解工作，首先发动各中学校长，做好护校工作，教学秩序正常，城市中学校长除一人逃跑外，其余都坚守岗位，直到解放。工人党员王哲敏根据中心县工委的指示，在工业示范组开展护厂工作，组织“工人纠察队”保护

了国家财产和重要文书档案。

各起义部队由于加强了统战策反工作，壮大了部队力量。如李建中部起义后，党组织研究，决定动员曾任过乡公所自卫队队长，有可能获得县政府任命的赵敏仲任万安乡乡长，以建立两面政权。他一上任，就将原乡公所收藏的15支步枪交给游击队；敌人把指战员的家属抓去后，他出面与敌人周旋处理；敌人来围剿时，他坚守岗位，设法应付敌人。他还以乡公所的名义收缴了一些地主、乡绅的私藏枪支；白崇禧下令围剿二支队前夕，赵即将乡公所的长、短枪十余支交来我部。三大队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动员姜端夫（泽非）把保厘乡公所的枪枝交给了起义部队，人员全部投诚。凡不愿参加起义部队的，每人发银元二块，资遣回家。三团还与东安的唐生智，新宁的徐君虎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唐、徐主动支援过三团枪枝和粮食。

开展支前迎解工作

邵阳地下党组织，为了发展地下武装斗争，开展支前迎解工作，先后在邵阳东乡长冲坪、乐福亭、检塘冲、光山坪、陈家坝，棠下桥成立了“贫农团”、“青工会”、“妇女会”、“少先队”等组织，共发展贫农团员200多人。1948年3月，又在万安乡第九保校建立了邵阳东乡团支部，积极开展工作，到邵阳解放时共发展团员40余人。这些外围组织，采取多种形式发动群众，后来，外围组织的成员一部分进入了部队，一部分成了地方工作骨干。

“湘中二支队”建立后，党组织立即决定成立总联络站，配有联络员，下设长冲坪、乐福亭、检塘冲，第九保校、赵氏育英学校、光山坪六个联络站。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转递情报，护送伤员，负责与省、县及有关部队的联系。

开仓济贫

各起义部队每到一个地方，都能紧紧地和人民群众站在一

起。为人民群众解决困难，深受群众拥护。1949年邵阳遭到水灾，李建中起义部队先后两次开往古奇洞打开大地主粮仓，将1500石谷子散发给农民。后又相继打开容家田塘的粮仓、白马冲肖家大院的地主粮仓、仙槎桥（配合张大野部）、龙公桥、乌龙岩陆公祠的粮仓，将5100石稻谷分给农民。张大野部先后将青山桥、仙槎桥、容家田塘粮仓打开，把几十万斤谷子分给农民，对那些孤寡老弱则派战士把谷送到他们家里。七大队又相继在柏桂祠、崇德堂、三公祠、荷公殿、羊家冲、陶家庄、井头村等地，打开国民党政府的军粮仓，发谷济贫。三团在邵阳南乡也积极开展济民工作，支援农民度过灾荒，农民欢天喜地，称三团为土八路，在敌人“围剿”时，许多农妇烧香拜佛，祝愿三团胜利。广大的贫苦人民称赞我部是为穷苦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部队。

五、部队整编和整编后的活动

1949年10月10日邵阳解放后，二支队与大军会师，部队奉命整编。一、三、七三个大队集合于两市塘，开往邵阳城郊兴隆坳改编为湖南省军区独立十六团，三团奉命开赴武冈城，改编为省军区独立十七团。龙仲、莫新春、李建中、张大野、胡紫、何牧、王启山等在部队分别担任各级领导。叶苓等分别在地方工作。部队整编后，十六团在龙山（新邵）担任剿匪任务，十七团在武冈担任城防任务，派出大部分兵力配合主力部队进行剿匪战斗。这段时间隆回县长、土匪头子陈光中被俘获镇压；作恶几十年的惯匪头子张云卿被消灭于高沙一个岩洞里，大土匪何建国被抓获镇压；彻底肃清了国民党军、潘树堂顽匪。帮助地方建立起区、乡人民政府。圆满地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历史使命。

【责任编辑 朴永子】

湘中一支队第三团地下斗争概况

封岐山*

1948年春,熊邵安到安化担任中共安化地下党负责人,以安化县立师范学校教导主任的合法身份进行革命活动。当时安化县长、自卫团团长姚协中经地下党员周建候的介绍与熊邵安会面,经过商讨,决定策动安化自卫团武装起义,由姚协中负责策反工作。他首先争取了副团长张甫成,然后以年终总结为名分别召集各级干部开会,作策反工作,大部分同志都同意,并同时又将个别态度不够明朗的调离了职务,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策反任务基本完成,从此安化自卫团基本上成为安化地下党所控制的一支地下武装了。他们收缴法院枪支,夜袭田心仓库,打入敌特机关监视敌特活动,处决内部叛徒,策应了宁乡起义部队,参加了剿灭尹立言匪部战役,迎接大军南下,并参加衡宝战役,完成了历史使命。

1948年12月27日,姚协中到蓝田支持长沙学生对山东烟台流亡中学的宣传,此举触怒了国民党湖南省警务处长桂某,姚协中被撤了职。新任县长晏忠承于1949年1月21日接任。他一到任就免除了原安化县政府工作人员20余人。我当时是自卫团参谋主任。县政府秘书周建候(中共地下党员)暗地授意我组织所有被免人员质问新县长。我同刘治华(原县政府秘书,被撤职)串联组织被免人员结队前往县政府质问晏县长。晏避不见面,我们砸烂了县政府桌椅门窗,切断了交通电讯,打进了县长室,晏只得越墙逃跑。周建候以秘书名义,组织了一些

*封岐山起义前任安化县自卫团参谋主任,起义后任湘中一支队三团参谋主任兼第三大队大队长。

人出面调解，最后达成了协议：1.被撤职人员愿意复职的一律复职；2.县内武装部队人员不得更换；3.此次事件不得上报，如果省里来人过问应由晏负一切责任。此举为安化自卫团武装起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49年春节期间，特务头子曹伟修（公开职务是安化法院院长）在他的同伙龙廉家以请春酒为名，秘密召开会议，企图暗杀我地下党负责人和起义团领导人，散会后，应邀出席会议的蒋渠（策反人员）立即告诉了地下党负责人，经商量决定，由起义团派兵捉拿曹伟修一伙，曹伟修等人闻风逃匿，我们把法院警察的30余支枪以及弹药全部没收。

不久，我们又袭击离安化城西约20余里的湘宁师管区仓库，缴获弹药十几箱，军服几百套。

我们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的注意。1949年3月，国民党特务、少将军官魏显斌率另外两个特务来安化，成立了安化军警联合稽查处，企图破坏我地下党组织。为了对付这群特务，经地下党组织决定，派我率夏公民等三名侦察员，打入该军警联合稽查处，我以自卫团参谋主任身份兼任该处稽查组长，派进去的三名侦察员，名义上是帮助他们解决人地生疏的困难，实际上是一个跟踪一个，监视他们的活动。在我们的严密监视下，他们无法开展破坏活动，只好偷偷地溜走了。此时，团部直属连连长姚连均，由于革命意志不稳，竟与特务张润和秘密勾结，阴谋组织所谓“安化青年反共救国军”，密谋杀害我地下党和起义团的负责人。他不仅在茅田铺一带抢劫，还把手枪借给散匪们行劫，幸而地下党和起义团及时发现，决定处决姚连均，又恐姚的同伙起来反抗，使起义队伍遭到不应有的损失，于是议定先调姚的连队出城外演习，后通知姚连均到团部开会，姚一到团部就立即被处决。纯洁了革命队伍。

1949年春节期间，我们为了与宁乡的姜亚勋部取得联系，

主动派熊启凡前往姜部联系。此时，国民党湖南省第五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胡维尘正调两个安化团围剿姜部，并密命安化自卫团“围剿姜匪”，堵其逃往安化之退路。得此情报，安化地下党和起义团商定对策：①由熊启凡率一个精锐便衣队渗入姜部支援；②起义团驻县城的一个营开赴沩山司徒巷一带，名为堵击，实则支援掩护，蓝田营两个中队占领九里山作掩护。③如能战，我便衣队应奋力支援，否则要姜部尽快向安化司徒铺方向靠近，我驻司徒铺部队以朝天开枪为信号，掩护姜部退入安化，熊邵安亲到司徒铺指挥。这时起义团干部纷纷要求打出革命旗帜一同作战，熊邵安本着省工委指示，认为时机未到，暂时还是隐蔽斗争为好。结果姜部因没有与地下党联系，对我部抱怀疑态度，谢绝了我们的支援，姜部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没有靠近安化而化整为零了。

1949年6月下旬，我团集中在清塘铺整训待命，自称拥有三个军的“西南联军”总司令尹立言有3000多人，2000余枝枪，另有82迫击炮2门，由湘乡与保安团蒋麒生勾结后窜入安化伏口红仙洞一带，奸淫掳抢，无所不为，地下党组织曾派姚协中前往劝降没有成功，6月22日继又派我前往说降，并拟定条件是：①立即停止一切军事活动，听候整编。②整编后立足于生活艰苦的基础上供给由我们负责。③整编时军事人员基本不动，但得接受我党分派的政治人员的领导。当我将上述条件向尹立言、王一致、龙卓湘等提出时，他们拒不接受。据此我地下党决定坚决消灭这股匪军。当时的部署是：一团姜应中打左翼，二团张昼荣打右翼，我起义团为正面进攻，五团聂昭良于湘乡小碧桥方向堵击。6月23日当我团强攻红仙洞匪军司令部时，匪军已逃往温塘并占领凤凰岭高地。我团急追到温塘，因天已黑，便原地待命。

24日，部队正要发起进攻时，第三营营长李建中推说有病

不能出击，团领导当即命令我兼三营营长，指挥战斗。团长亲自指挥直属连占领了仅次于凤凰岭的另一制高点，配合我营进攻。中午，一些农民自动将麦子粃粃送上阵地，大大鼓舞了士气，傍晚我团拿下了凤凰岭，俘敌200余人，打死敌人20余人，活捉了该匪副司令兼补给司令龙卓湘。这次战役我团缴获82迫击炮2门，步枪200余支，弹药20余箱，战马6匹，还有很多抢来的衣物。第二天我们在七星街召开群众大会，枪毙了龙卓湘。

6月28日，湘中一支队司令员姜亚勋、政委官健平（化名章文）两同志率少数部队到梅城，本着省工委1949年5月4日关于整编湘中地区人民武装的通知，在安师坪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安化解放，随即接管安化政权，起义团正式改编为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一支队第三团，团部设直属队，下设三个大队，大队下设三个中队，中队下设三个分队，政委熊邵安，团长张甫成，副团长李建中，政治处主任姚协中，我为参谋主任仍兼第三大队大队长，通讯队长蒋渠，一大队长梁雨田，二大队长廖学文，其余大队设教导员，中队设指导员，分队有政治服务员，均由地下党安排。

安化自卫团起义，震动了湖南全省，白崇禧更是恼羞成怒，于1949年7月派遣了五个团的兵力围攻安化解放区，其中160师的两个团由益阳直攻安化县城，307师两个团由新化向安化进攻，驻宁乡一个保安团配合匪军向安化包围。根据这一情况，湘中一支队三团及地方兵团等领导，在三团团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一致认为寡不敌众，必须撤离县城，开展游击战争，用疲劳战术拖垮敌人，并选定离县城50里的芙蓉山为根据地，分兵在县城周围迂回游击，我们的对策是：①由我率吴励中队坚守芙蓉山，与邻近的地方兵团及武工队取得联系，坚守据点；②政委熊邵安率地方兵团直属队，团长张甫成率三团

直属中队与地方兵团配合分布在八铺一带相机截击八铺大路匪军；③政治处主任姚协中带夏桂秋中队进驻靠近仙柴十几里路的芙蓉山麓，袭击益阳方向的敌军，第九中队与地方兵团和武工队配合在县城周围游击扰乱驻城匪军，并相机截击出城的小股匪军。④蓝田张雄率张玉岑、常德民，在横铺岭苏柴一带随时出击八铺之敌。⑤家属及一切应用物资立即疏散。会后，各部立即行动。第二天匪军160师一个团窜入县城（团长徐淦），进城之后立即赶筑工事，龟缩在县城，不敢出城一步。我们借此机会大搞宣传，到处张贴标语，署名解放总队几团几营，地方兵团几营几连，或地方武装工作队等等，迷惑敌人；另一方面派少数部队到城郊做群众工作，劝导他们不要运菜运粮进城，断绝敌人给养，这两个办法，大见成效，匪军不得已，只得派少数匪兵下乡抢菜抢粮。有一次匪军出动一个排到栗林方向抢菜抢粮，抢得粮食10余担，强迫农民挑运进城，我部闻讯后即在匪军必经之路设伏。我们仅打了几枪，匪军便丢掉粮食向县城逃窜了。驻在县城的徐匪由于摸不清我们的实力，又加上严重的缺粮缺菜，军心惶惶，便在一个晚上摸黑倾巢向宁乡方向逃跑，政委熊邵安率地方兵团直属队在团山桥截击敌人后卫部队，因系夜间又没掌握实情，结果敌人大部队返回，包围地方兵团直属队，幸而天未大亮，突出包围，没有造成大的损失。三团团长江甫成闻讯，率分布在八铺路上的部队赶来，乘夜尾追袭击，缴获部分弹药，其余的敌军由于到处受击，一直未能到达安化县城。

1949年7月中旬，解放军先头部队来到安化，三团主动提出配合进军，当时的战斗部署是：由解放军347师直攻新化转战邵阳，三团则经蓝田，越过尖山岭，经砖塘铺，直攻邵阳，两军会师邵阳。

正当我部路过蓝田时，侦察员报告：距蓝田20多里的湘乡三角塘有白匪一个连，我命七、九两个中队沿大路两边小山搜



等行进，包围三角塘，我率警卫排正面出击，八中队随后接应，在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战斗，这次战斗缴匪军步枪、轻机枪、花机关枪80余支，60炮2门，各种弹药一批。

8月中旬的一天早晨，三团由蓝田出发行至砖塘铺与向西南逃窜的匪军七十一军的三个团遭遇，激战四五小时，我团当即登山占领有利地形，打退了匪军发起的三次进攻，打死打伤匪军30余人。恰在此时，我们接到解放军147师紧急命令，要三团火速退回安化之榛树坪，严密监视新化鸡脚岩方向的敌人。接此命令，全团迅速撤回。当我们撤到蓝田时，又与匪军三个团遭遇，为了尽快赶回榛树坪，我们且战且走，最后终于摆脱了敌人，安全到达目的地。随即派出了严密的防守岗哨，又派出侦察人员，监视敌人的行动，将近一月后，解放军大军赶到，胜利地解放了新化、邵阳，向西南进军。

长沙和平解放后，益阳军分区政委周惠、司令员黄林命令一支队集中益阳、宁乡待命，我团遵照指示于9月中旬到达了宁乡，10中旬，与三支队三团合并整编为独立二团。遵照上级指示，除少数干部留用外，大部分干部到益阳军政干校学习。至此我团圆满地完成了迎接大军南下、解放安化的武装斗争使命。

【责任编辑 朴永子】

浏阳起义前后

王 绳 祖*

1948年秋，以姜亚勋为首的“湘中一支队”在宁乡、益阳一带神出鬼没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当时，我通过身任浏阳县田赋粮食管理处处长黄卫中和宁乡县警察局长袁茂廷的关系与姜部取得了联系。1949年4月我出任浏阳县警察局局长，和黄卫中、朱高阳等人合作，于6月1日举起义旗，组建“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一支队浏阳独立团”。现将记忆所及略述如下。

秘 密 策 划

我到浏阳县警察局任职不久，县党部书记何珍吾于4月28日在浏阳田粮处召集我、黄卫中、文武雄、王今吾、黄友伦、陶柴龙、朱高阳、袁振湘、欧亚南、刘渭贤、黄涤非等人秘密集会，准备与解放军对抗，并接收孔振的领导。大家议决公推刘一诚县长为平浏司令，我为副司令，黄卫中为军需处长。浏阳组织三个大队，平江也组织三个大队，议定5月15日投靠孔振。会后，我与黄卫中商量，想利用这个机会再开一个秘密的策划会。4月29日晚上，我与黄卫中邀集周志坚、杨辉泉、文武雄、何子庭、易瑞龙、刘石麟、张纯春、马万勋、邹友富、陶云、袁振湘、易群英、朱高阳、李丙炎等人在浏阳县城蛟龙巷9号文武雄家中开会。会上，黄卫中公开说，我已与姜亚勋部

* 王绳祖起义前系浏阳县警训所长，现任临湘县政协委员。

接好了头，准备起义，而县党部则决定跟孔振合作与解放军对抗到底，准备于5月15日行动，各位有何高见。袁振湘说，我在国民党内混了20年，为了立功赎罪，愿根据毛泽东八项训示高举义旗，决不再跟孔振走向反共的绝境。当时身任浏阳县政府军事科长的文武雄也赞成袁振湘的意见。与会者一一陈说自己的处境，表示不愿继续反共，并决定于5月5日傍晚统一行动。4月30日，我派出梅孝魁、李平树二人前往古港、三口、宝盖一带察看地形，搞好联络工作，准备以平江浏阳交界的山区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以配合大军解放长沙。

提前行动

5月中旬，浏阳县长改派唐佑樾。月底成铁侠派汤菊中和成国超来浏阳，同来的还有罗韬。姜亚勋部也派出代表赵纷（又名赵赤心），其目的是要黄卫中迅速行动。6月1日，罗韬来警察局，要我们迅速行动。我当即向四乡发出通知，一律向东区德宝乡集中，准备深夜行动。大瑶警察所接到通知后，于午饭后就开始行动，被大瑶乡公所发觉电告了唐县长。唐佑樾问我是怎么一回事。我答以作军事演习。晚饭后，我向驻在浏阳城内的分队发出指示，要他们到县城东门集合，向德宝乡出发执行紧急任务。等到大瑶警察所的人员赶到那里，我们已撤出县城。大瑶警察所长易群英和县警察局督察长刘石麟被自卫总队附邱自明截住带到唐佑樾那里。唐佑樾当即命令邱自明将他们二人杀掉。随即要邱自明派六个便衣陪他到浏阳县参议会议长邱方庸家中去。邱自明派人送走了唐佑樾后，把刘石麟、易群英二人放了。警察局在全县有600武装，这次集中仅有328人，加上县田粮处黄卫中的人马，和浏阳县在乡军官会城区袁振湘的部分人员及县政府军事科长文武雄和指导员张俊的亲信共有600人和警察局的328支枪。

统一番号

600人集中三口一带休整了二天。6月3日晚集中各方领导研究打什么番号的问题，会上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以赵纫、黄卫中为首提出应打“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一支队浏阳独立团”的番号。另一种意见，以罗韬、文武雄为首主张树“中国人民解放军湘鄂赣边区独立总队第一支队”的番号。争论结果，绝大多数同意赵纫和黄卫中的意见，统一番号为“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一支队浏阳独立团”，罗韬当即退出会场表示不满。6月25日，罗韬、文武雄、袁振湘三人带领随行人员在永安车田垸一带打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湘鄂赣边区独立总队第一支队”的番号，袁振湘任指挥，罗韬任政委。

宣布建制

6月4日上午，黄卫中在浏阳三口郭家亭罗家大屋召集的所有人员大会上正式宣布组建“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一支队浏阳独立团”，脱离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人员的分工是：团长黄卫中，副团长王绳祖、朱高阳（浏阳县税捐处长），代理政委赵纫，参谋长文武雄，副参谋长刘石麟、袁振湘（浏阳县在乡军管会主任）、陈克磊（浏阳县警察局督训员）、张俊（浏阳县政府军事科指导员），军需处长易瑞龙，副处长周克坚（浏阳城区田粮办事处主任），军需易群英，副官处长罗开基（浏阳县青年服务社负责人），副官罗开周、邹春富，运输补给站长廖材阔。武装力量在警察局原有编制的基础上补充一些人员组成中队、分队，由王绳祖指挥。

突出包围

6月4日中午，起义人员正在吃饭，遭到驻在官渡的126军

张湘泽的两个营的突然袭击，我们突围后进驻同绥乡内，6月7日退到浏阳莲溪山区之周洛。6月13日又遇到126军和从平江开来的58军及平江自卫队的两面夹击，起义部队损失惨重，第三分队分队长周东阳带领37人和17支步枪自首，团长黄卫中被捕，我和朱高阳化装去汉口寻找组织。至此，浏阳独立团于6月19日就不复存在了。

(陈新明整理)

【责任编辑 朴永子】

熊希龄的救灾办赈活动

周秋光

熊希龄是民国时期驰名中外的大慈善家。他经办的慈善事业范围极广，救灾办赈即为一项。本文仅择其荦荦大者，略作介述。

一、顺直救灾

1917年夏末秋初，河北境内天雨连绵，山洪暴涨。永定、大清、子牙、南运、北运五条大河同时漫溢，决口数百余道，洪水滔滔，泛滥各地，北自张家口，西至西陵房山以西，东至山海关，南抵黄河，一万方里之广，顷成泽国。有103县的19000余村庄及25万余顷田亩被淹，灾民逾600万人。如此浩劫，实为数百年来所仅见。此时，熊希龄正隐居天津，津埠亦在巨浸之中。本来熊希龄“自隐津终养，决志不闻国政”，但目睹灾民露宿、啼饥号寒之惨状，心良不忍。“且念出仕十余年来，从未直接为民做事，愧对吾民”，便决心“勉竭弩钝，以当此艰难，亦冀稍赎政治之罪戾”。1917年9月25日，他奔赴北京，向中国银行公会求助，得捐款万余元，交京师警察厅购备粮食，赈济津民；嗣又往告政府，力主筹款，赈济整个灾区。北京政府召开国务会议，讨论施救措施，结果一致认为，除非有熊希龄出来主赈，方可定议。熊希龄以数百万灾黎生命攸关，重民所托，责无旁贷，遂毅然承诺。1917年9月29日，大总统冯国璋颁发特派熊希龄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的命令，10月4日，熊希龄便就职任事了。

熊希龄先建立治水救灾的办事机构，在北京石驸马大街本宅设立督办处，在天津河北造币厂内设立分处。选择任事各员，分担职守。次第制订各项办事规程和章则。定其救灾方针和步骤为：第一，要求政府拨给巨款，以便赈务之进行；第二，委托地方士绅及教会办理赈济，以杜官吏之侵蚀；第三，联合中外慈善团体公同支配，以免偏远之向隅；第四，堵筑决口，筹定春工，以防水患之漫衍。宗旨既定，赈务、河工次第进行。

赈务方面，分为急赈、冬赈、春赈、杂赈四项。所有各赈，必须先有巨款。这本应由政府提拨。然北洋政府财源枯竭，军阀视民生如草芥，第一次所拨赈款仅数十万元（后来举借外债以充官款）。而灾民所面临的困难良多，即不仅首以赈粮为最，且转瞬严寒将届，赈煤、赈衣尤关至要。仅赈衣一项，非得有数百万元不能解决。熊希龄决定在官款之外，广集社会民间资力，以补官款之不足。1917年10月8日，他向全国各省发出请赈通电，且自以身作则，先捐现洋500元，又“就家中所有新旧衣布，由内人暨小女等督率婢仆，亲自缝纫，即可得棉衣一百套，捐给难民”。在他的呼吁带动下，各方响应，团体、个人捐衣、捐洋者源源不断，外国慈善团体亦有捐助。综计捐数，得棉衣裤148601件；皮单夹衣裤82400件，（约值20余万元）；得捐款90余万元。政府拨款的不足，居然由此获得了巨大的弥补。

为了统一放赈和解决放赈中的种种实际问题，1917年10月15日，熊希龄约集捐助灾区之中外各慈善团体、机关代表，在督办处开会，讨论合力办赈的办法。会上提出了议案八项，即规定统一放赈；平糶；开设粥厂；规划防疫筹办施药处所；设因利局；保留牲畜；收养老幼妇女；以工代赈等案。但会议主要讨论的是规定统一放赈办法案，决定急赈由直隶省长及京兆

尹会同督办处担负；冬赈委托顺直助赈局担负；春赈委托顺直义赈会担负；以上三赈均由督办处请拨政府官款散放。余尚有杂赈，内容繁多，诸如防疫、义当、设因利局、种子借贷所、老弱留养所、施粥厂、平糶局、牲畜保留所等等，都属于杂赈范围。又议定以各参加团体代表为基础，组一联合办赈机构，定名为京畿水灾筹赈联合会，公推熊希龄为会长，美国红十字会顾临为副会长。该会一方面对办赈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及其善后措施彼此联合磋商、赓续提议、群策群力；一方面督同教会及地方官办理全部杂赈。所有民捐赈款各项，概由该会统筹规划。所谓杂赈，实用以补官款之急、冬、春三赈所不及。经过一番周密的筹划和部署，这项特大灾情的赈济很快收到实效。其杂赈可观者：共办成因利局309处，义当29处，老弱留养所181处，粥厂593处，种子借贷所49处，配合官款散放之冬、春各赈，竟使灾区全活，灾民不至有冻饿毙命之象。并且，熊希龄又主持创行以工代赈之法，即组织中灾区的大批青壮饥民，修筑马路，共成三道，一为从北京到通州，曰京通路，由督办处与美国红十字会各出款10万元合办（主权归中国）；二为从北京到西山（今香山），曰京西路，由督办处拨款6万元，由京兆尹负责承办；三为从通州到门头沟，由督办处代京兆尹向中法实业银行借款25万元修筑（几年后，由此接续修至天津，曰津通路）。三条马路修成之后，熊希龄依次命名为博爱路，仁慈路，德惠路，用志纪念。这种以工代赈，既救济了大批失业之饥民，亦为地方办一永久之建设。

河工方面，即治理水灾，主要分为治标、治本两项。治标者，即注重堵塞决口、排泄积水、培筑堤工，救水患于目前；治本者，即注重统筹全局，制定长远规划，从根本上根治水患。治标、治本两项，熊希龄认为治标系目前除患御灾之要图。他将治标工程又分作两项：一曰急工，二曰春工。急工仅

堵筑决口，使受灾田亩涸复不误春耕；春工为培补堤防，免致伏秋两汛再罹水患。治标工程中区分官堤与民埝，其属于民埝者，由督办处提拨民捐，交直隶财政厅分发各县补助民力兴办；其属于官堤者，则由督办处从官款中开支。在整个治标工程的进行中，依其步骤，又分作三个时期：第一期为筹勘河工。由熊希龄选派干员，前往各河，会同各河防局长筹勘，估算培筑工费；第二期为督察河工。核定工费后，仍由原有各河务局负责兴工，由督办处选派各河督察委员长率领技术人员前往监视，以免其偷工减料；第三期为防守河堤。培筑既竣，若不严防，恐有疏虞，仍责成原有河务局长担任，而由督办处选派宣防委员长，前往各河督同各局长尽力防守抢险等事宜。经过上述步骤的认真贯彻执行，天津之急工工程，原南运河决口十余处，从1917年9月兴工，未及两月，一律回复原状；天津以外之京直各县急工工程，官堤民埝原决口计570余处，亦不过一年之内，均得以堵筑。

急工完竣，遂进入春工。从1917年12月开始，先由督办处派员会同各河务局长暨各县知事，分别对南运、北运、大清、子牙、永定五大干河区域筹勘，至1918年2月杪筹勘完毕，绘具图说，编制工程预算暨各项章程条例，俾能有所遵循，然后即兴工培补堤防。并派员督察以防积弊。鉴于急工初竣，土质松浮，加以入伏后，各河相继暴涨，汹涌异常。为防再次溃决，督办处复分别派定监防委员长，督率员夫分赴各河划段监防；并调直隶、山东、江苏各海河工程学校学生70余人到工练习，帮同防守。五大河之出险多处，均经各生奋力抢修，始保无恙。为保护新修堤防，又将各淤塞之引河分别疏浚。终以最短之时间，将大工告成，致难民复苏、春耕不误。整个治标之急工、春工两项，均于1918年先后告竣。经过是年伏秋两汛的检验，捍御得力，不致再患。此后十余年内，仅永定河决堤一

次，余皆无恙。

治本，是根治水患的长远大计。熊希龄为此费尽了心力。治标工程甫竣，即着手治本之筹划。初则开办河工工程师讨论会，敦请中外各技师会同讨论研究，以每星期讨论一次，各举议案，互相折衷；又延请本地经验学识俱优之绅耆，发表意见，决定办法。继则设立顺直水利委员会，自任会长，选中外高等技师充任会员。委员会之宗旨专为计划解决顺直省区全部治水之根本问题。但于治本未实行以前，则附带办理前急工、春工之治标工程以外尚未经办的天津海河方面的治标工程，于1929年6月之前次第完竣。

顺直水利委员会于1918年3月20日成立，至1929年6月自动裁撤，存在11年，除组织完成天津海河的治标工程外，主要是为治本做了计划和准备：搜集了可靠的资料，即对顺直河道进行了地形、流量、雨量的测量，并绘制了各种地图；制订了顺直河道改善的计划和治理方案。熊希龄所著《顺直河道改善建议案》对其做了详细的论列，成为北方河防建设史上一部重要的参考文献。

熊希龄的顺直救灾，在工、赈两方面都是成功的。这是他初次对于北方社会和人民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这次救灾，也是他投身社会慈善事业的开端。

二、北五省救灾

1920年秋，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五省，又发生特大旱灾。其灾情之重，为前清光绪以来40余年所未有，较1917年之顺直水灾尤重数倍。据各地报告统计，灾区面积广约9万方英里，饥民达3500万人。奇旱之下，收成约只能达到百分之八。施以赈济，至少需要赈款2亿元，非政府所能解决。

面对这一严峻局势，熊希龄又一次萌发出救灾的念头。

1920年9月11日，他邀集北京各慈善团体，派出代表，在北京石驷马大街本宅会议，筹商办法，决定组织北五省灾区协济会，举黎元洪为名誉会长，赵尔巽为会长，熊希龄、汪大燮为副会长。由到会诸人，公捐4000余元，以为发起提倡。暂假北京金鱼胡同中国红十字会为会所。数日之后，梁士诒亦组织华北救灾协会；美公使克兰氏组织万国救济会，劝导各国人士助赈；其他各界人士，亦纷纷组织救灾团体，参与救灾活动。

熊希龄所组北五省灾区协济会成立后，制订了各项规程和章程。因五省灾区太广，力难普及，遂确定宗旨，以协济为方针。议定其协济的范围有四：其一，灾区调查。派员分往各灾区，详加考察。拟成报告，转达当道及各慈善团体，以便分别轻重缓急，设法施救。并随时调查官家与私家施赈救济各情形，如有隔阂及流弊之处，随时请其改良；其二，条陈灾赈办法及措施，以为何种办法可行，措施得当，即拟具条陈，供政府和各慈善团体采择。并愿与地方各团体及教会联络，为灾民设法谋求生计。其三，收容各灾区儿童。决定募集款项，设立收容所，代为领养；或于灾区就近委托各教会及地方团体，以所得捐款，尽先办理；其四，灾区医疗救济及其防治。拟与各医学校、医院协商组织卫生队，前往各灾区，施以诊治，并防疫患。

1920年9月下旬，熊希龄商北京学生联合会，派出学生50人，组成调查团，分队前往各县调查灾情；同时派员往上海各地，购运杂粮、麦种，又赶筹冬衣，运往灾区接济；各灾区之遗弃孤贫儿女托当地教会先行收留，然后送交香山慈幼院教养；并商得上海中国济生会捐助大批防疫救济药品，送往受灾各地。

然灾区如此之广，小小的修补无济于事。据调查，仅顺德府铁路一带，垂毙饥民便达10万余人。当时各地的赈灾团体虽

多至十数个，但均各施其赈，毫无联络，在救灾进行上，难免有偏轻偏重之虞。熊希龄深感必须制订一通盘统筹的施赈计划和组织统一的联合赈济团体。为此，他在这两方面做了努力。

在通盘筹划方面，熊希龄前在顺直救灾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此次北五省旱灾与前此水灾相比，虽然大不相同，但他认为救灾的方式和步骤则是可以取法的。根据他的设想，办赈的序列依然可以分作急赈、冬赈、春赈三个方面。灾象既成，工商停业，人民无所得食，故必先施钱米，以救危迫，名为急赈；急赈仅延旦夕，而秋尽冬初，农民存粮皆罄，非赈不治，依旧例按被灾户数分别人口大小及极贫、次贫施以银米多寡，令其得度三冬，名为冬赈；冬赈既过，春麦未收，青黄不接之时尚有生计艰难，不得不救人救彻底，资其接济，名为春赈。此三赈重在普及，需款甚巨，非政府不能担任。此外还须设立杂赈，包括设平糶局购买粮米，供应有购买力之饥民，而免奸商之居奇抬价；设留养所及粥厂，便于老弱无告之民；设因利局、义当、种子借贷所及牲畜保留所，便于农工商困乏之民，而令不致失业。杂赈可由各慈善团体商同地方官绅共同利用各方捐款办理，用以辅上三赈所不及。然杂赈亦尚有未逮者，即设平糶局接济粮食，仅便于中等有购买力之家，而失业灾民，身无一文，何能购食？因此，又有必要实行以工代赈，容纳失业之青壮饥民，兴办各种工程，诚可谓一举两得。多年的救灾活动，使熊希龄形成了如此一套完整的赈灾规划和步骤。他期望此次北五省救灾，仍能循此而行。

在联合各赈济团体方面，1920年9月杪，熊希龄会同汪大燮，先邀请万国救灾会之各国赈灾委员，在熊希龄北京住宅会商，征得同意，决组一中外联合赈灾团体，曰国际统一救灾会。外国因前此已组有一万国救灾会，且筹款已有成数，专候

中国方面有具体办法，即可散放。对熊等的要求表示赞可，惟要求中国方面亦须将国内分散的诸救灾团体先行联合，组一与万国救灾会相应的中国北方救灾总会，方可联合成国际统一救灾会。于是，熊、汪遂邀华北救灾协会等在北京救灾团体暨各国代表10人，先于10月1日会商一次，旋于10月3日，在石达子庙开中国北方救灾总会成立大会，联合全国各地的团体计有北五省灾区协济会、华北救灾协会、直隶救灾协会、顺直旱灾救济会、红十字会、山西筹赈会、山西灾旱救济会、河南旱灾救济会、回教筹赈会、基督教灾民救济会、农学济灾会、直隶义赈会、北方工赈会、近畿农民救济会、山东灾赈会、佛教筹赈会十六个（后在10月5日国际统一救灾会成立前一日的预备会上，又增加平巢救济会、陕西救灾会，共达十八团体）。该联合会成立时熊希龄因赴香山主持香山慈幼院落成典礼，未出席，北五省灾区协济会由汪大燮、蔡廷干等为代表。总会举梁士诒任会长，汪大燮、蔡廷干任副会长。10月5日，北方救灾总会开预备会一次，次日即与万国救济会联合组成国际统一救灾会，假北京石达子庙为临时会所。草定会章十条，以统一各救灾分会迅收救济实效为宗旨，举大总统徐世昌为名誉会长，不再设会长，仅设干事团（后称行政委员会），由中外代表各半额充任干事和委员。干事团会议时设临时主席，由各干事轮流充任。又设秘书和司库处理具体事务。熊希龄被举为干事之一。是会的外籍干事（会员）有美、英、法、德、意、日、比诸国。此会成立后，便担负了整个北五省灾区的通盘筹划和赈济之责。10月7日开始议事，商定救济的种种措施。

熊希龄自筹组成国际统一救灾会后，依据自己的办赈经验，结合北五省的灾情及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具体的办赈方案及其步骤。

首先，他提出了工赈建议案。认为工赈可在两个方面兴修

工程，一为河工，二为筑路。河工计有四项可以入手，即：山东运河工程、北运河牛木屯工程、马厂新河工程、泸沱河堤岸工程。以上四项河工，可以解决直、鲁两省之工赈。还可向中美合办之矿业公司内，借款50万元，用以疏通湖南洞庭湖（熊在1916年即拟有《疏浚洞庭湖刍议》说帖一篇，规划详明），亦可容纳部分北方饥民。至于河南省及直南所连之各县，虽无河工，却可筑路。或马路、或铁路。如津通马路，前由熊希龄代京兆尹向中法实业银行借款25万元，除已交第一段路工7万元外，尚有18万元存放，大约购地尚需七至八万，其余皆用之土工。如向京兆尹直隶省商酌，由天津兴工，即可就近招雇逃荒至津之豫省暨直南各属灾民，可资工赈；又查陇海铁路，闻已借得外款30万，亦可呈请政府赶紧兴修，则陕、豫、鲁三省饥民，皆可藉此谋食。此外，马路以工代赈可筹之款还有两项：一是总统府尚存有冯国璋总统任内所余之上海专卖鸦片余额200万元，现存中国汇业银行，可要求政府将此款借拨，充河南、山西、陕西三省平巢筑路之费；二是段祺瑞于复辟讨逆后尚存有余款70余万元购买中国汇业银行股票，如商请段将此项股分发卖，亦可移充赈款。熊希龄认为上述计划如能达到目的，则一切工赈可筹一千三四百万元之款，可救活无数灾民。他将其设想陆续写成条陈和议案，上呈大总统，得到赞可，亦受到社会各界众多人士的称许。但是，也造成了另一种偏向，即社会上一些人士，咸以为工赈为最良之策，而忽视了办赈的轻重缓急和应有的步骤。为此，熊希龄于1920年10月11日在国际统一救灾会上提议应先赶办急赈案，用以纠正这一偏向。他说：“此次北五省旱灾较之民国六年水害，灾区更广，办理更难。而现在中央与地方之所筹划亦尝散慢而不统一，复杂而无头绪，此二十兆之饥民，将恐致靡有孑遗之惨，言念前途，可忧甚大，不得不奔走呼号，举其所知，以为民请命”。以办赈步骤言，“宜赶办急

赈，先救民命，使苟延残喘而后有工赈之可言。否则民已死亡，何工可赈？”

如何办理急赈呢？熊希龄提出了两项原则性建议：第一，赶办急赈必须各灾区同时并举，万不可只办数县而令他县饥民闻风而来，秩序固不可保，而赈务亦必为之发生障碍；第二，赶办急赈重在先购粮食，无论平糶及发赈，均须在1929年10月以前将粮食运到被灾各县，迟则北方封冻，边远之区大雪封山，将有种种不便。

然赶办急赈、购买粮食，均须先有巨款。如何筹得？国际统一救灾会集合中外各团体，固然能够解决一定数目，但大宗的款项，还非得由政府提供才行。而政府已库空如洗，怎么办呢？熊希龄会同赵尔巽、汪大燮等人，绞尽脑汁，终于又想出了三种办法，上呈大总统：

其一，查原财政部为整理新华储蓄票特发5年公债1000万，为收换储蓄票之用；又阁议整理中、交京钞一案，特发9年公债6000万，以3000余万为收换中，交京钞之用。二者均已实行，闻限于四个月内办理完竣。鉴于储蓄票与京钞发行已久，损失必多，其中且必有因水火兵灾而将票钞毁坏无法收换者，数目大约不止百万，如能待新华、中、交三银行收换票钞事竣，将所有遗失未兑之公债余额概行拨归赈款，则为解决问题之一途径。

其二，东西各国，往往于战争发生或财政紧迫之时，辄于交通机关所辖之铁路、轮船、邮票加收百分之几名为通行税以济急需，取之不多，征之甚易，事竣仍即停止。如若仿行此例，将中国之各地铁路、长江及各省埠之轮船、各省商埠之电车，全国之邮票一并加以附税，其数至少当有1000万元之谱。倘以此数为抵押，向欧美各国资本家借贷5000万金，亦可办理急赈。

其三，查农商部新设农工银行，业将股款集有数百万元，现在直、鲁、豫三省农民失业，无资耕种，政府如飭令农商部先将此款仿通州农工银行例式，速于三省灾区设立农工银行，贷借农民，俾得购买籽种等款，亦为赈务善后之一策。

熊希龄认为以上诸策政府如能采行，不仅急赈可办，即冬赈、春赈亦可有望。若政府先行担任此三赈，而工赈亦可从容计划。于此三赈不足者，可由中外各慈善团体办理杂赈以为补充，庶可使灾区全活。后政府采行了熊希龄的提议，并委熊出面与交通部暨银行交涉；且仿熊之提案，又加征海关附加税，致急赈及其冬春各赈，有了基本保证。

筹款有着，凡放赈及其办理杂赈各项，俱由国际统一救灾会统筹执行。在该会统筹执行的会议与进行当中，熊希龄复有种种议案提出，诸如统筹财政之计划，统筹灾区之计划，辅助政府之责任，联络各团体之办法，以及纠正各种失当的举措等等，浸透了他的劳绩和心血。北五省灾民在饥寒交迫的困境之中得以渡过，多数饥民得免于死亡的厄运，实得力于熊希龄暨中外一大批慈善事业家的苦力经营和筹划。

三、湖 南 救 灾

湖南是熊希龄的家乡。对于家乡的灾难熊希龄尤为关注。兹就湖南遭受的兵灾与水、旱各灾及其熊希龄设法筹赈诸情形分述如下：

（一）兵灾

湖南自“二次革命”以来，迭遭兵祸，盖因其地当冲要，一直成为南北军阀角逐的战场。北洋军阀为控制湖南，先后派汤芑铭、傅良佐、张敬尧督湘。这些军阀名为督湘，实为祸湘。湘省遍遭蹂躏，人们深受其害。1916年护国之役发生，湘西首遭刀兵之祸，其受害之酷，为百年来所未见。“缘以战争

既开，各地上匪乘时蜂起，焚掠惨杀，村舍为墟。沅河流域三十余县地方，无不深遭惨毒。老弱流离，死亡载道。妇孺匿藏山谷，不避风雨，沿河尸骸流及千里”。如辰溪一路，“民屋均作兵舍，门窗木料概拆为薪，各乡土匪烧杀横行，株木冲、李家铺等十余村，全为焦土。离散逃奔，两岸尸流，积秽极恶，薰蒸已成瘟疫”；麻阳一路，县城及高村、冈口三处，南北军进退各四、五次，“蹂躏已成荒墟，城民只余八人，四乡土匪如毛，山谷死尸均满，其逃至凤凰行乞者，半多田舍富翁”；又如芷江县城二次被围，“炮火之余，鸡犬无多”，仇杀焚掠，随时可见。“有姚祖绅一家，毙命七十余口”。妇女被掳去者多无下落。其永顺、大庸等处，由于几被围困，“城外房屋，焚者千余；仓储谷米，皆付一炬”。种种情状，惨不忍言。

1916年3月，熊希龄回湘西芷江迎母，3月11日，袁世凯突然任命熊希龄为湘西宣慰使。在袁的本意，是想利用熊的声望及与梁启超、蔡锷的关系，用以消弭南方护国之事。熊希龄洞悉其奸，前此他已吃尽袁之苦头，且深恶袁之帝制阴谋，自不愿再作冯妇。然基于家乡受害酷烈，不能熟视无睹。在家乡各属绅商的环求哀留下，他受命湘西宣慰使之职，但他并不是要为袁世凯效力，而是借宣慰之名，以行卫护家乡、救济灾黎之实，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冀以救我父老子弟，以尽桑梓之义”。并且暗中运动湘西独立，实与袁世凯的意愿背道而驰。

任湘西宣慰使职后，适滇、黔方面停战一月。有了这个空隙时机，熊希龄即着手于救济灾黎的各项事宜。为安定湘西境内秩序，他首先会集当地官、绅、商各界人士，妥商善后措施八条，呈请北京政事堂统率办事处批准施行。其要义为：第一，延聘湘西各县正绅与商会人士帮同办理军民接洽各事；禁止军队强拉民夫当苦力，凡充苦力者应予以月饷；第二，招回

旧属沅河因战乱外往之船只回常德专运商货，不充军用，俾水运交通与商业之正常进行；第三，对湘西各属被兵老弱妇孺应拨款救济安抚；第四，1916年春耕在即，各军应于北方招募役夫，不应强拉湘西民夫，以误农时；第五，凡军队督役，不应动辄鞭挞民工，以免引起冲突。其次，熊希龄在常德设立了筹办抚绥事宜总处，专办赈抚事宜。处长照会常德正绅廖名缙担任，复于沅陵、芷江、永顺、凤凰、洪江、大庸添设分处，以各该县绅士张宏铨、唐岳屏、彭施浚、刘炳然、杨乃芬、侯昌录充任分处长。各分处负责了解各县灾情，与总处联络，以便统一赈抚。其三，筹集款项。北京统率办事处共拨款6万元，各省官商捐助约三四万元，统共不足10万，远不敷用。于是熊希龄又致电全国各报馆，请登告白，代求中外各方输捐，多少又得到一些。其四，统一放赈。由筹办抚绥事宜总处会同各分处，携带银米，前往散放。又于常德设商船局，照会殷实公正商人林丙荣、郑绍康为董事，负责装运赈粮。

在滇、黔停战一月之间，熊希龄通过上述种种措置，将湘西灾黎安抚救恤，是年春耕不误。之后，他惟恐战事再度发生，一再致电南北双方，请罢兵息战。当闻悉桂省陆荣廷军不与滇、黔取同一态度，又向湘南衡、永推进；中央亦派倪嗣冲统率北军四十营深入衡阳时，他内心十分焦虑。1916年4月23日致电梁启超云：“时局日急，外患亦深，我公操纵其间，究系如何宗旨，能否即时罢兵，开议条款？对于吾湘，能否暂缓进兵，俾免冲突？”。同日又致电北京教育总长张一麐称：

“时局至此，无法挽回，昨电三省，劝告均无回意，未悉其中有无阻隔，抑系三省坚执意气，不以弟言为然。而窥测双方内容，可据各方报告，似中央进兵无已，欲以武力为开议之后盾；三省不信取消帝制，亦欲直抵武汉，再议罢兵。而湖南四面受敌，痛苦万分。夜长梦多，将恐天下不可收拾，吾侪终为

亡国奴耳！公在中央，宜设法商之政府，顾全大局，总以诚意罢兵为第一要义”。此期间，他连续多次通电南北，表示对国事、湘事的一片焦灼忧虑之心。然以一己之力，无从左右南北局势，他只能扼腕叹息。

时局日非，护国的战火停息未久，护法的炮声重又继起。自1917年秋开始，湖南又成为战场。南北两军入湘相持数月，先是湖南遭受兵火，继之湘中各属，均罹兵祸。战线绵亘数百里，衡山、宝庆、湘乡、湘潭、攸县、醴陵、长沙、湘阴、岳阳、平江一带，农民辍耕，商旅裹足；老幼妇孺，转徙流离。

面对如此变局，熊希龄既无力阻拦戕祸相加，只好呈请政府颁发巨款，办理湘赈。当时旅京湘人亦呈请政府仿前湘西例，派熊希龄宣慰湘南。北京政府以之交国务会议讨论，议决结果是：须以岳州战局平定，始可办赈。然湘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十室九空，望泽之殷，甚于涸鲋。熊希龄只好会同湘人，自行筹措。他用自己的私产人寿保险单等，向银行抵借万元，派任福黎携往湘中施放急赈。接着于1917年3月30日，会同旅京湘人范源濂、郭宗熙等，联名向全国发出为湘省兵灾乞赈通电，要求全国各省文武长官、慈善团体以及海外同胞，“推人道于大同，拯一方于水火，或慨施巨款，或代募义捐”。同日又致电湖南同乡诸公，“乞尽力捐助，并为设法代募”。为了切实办好湘赈，1918年4月18日，他邀同旅京湘人，在石驸马大街本宅成立赈济机关，定名湖南义赈会，自任会长。设立干事部，分任文牒、庶务、会议、交际、干事各员，确定办事步骤为：其一，除仍呈请政府广为提倡外，在全国范围内募集款项，暂存京津银行，俟稍有成数，即汇往灾区施放；其整数巨款，即迅汇灾区施放急赈；其二，施赈地点由会长派出查灾员认真查明、分别轻重，由会中议决指配赈款。义赈会成立后，先在岳州、长沙设立办事处。初仅有熊希龄捐助的万金为恃。

为济燃眉，义赈会向银行先行借垫2万余元，后得各方捐助，共有赈款10万余元。对平江、湘乡、衡山、湘潭、岳阳、临湘、醴陵、湘阴、攸县（后去攸县加宝庆）、宁乡、浏阳、长沙12县进行了施赈，使半死的受灾人们得以支撑过来。

由于熊希龄组织湘人自行办赈，北京政府迫于舆论界压力，也不能不有所表现。又适4月间岳长已复，政府也须履行前议。故段祺瑞致熊希龄的电文中这样说：“执事关怀桑梓，借款募捐，分投集赈，莫名倾佩”，今“共拨十万元交曹宣抚使（曹錕）会同省长核实散放……已电曹宣抚使暨张兼省长（张敬尧）确查具报，候复到再定办法”。所拨赈款由军阀掌握，湘人到底能沾多少实惠，也就难以想象了。

（二）水旱各灾

湘省在护国、护法的战争中被人为的兵燹摧残一番之后，复又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打击。1918年入夏以后，苦雨连绵；湘江、沅江、澧江三水同时暴涨，泛滥10余县。众多地区，浸泡在一片汪洋之中，哀鸿之声，遍于盈野。无家可归之人，四出逃亡，“露宿山林者有之，伏居山洞者亦有之”。逃至省城者，日有5000人之多。又瘟疫盛行，全省有四分之三的地区发生瘟疫。加以土匪乘机劫持，市面金融混乱，人民苦不堪言。当时熊希龄指出，人民纵不死于兵灾，亦必死于瘟疫，死于饥饿，死于金融。省府当道，对于人民的苦难置若罔闻。督军兼省长张敬尧前次手握10万元兵灾赈款，惠民无多；此番湘省水灾，北京政府续拨3万元水灾赈款，他竟以纸币3元折合银洋1元发放（当时银洋市场价约合纸洋七八元），乘机从中盘剥侵蚀。甚至对于避水迁居长沙城头的居民，采用军事手段加以拦阻。

熊希龄眼见兵灾未绝，水患又起，心力交瘁，寝愤难安。湘省请他办赈的亟电纷呈而至。中央也把目光集中到了他的身

上，希望他能出任湘省赈务督办，奇迹般地解决问题。督办之职，熊希龄执意不受，因为他要面对现实，湘省兵灾加水灾，灾黎已有数千万。至少得有3000万元赈款。可中央既没有巨款援助，担任中央之赈务督办又有何用？然筹湘之心，则未克稍解。他仍旧义不容辞地成为这场救灾中的灵魂和支柱。还是以前此兵赈中创办的湖南义赈会作为办事机构。通过了解灾情，熊希龄认为这次灾赈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主要是谷米。因为湘省刀兵水火，谷米无存。众多地区不仅将种粮食尽，而且早已藉草根树皮裹腹。谷米主要靠从外地采购，而筹款必当在先。政府既不能接济，只得向社会各界劝募。1918年6月29日，熊希龄向各省发出请赈通电，痛陈湘省苦况，祈请“当世侧隐仁人慈善之士，推爱乡之心，并毁家以纾难；本恤邻之义，则汎粟以济饥。或脱簪钏，或节脂粉，或捐宴费，或捐游资”。然多次向外劝募，公私困竭，捐成弩末，所得已属不多。为此，熊希龄采取了如下一系列变通的办法和措施：

首先，他邀旅京湖南筹赈会诸公商议，将前此湖南所存由他保管的全省米盐公股到期之第一、二两项证券，从交通银行领出，计共得京钞40.8万余元；由于京钞价跌，他怕公款损失过多，将京钞全部购买7年公债，再将这些债票分别转押交通、金城、实业、盐业、大陆各银行，抵借现洋19.5万余元（年息8厘），以5.52万元汇湘赶办急赈；另14万元汇至汉口朱菊尊处，派刘艾棠赴汉与之商榷前赴芜湖购米平糴。

其次，仿湖北签捐票成例，开办慈善救济奖券。据云有上海某巨商包揽签捐票，每次愿报效湘赈捐款30万元；若抽签十次，可得巨款300万元。鉴于各方捐助无多，而奖券能生激励，故熊希龄乃尝试采行此法。定为分六期发行，不料此举一开，他省纷纷效尤，举国若狂，小民投机成赌，致生流弊。熊希龄恐酿成祸端，至发第五期后，乃于1919年3月5日宣布第六期

停办。

其三，临时救济，安抚灾民，并推行以工代赈之法，用以相度情形，维持生计。由义赈会在省城设立平糶局，并派员往受灾各地，招集流亡，盖居留所以栖之；设临时施米处，以食之。例如株洲、醴陵两地，“一面劝农速治田园，一面设临时因利局贷资商贩，俾各自营生；一面贷资恢复土窑三处，维持失业窑户，藉以赶造民间所失之碗碟等物；一面设立织布厂，织造制赈衣绒布，藉以安插机户。又设临时医院维持居留所灾黎之卫生”。

其四，请全国慈善机关联合维持湘赈。1918年9月26日，熊希龄在京召集湖南义赈会同仁开会，议决与上海各慈善团体联合。先致函上海中国济生会，请其在沪联络。1918年12月14日，经济生会联合的诸善团，在上海组成湘赈联合会，成为很好的外援。

通过上述办法和措施，收效很大。款项次第筹措，谷米从外埠源源运到。截至1918年底，运进湘省的大米有8万石，分别分发各受灾区赈济和平糶。1919年3月，忽探悉沪商私运大米60万石在黄浦江被扣，并闻江苏省署拟议罚其二成，商人尚未承认。时当春季，雨湿甚重；米存货栈，官商争持日久，难免不生霉变，而湘民则急需购米，熊希龄遂于4月4日致电苏督李纯和省长齐耀琳，请将这60万石苏米转运湘省销售，“既了纠葛，亦得善价”，如商人愿罚，亦请将所罚二成运湘减价出售。他的请求得到允可。有了这批大宗米源入湘，使湘省饥民度过难关。湘赈遂得以告竣。

复苏之后的湘民，重治田园，在1919年秋天，大部分地区谷物获取丰收。然而湘省当道不管人民生计。督军张敬尧见湘省小有收成，为裕军费，便开米禁，借筹军米为名，勒派各县上交大米七万以至三五万石不等，以等于废纸之军钞发还，作

为米的代价。将收上来的大米，官运一百数十万石，到京津一带出售。熊希龄从报上获此消息，非常气愤。1919年10月20日，他致电北京政府和湘督张敬尧，谓“今岁近省各县虽有收成，而其他各处尚属偏灾，绝非丰稔之年。湖南筹赈会尚拟于外省购米平糶，以济其不足，设如报载出境百万，售米既多，价必暴涨，存米既少，民必乏食”。加之以等同废纸之军钞为勒米代价，“农民未获丝毫利益，而地方盖藏一空，水益深而火益热，岂非使数千万湘民同死于虐政之下？！”因此，他请中央迅飭张敬尧停运，并请财政部停发护照。该电发出后，张敬尧大为光火，于23日回电曲意辩白，始则指陈熊希龄不察事理，“撝报纸之谰言，作抨击之通电”，继则谓其运米出境，乃系援谭延闿督湘时之旧例；又系为湘人之所请，意在济有余之米，换回多数之现金，使湘省乱后百业凋零、金融枯竭的局面得到改观，而公家也可增加税收。他甚至认为自己军费不足，尚欠三个月军饷，亦须藉资弥补。因此对熊希龄的通电大为不满，并且对熊大肆攻击，谓之“欺世盗名”，办赈“有名无实”等等。熊希龄忍无可忍，遂与张敬尧展开了一场“电战”。曾经轰动全国舆论界。然而也正是在这场“电战”中，熊希龄对张敬尧作了淋漓尽致的驳斥和揭露。1919年10月29日，熊电称：“仆之通电声明报载，自非臆造。执事果无此事，何必自办官运？……岂非别有隐图？”。“南北交战之时，仆等亦知执事所处之困难，故对于军纪财政，未尝不为曲谅。今休息半年，执事绝无惠民之政。”“盗果戡乎？民果安乎？一年以来，惟经营商务，搜括公产，使敝省水益深而火益热。仆虽欲以私谊为执事骑鲸，亦觉未手而无策也”。“仆尝观凶暴之人及身而亡，富豪之家不世而新。钱多为害，非为福也。一年来，在湘所收入者，扣留中央盐税二百数十万，附盐税三十余万，盐票私加保护照费一百五十余万，钱粮一百余万，铜元

余利一百二十余万，厘金数十万，拍卖公产款一百余万，合计八百余万，加以中央筹济军饷将及千万，勒价收入定为每元四十余串之钱票，而发出定额为每元十五串之钱票，所获利少倍蓰焉。执事之军，不过四万余，以所入二千余万以充支出，仅抵一半，何至尚欠三个月之军饷？人言啧啧，恐执事之祸不在须臾，而在萧墙也”。熊希龄对于张敬尧的这篇通电，与其说使得张敬尧狼狈不堪，毋宁说促进了湖南人民仇张的怒火。此后不久，湖南人民便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张敬尧在湘难以立足，被迫北撤。湘军谭延闿、赵恒惕乘机控制湘局，打着“湘人治湘”的旗号，搞起了联省自治。

1920年6月，驻守在湖南境内的北军全部退走。但北军北撤之际，沿途烧杀劫掠，又给湖南人民造成一场灾难。

然祸不单行，偏偏在北军焚烧之时，湘省又大雨不绝，致湘江暴涨，水灾又起。6月20日起，永州山洪爆发，一日之间，河水陡涨数丈，顺流直下，如高屋建瓴，沿湘河流域之各县田庐，多被冲没。湘水支流，如草河、耒河、潇水、冷水、洣水、攸水、渌水、浏水、汨水、大水，亦均灌入湘江。湘江水势骤涨，江面窄狭之处，逆面上行，宣泄不及，即泛滥横流。舟经各处，一望数十里，渺无涯际，陇间屋宇，有仅见其顶者，有完全浸没水中者，有全栋浮起随波逐流者。各处电杆冲倒亦多，未倒者仅出水面数尺。长沙省城之学宫门、小西门、大西门、草潮门、通泰门，水皆入城。水陆州、牛头州、白沙州，尽皆淹没。登高视之，惟见一片汪洋，竹杪树梢，在水中摇曳而已。自上游浮下之尸身畜物，不计其数。

1920年8月21日，熊希龄会同旅京湖南筹赈会徐佛苏、汪貽书、黄赞元、范诒焕等人，致电新上任的湘督谭延闿，请以工代赈救济灾民。并由筹赈会以现洋10万元，收回前押于英商

之机器全副，提交湘省，请开办工厂。但熊希龄深恶兵灾，谓此项机器，湘省如若兴办兵工厂，则应偿还筹赈会款项；如为普通工厂，以工代赈，则筹赈会赞成。

此次灾情发生之初，由于湘省上年小有收成，民间亦有存米，因此尚未立呈巨象。然而6月间水灾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是年谷物歉收，加以谭、赵政府也外运粮米以裕军费，故到了1921年春天，全省遂普遍发生了春荒。饥民成群外出逃荒，以辰溪、溆浦、芷江、麻阳、晃县、安化、新化、临湘为最；次则为沅陵、凤凰、乾城（吉首）、黔阳、绥宁、靖县、武冈、宝庆（邵阳）、平江、岳阳、嘉禾、永兴、耒阳；再次为古丈、会同、永顺、保靖、龙山、大庸、永绥（花垣）、桑植、新宁、浏阳、湘乡、新田、祁阳各县。春荒发生后，湘省又纷纷电熊，请设法筹款、购米、办赈。赵恒惕为取悦人心（1920年底，湘军发生内讧，赵恒惕与程潜联合，逼走谭延闿。赵恒惕主湘，仍继谭延闿搞联省自治和速成制宪），也组织一湖南急赈会，自任会长，举熊希龄任名誉会长。1921年四五月间，熊希龄多方设法，筹得款项10余万元，一部分汇湘赶办急赈，一部分仍交湖南义赈会派人往芜湖购米。5月25日，熊希龄应湘省邀请，携夫人朱其慧来到长沙，一方面参与省宪审查（熊被举为湘宪审查会的审查长）；一方面亲自筹办赈济事宜。到湘后，当即组织成立义赈会平糶局办公处，专门负责购米和办理平糶诸事。通过听取灾情汇报和派员查勘了解，发现湘省春荒之象，远比他前此预料的要深重得多。报灾已达26县，饥民有560万人。如以2月计算，需谷约80余万石；以长沙时价计，需洋170余万元。而湘省目今所恃者，不过他所筹得的这10万元，远不敷赈。并且，自5月份开始，全省众多地区久旱不雨，一场继春荒之后的特大旱灾，已经开始降临，秋收是否有望，已然难以保障。为此，他与赵恒惕商议，必须设法筹集巨款，否则后果

不堪设想。然湖南已为独立省份，政府不会指拨，只能自行筹措。自行筹措莫过于挪用湖南米盐公股了，但前此赵恒惕已向榷局交涉过，5月上旬得复，谓政府财政困难，盐局收入税款，经政府随时提用无存；迭与财政厅磋商，又谓款数太大，刻难周转，须展期三月方可偿还到期之数。再转向社会各界劝募，更不现实，因为自北五省灾荒发生后，社会各界捐力已尽，无可为望。左思右虑，熊希龄觉得是否可以尝试着从如下三方面设法筹措：

第一，为海关附加税。该税系1920年北五省灾赈时，由海关加征附捐，计有700余万，除赈去500余万（包括偿还先行向银行团借垫400万）外，尚余200余万，现存财政保管委员会。关税乃全国人民所共担，湖南亦占有份。今遭大荒，理应与北五省同享其利。

第二，为交通附加税。该税系北五省灾荒发生时，由熊希龄与交通部商定，从轮船、火车、邮政方面抽取的。北五省灾赈后，据查尚余有二三十万（实有50万）。可以请求挪作湘赈。

第三，上海有华洋义赈会，除兵灾指为自作自受不赈外，其余各灾，不分中外，一体赈济。据云华洋义赈会尚有余款，截至6月15日止，便须解回他用。宜乘此时机，请求散放。

以上三项，除交通税仅向北京政府交涉，无须借重外人外，其余两项，则非中外联合要求，难望成功。熊希龄建议湖南可仿前北京国际统一救灾会办法，湘省也可中外联合组织一会。赵恒惕深为同意。于是在1921年6月2日，将湖南各中外团体或机构：省议会、教育会、商会、青年会、急赈会、义赈会、红十字会、外国领事团、教会等等，各派代表，联合组成湖南华洋义赈会，公推熊希龄、赵恒惕担任会长，谭延闿、聂云台及英、美、日三领事为副会长。所有湘赈一切事宜，概由华洋

义赈会统筹规划和办理。原义赈会、急赈会两团体，仍保持其独立性，由其担任专办平糶；散赈则由华洋义赈会负责。然而在华洋义赈会成立后，由于一些外国教会牧师缺少通力合作之心，甚至怀疑湖南各地谎报灾情，将米藏了起来，常生掣肘，致各项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实际主赈得力者，依旧惟熊希龄所组的旅京湖南义赈会是赖。1921年6月8日，北京湖南筹赈会电促熊希龄返京，6月13日，熊希龄离湘之前，不得不召集华洋义赈会诸团体代表开会，谓筹赈事须请各团体分担责任。当即议决：省外预计筹款3万元，由熊希龄负责；军界应筹4万元，由赵恒惕负责；商界筹5万元；学界筹5000元；政界筹5万元；警界筹5000元；准商筹2万元；中外各银行筹5000元；各国洋货公司筹5000元；各教育会筹2000元；省议会筹5000元；省宪审查会筹2000元；各省会馆（如江苏、浙江、湖北、河南等）各筹5000元。分派数目之后，熊希龄于15日离湘赴汉，再赴江西转至上海。沿途之中，他想尽办法筹款和采购谷米杂粮。芜湖、南昌、宁波、汉口，甚至西贡都经他一一联系过。其中有些地方或因米价昂贵，或因路途遥远而缓不济急，或因联系未妥而作罢。1921年7月，从芜湖采购的1500石以及从汉口采购的4000石米均先后分批运湘平糶。旋又在常德购定蚕豆2200百。

尽管熊希龄费尽心力筹购如许米粮，但并不能解决各地缺米少粮的问题。此时，久旱不雨所造成的灾象已经十分严重。禾苗枯死，秋收绝望。7月以后，全省报告旱灾者，竟有50余县之多。饥民喘息呼号，死亡载道。熊希龄深感必须尽快实现前此拟定的三项筹款救灾计划。1921年7月上旬，他从上海致电北京湖南筹赈会诸公，请举代表速向防灾委员会请求从海关余款项下拨助100万元，赶购杂粮10余万石，运湘分别平糶和散放；又交通附税，亦请往恳求。至于上海各善团方面，经他联系，华洋义赈会愿拨3万元赈湘。殊不料长沙教会一电来

到，谓湘省只少米，并非是荒等语，致该会之款，随之取消，使熊希龄为之浩叹。然海关余款暨交通附加税两项，经熊希龄回京多方运动，得到实现：交通附税余款由内务部分给5万元；海关附税余款则由赈务处分给34.2万元。当然这仍是微乎其微的数目。于是熊希龄又会同旅京筹赈会商议，认为可以将湘省之淮盐岸税作为抵押，商向中外银行团借款200万元，或可解决湘赈问题。1921年10月，他致函赵恒惕商请同意，并且对于款项的用途及其赈济的办法提出建议三项：第一，海关附税到手之后，以此款既属中外代表协商之作，将来放赈亦应有华洋义赈会人员与闻，当以此项款指定购买小米（或在河南购买），运往各灾区设立粥厂救济老弱；第二，湘省以抵押品向中外银行团借款200万元，倘能达到目的，应以此款的十分之三就近在沿湖定价采购谷米以为平糶；用十分之七以工代赈，修筑全省马路，择道救济农民壮丁；第三，今年既有以上两款，略足应付冬赈。明年春赈，尤须设法预备，方可以与秋收衔接。他拟托美国官绅设法转请美国红十字会派员来湘募放春赈，请赵恒惕在湘先行将湘省之美籍人士召集商榷，或由其中劝美红十字会，以为臂助。

1922年1月，春赈在即。熊希龄等以旅京湖南筹赈会名义，向北京新内阁索取到期之湘省米盐公股证券款项，但财政部仍无款归还（原议8月份归还，并未兑现）。后熊希龄与聂云台合电交通部，请加发铁路支付券百万元，以之换取到期之湘省米盐公股证券，为湘省发赈之用。同时熊希龄获悉美国华北赈灾会尚有大宗余款120万元，又积极从中运动，获得美方同意，遂将此款移交湘省，以工代赈，修筑马路（如潭宝公路等）。此外，熊希龄又复多方筹集零星款项，购买米粮；并且收留无家可归的湖南灾孩200余名，入北京香山慈幼院教养。熊希龄呕心沥血，心筹桑梓，使湖南人民又一次从饥饿之中度

过难关。

但是，在军阀统治的黑暗时代，湖南人民并不能完全从忧患和疾苦中解脱出来。此后灾情仍复不断，因此，熊希龄的筹湘之心，也无有已时，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责任编辑 朴永子】

长沙民办消防业始末

刘孟坚*

以民办为主的长沙市消防事业，始于清朝，发展于民国，延续至解放初期。在防火救火，保护商民生命财产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现就个人亲身经历及见闻所及，述其梗概。

历史沿革

长沙为我国古城，湖南首府，房屋栉比，商民麋集。随着经济的发展，火警消防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早在清朝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湖南巡府蒋溥，就曾作出发生火灾警时可以拆屋切断火路的谕示。乾隆廿一年，巡抚陈宏谋又订出“救火事宜”若干条。从官厅注意消防立法，可见消防事业的创办，客观上有其必要。

长沙官办消防机构的建立，始于清朝光绪卅二年（公元1907年）设置的巡警道。当时虽无消防队的名义，但已有属于官厅、有事可以随时派出救火的巡勇。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巡警道设有消防所，所址在东长街。随后又建立了消防队，常设巡勇60名，主要任务是消防，兼司缉捕，先后四任消防队长是龚培林、董达德、劳子卫（即劳远葆）、解九龄。

民国初年，劳子卫受委为湖南省会警察厅所属的消防队队长，队警扩充到108人，设有队副、教练、司书、连队长等。劳

* 刘孟坚曾任长沙市义勇消防总队副总队长、长沙市消防联合会宣传部长。

子卫在任时间不长，后由解九龄继任。由于官办消防队力量有限，陆续出现了“乾元宫”（火宫殿）、“端角福新”（八角亭）、“永仁团”（红牌楼）等几个水龙公所组织。它就是街团的义勇消防组织，是民办消防事业的萌芽。

民国十一年（1922年），出现了绅商合办的“慈善救火会”，由上绅李搢卿、左学谦（即左益斋）等筹划创办，在旱仓坪设置了救火第一队，聘请劳子卫为队长，班底由劳从官办的消防队拉来十多名干警，加上从市民中招募而来的一批队兵，成为拥有40多名编制的民办救火队。1924年又成立救火第二队于北门三公祠，1925年增设救火第三队于南门口天妃宫，各有编制30人。三个队均由劳子卫兼任队长，至此，民办的救火队，成为一支拥有108人的消防队伍。

1927年“马日事变”后，由于富绅大贾离开长沙，救火队经费发生困难，由各公法团体组成“市民救火会”，领导各救火队。由市民救火会设“市民救火捐征收处”，抽收房租2%以维持救火队的经费开支。

1927年12月1日成立“长沙市消防联合会”。当时正值“马日事变”后不久，市公安局局长周安汉为了加强对救火组织的管理，委托市民救火队长劳子卫、乾元宫救火会负责人程前鹄，串连各街团救火会组织了“长沙市消防联合会”。在火宫殿戏台前坪开了成立大会，由周安汉主持。到会的有各公法团体、各机关代表数百人。会上通过了消防联合会章程，推定周安汉为会长，周季衡、劳子卫二人为副会长，决定消防联合会会址设在火宫殿观音阁。

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时，消联会会址被烧毁，迫而停止办公。全市公私消防队部均付焚如，从那时起至1944年长沙沦陷，消防组织无一幸存。

1945年长沙光复后，消联会迅速恢复，由陈前鹄、丑梅

村、刘孟坚负责筹备，在旱仓街建筑了一所新会址，并号召各分会进行恢复重建。1946年春，经各分会负责人开会决定，并经省会警察局同意，组织“长沙市义勇消防总队”，由省会警察局局长李肖白任总队长，刘孟坚任副总队长。至1947年，全市共建起26个救火队，以后又增加五个队，共31个队。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后，消联会和消防总队以及所属的30多个救火队的建制，经市公安局行政科长丁维克及消防队刘孟坚等人负责维持了一个时期，到1952年初办理结束，所有财产经费，移交长沙市地方财政整理委员会接收。

组 织 形 式

长沙民办消防，是由绅商首倡，街团组合，由点到面，逐步发展，转向联合而形成建制的。

长沙城内，原有256个街团组织，团设“团总”，下有“保正”，是基层行政性的组织。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办有一些公益事业。消防事业的最初组织，名曰“水龙公所”，大的团保，单独办一个水龙公所，小的团保，则采取几个团联办水龙公所的办法，例如坡子街就单独办了一个“火宫殿水龙公所”，八角亭及其邻近的端履街、福源巷、新街口联办了一个“端角福新水龙公所”，青石桥、青石街（即今解放路）东茅巷一带的十五个团保，联办了“多佛寺十五团救火会”。总计全市共办26个消防组织，这是1927年以前的事。

民国十六年（1927年）联合成立了“长沙市消防联合会”，参加该会的“水龙公所”、“洋龙会”、“救火会”等，统一定名为“长沙市消防联合会××救火分会”。抗日战争胜利后，恢复的消防组织，改名为“长沙市义勇消防总队”，下面仍由各分会组织救火队，全市为26个队，以后又新增了新河队、六铺街队、新生队、虞安队、中太平街竹林庵队、星字号预备队。

为了便于管理和指挥，将全市划分为四个区：中山路以北为第一区；中山路以南至解放路为第二个区；解放路直下至太平门，到南门口马路以北为第三区；南门口马路以南至郊区为第四区。每区设一个消防大队，由省会警察局东南西北四个分局长分别任所在地区的大队长，副大队长由各区的分队推选一个有资望的人担任。

各大队及基层救火队建制及负责人姓名如下：

一区（一大队）大队长邱少云、副大队长柳国鑫。

会 队 名	驻 地
长宁救火会	主任陈伯勋 队长王东来 古吊桥（现北二马路）
福善救火会	主任戴臣利 队长柳迪猷 长春街（现工人文化宫对面）
烟霞救火会	主任尹亦吾 队长何锡贤 北正街
龙王宫救火会	主任袁海鳌 队长黄海春 通太街少白龙王宫
肃靖救火会	主任张匹青 队长柳国兴 清泰街肃靖坊庙
安字号救火会	主任陈昆煌 队长吴运南 草上河街金龙殿

二区（二大队）大队长易著文、副大队长谭德源。

判官庙救火会	主任谭丙生 队长沈子成 中山东路
二圣庙救火会	主任何振威 队长杨桂生 中山西路
汤公庙救火会	主任黄兆祥 队长刘锦安 小吴门外正街

和字号救火会	主任唐振钦 队长胡树荣	大西门上河街
长清救火会	主任仇祯祥 队长黄绍德	西长街观音寺
宣忠坊救火会	主任孔小大 队长易海清	下太平街
地字号救火会	主任唐德源 队长熊凤阶	浏阳河街
三区（三大队）大队长（不详）、副大队长劳绍鏐。		
乾元宫救火会	主任叶尚农 队长李俊	坡子街
人字号救火会	主任胡树卿 队长易新林	小西门河街
天生救火会	主任李孟松 队长郑增荣	八角亭新街口
永仁救火会	主任吴大茂 队长舒元宝	黄兴路（红牌楼）
濯锦救火会	主任马淑清 队长李德润	上太平街濯锦坊
多佛寺救火会	主任曾笃钧 队长曹连生	蔡锷路柑子园口
四区（四大队）大队长项志飞、副大队长谌丙生。		
洗药庵救火会	主任蒋秉丞 队长粟致诚	大古道巷
文星团救火会	主任杨树浦 队长柳子顺	学院街
镇南团救火会	主任王国藩 队长颜国华	南门口

天字号救火会	主任罗树声 队长杨佩南	沙河街陶公庙
星字号救火会	主任丑梅村 队长湛丙生	社坛街
永清救火会	主任康子仪 队长陈运贤	西湖桥
天符庙救火会	主任王植庭 队长邓在勤	楚湘街

内 外 关 系

旧社会长沙市的消防组织，从表面看，属于“官督民办”，但实质上是商办。所谓“官督”只不过在行政上有所过问，并没给予经费上的长期支持，也没派官员介入消防组织掌握人事权，更不曾在业务、技术培训上过问。所谓“民办”，实际是以商界为主体。从下述两方面可以说明：

从消防经费来源看。“消联”成立后，曾在市政经费内每月拨给银元300元，市保险公司每月捐助200元作为“消联”经费开支，但“文夕大火”后均已停付。光复以后也未恢复供给。“消联”所属几十个救火队的薪饷开支，为数颇巨，主要由殷实铺户承担。其后一度由“慈善救火会”募集，而这个团体也是以商界为后台的。“马日事变”后，实行从房租中抽收2%的救火捐的办法，结果交得起捐的都是些商店大户，而一般市民生计维艰拖欠不交的甚众。抗日战争胜利后，曾由“消联”、市商会、市工会及唯善救济院等团体组织“长沙市救火捐征收委员会”，抽收房租2%作为消防经费，另设“积欠征收处”作收市民积欠的救火捐，实际仍是以工商界作为经济支柱。因工商界比较宽裕，同时为了防火保产，也乐于承担这笔捐款。

从消防组织的骨干人员成分看，发起组织和担任民办消防机构要职的大部分是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如1922年发起和创办“慈善救火会”的就有左学谦，李搢卿等人。左是工商界元老，历任商会会长，李是地方缙绅，同金融界也有密切关系，担任过消联副会长的周季衡，也是商界淮商公所巨子，其他如刘孟坚（卷烟业）、程前鹗（西药业）、劳绍鐸（中药业）、罗树声（酒酱业）、唐典训（竹木业）、粟致诚（纸业）、唐乾五（钱业）、何锡贤（酒席业）、黄兆祥（米业）等人，无不出自商界。上黎家坡救火队的救火机等消防设备，即是华昌烟厂经理彭虞阶所捐赠，所以该队命名为“虞安”救火队。

民办消防组织同保险公司的关系，也同工商界一样，长沙大火前，保险公司曾按月捐赠消联银元200元作经费。因当时保险公司主要承保火险业务，为了公司本身的利益，需要有消防事业作保障。保险公司出了钱，也就介入了消联组织。在消联担任总务部长，掌握经济实权的程前鹗（中西药房经理、火宫殿管事、丽泽小学校长），他实际是保险公司常务理事，与保险公司有密切的人事关系。

消防设施及所办事业

长沙市的民办消防组织建立后，为了加强消防力量，保障防火安全，曾经搞了一些消防设施，并适应消防事业发展的需要，设置了一些宣传机构。

一、修建警钟楼：1913年（民国二年）由唐荣阳（湖南省警察厅长）修建。在当时市内电讯设备很不健全的情况下，作为瞭望及发布火警信号之用。警钟楼建在司门口省会警察厅内，楼高十丈，共七层。最上层有电话机，编号“1000”，电话局用红灯作特殊标记。警钟重100公斤，是用紫铜铸造的。楼上日夜有两名消防员值班，负责瞭望、通讯及敲钟报警。长沙文

夕大火后，铜钟被窃，光复后由消联会重铸，钟上铸有消联会负责人姓名。解放后通讯设备及技术大大进步，无需警钟报警，所以于1954年拆除，代之以新建在南门外红龙庙侧的钢筋水泥结构的瞭望台。

二、设置水源标志。旧社会长沙无自来水，全靠临时吸取井水济急。早先曾在藩正街及皇仓街各建一个蓄水池，但容量有限，平时池外的门紧闭，遇火警时才打开，藩正街水池的门上就有这么一副对联：“事有备而无患，门虽设却常关”。为了救灾时取水方便，避免消防水仗但水时发生纠纷，义勇消防总队曾会同警察局人员对全市公私水井及地址作过一番普查，制出一种标有“井”字、“池”字、“塘”字的木牌，订在水源所在处的门上，取水时目标明显，方便多了。

三、建立“消防公墓”。1932年青石街“半雅亭”粉馆失火，延烧“道隆公寓”。由于该屋牌楼是木板粉灰结构，消防队员切断火路时，牌楼假墙突然倒塌，队员王一和、吴福生、杨琪三人，躲避不及，光荣牺牲，由消联会赠以烈士称号。适有消联视察员周锦椿捐赠南门外砂子塘私有山地一块，由消联会接受，建立“消防公墓”作为因救火牺牲的消防人员的公墓。并在每年清明节由消联会率各分会职员前往扫墓，表示怀念和崇敬，借此进行消防宣传。

四、设立宣传机构。用文字向社会上宣传消防意义，普及消防知识，特别是提高市民“防”重于“消”，以防为主的认识，为此，消联会出过一种《消防周刊》，反映很好，但经费不济，出了几个月便停刊了。后经会长周安汉、副会长劳子卫与宣传部长刘孟坚商量，由刘孟坚个人接办，聘请肖石朋为社长，邹鹤林为记者，刘自任编辑，集贤印行，有不少订户，经费不足时由消联会逢年节给以补贴。这份消防专业刊物勇于表扬批评，并揭发过一些问题，如小吴门住户丁芝生房屋保了火

险，丁放火图赔，当局对此案持放任态度，由于消防报提出“宁可杀一人使一家哭，不可因姑息而使百家忧”的正义主张，得到市民赞许，司法部门不得不将丁芝生判处死刑。1928年，刘孟坚、肖石朋等认为周刊力量仍有限，又组织了一个“消防通讯社”及时向各报社发通讯稿，扩大影响，这个通讯社一直办到长沙大火时止。

民办消防所起的作用

长沙的民办消防历史悠久，组织比较严密，骨干队伍稳定，又一直得到商界支持，市民拥爱，因而在消防上起过较好的作用。

在防火救火方面，由于消防队拥有一批事业心强，技术精湛的骨干（如劳子卫从事消防事业40年，经验丰富，威信颇高）培训了众多召之即来的队员，每遇火警，都能奋勇争先，迅速扑灭，不少人为救火献出了生命（据不完全统计，得到烈士称号，葬在消防公墓的有数十人），所以一直受到市民的赞许和信赖。解放前的长沙，人烟稠密，房屋简陋，火源分散，最易起火成灾。然而有了这样一支消防队伍，才使广大群众的生命财产得到一定保障。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飞机多次轰炸长沙，在灭火救灾、减少战争创伤方面，消防队的功绩也是有目共睹的。

在支援革命事业方面，消防队也作过贡献。如1930年红军进长沙，驻扎了十天，消联会的刘孟坚、戴新鉴、曹达生三人坚守岗位，主动到肇嘉坪36号同红军政治部联系，政治部袁国平主任热情接待并鼓励他们大胆工作，向群众宣传红军的政策，还发给20个红袖章，规定可以凭消联会仿制的红袖章（共仿制了三百个）通行无阻。还用红军政治部名义发布“消防公产，不得破坏”的告示，使消防队伍迅速组织起来。

7月28日晚太平街马家巷，“谦顺粮栈”发生火警，消联会动员各救火队奋力救火，使周围店户未受损失。其后又有几起小火警，均在消联指挥、红军支援下迅速平息。另一次是1949年7月长沙解放前夕，陈明仁将军所部移驻宁乡、益阳，长沙城内防务空虚时，举行了一次消防大检阅，鼓励消防人员除了消防外，兼任治安工作，对维护治安迎接解放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长沙消联会还于1934年应邀派代表去湘潭、武汉、南京介绍经验，促进了外地的消防事业。去湘潭的代表有20多人（包括消联委员，部长及各分会的代表等）。在湘潭的消防检阅式上，消联宣传部长刘孟坚作了长篇讲演，介绍了长沙“防”重于“消”的体会和救护方法等，受到湘潭各界的重视。去南京、武汉两市参加消防检阅的代表是谭常恺（消联委员）、刘孟坚二人。在南京由谭常恺讲演，在武汉由刘孟坚讲演，都受到当地各界的欢迎。

从1931年到1950年，消联先后举行过四次大检阅：

第一次于1931年8月在经武门外协操坪举行。是由当时湖南省主席何键推动下搞起来的。当年五月，何键在中山东路的公馆左侧一家店铺失火，何键深恐殃及他的住宅，他亲眼看到消联救火队员战斗英勇，技术精湛，迅速扑灭了大火，深为赞许，示意要看看全市消防力量。消联会秉承其旨意，举行了一次全市消防大检阅。省民政厅长曹伯闻、省建设厅长余籍传、长沙市长何文元为检阅委员，省公安局长彭灼为检阅司令，周安汉为评判委员会主任，何键担任检阅主席，省、市官员参加评判。全市31个救火队进行了一次现场灭火演习。轰动全市，观众达十多万人，表演后，颁发了奖品和奖状。

第二次是1946年12月长沙光复后，在古稻田坪内举行的。当时消联及各救火队刚恢复不久，消防人员新手较多，组织工作做得不太好，政府也不重视。所以这次检阅规模不大，技术

表演也不够精彩。

第三次是1949年7月5日长沙解放前夕，在当时省警备司令陈明仁推动下举行的，地点在省教育会坪。各义勇消防队、常备队等阵容整齐，由陈明仁担任检阅司令，刘孟坚任总指挥，技术表演成绩较好，陈明仁在讲话中对消防队伍给予了赞扬和鼓励。检阅后整队游行，情绪比较饱满。

第四次是解放后1950年10月在教育会坪举行的。由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徐晃、丁维克等负责同志主持，消防队长刘孟坚担任总指挥，接受党和人民政府的检阅。消防水平比解放前大有提高，拍摄了大批表演照片，后在市内通衢展出过。并将各种照片留存在公安局，历次宣传都悬挂在场内。

长沙市的民办消防事业经历了将近50年的岁月，于解放后不久宣告结束。民办消防人员中有的得到人民政府消防机构留用，有的转到其他工作岗位，继续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

(黄曦龄 整理)

【责任编辑 徐晓吟】

长沙百善堂纪实

刘舜华*

清光绪末年，长沙城北荷花池深深的小巷内，修建了一座格局特殊的大院，占地甚广，前面围墙高耸，拱托着一座堂皇的八字门楼，匾额高悬，上书“百善堂”三个大字。这究竟是个什么场所呢？它是封建统治阶级宣扬吃人的旧礼教的讲坛，是禁锢数百名贫苦无依的孀妇的牢笼，是扼杀孤儿前途的场地。笔者于1915年夏，随同孀居的母亲住进了百善堂，在那里度过了苦难的童年。

在封建社会里，吃人的旧礼教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更给妇女带上沉重的枷锁，有所谓“三从”、“四德”、“女子从一而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等。妇女在这种旧礼教束缚下，死了丈夫，只能低眉敛目，自伤命薄，绝大多数不敢再嫁，又无法自谋生计，自称“未亡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旧礼教的尊严，称夫死不再嫁的妇女为“节妇”，树立“贞节牌坊”，以示表彰；在长沙城内设立了两所收容“节妇”的场所，一曰“保节堂”，一曰“百善堂”，两堂情况、待遇相去无几。住进堂内的孀妇，名曰“吃内粮”，也有不能住进堂内的，每季度由慈善机关发给400文钱或600百文钱不等，名曰“吃外粮”，这是清末、民初长沙对贫苦孀妇、孤儿仅有的社会救济。以下谈谈百善堂的具体情况。

监狱般的“保节圣地”

走进百善堂的大厅，右侧一座整洁舒适的庭院，是管理

* 刘舜华，女，曾在长沙百善堂生活。

人员办公的地方。再往前行，经过一段院落，建有一排颇为整齐的砖房，其中一间，立了神龛，供奉着大清帝国湖南巡抚吴大征的长生禄位牌，因为百善堂是吴大征所倡建，对他香花供奉，以表“感恩戴德”之意。神坛两侧，悬挂一副对联，上联是：“薄命何求？托庇蜉蝣延喘息”。下联是：“遗风未泯，××××××××”。从这样一副记不完整的残缺对联的文字上，已可清楚地看出建堂的目的了。再前进，是门卫、传达室，名曰保卫或传达，实际上起着监视的作用。走到这儿，百善堂里的建筑物就到了尽头，迎面而来的是木栅内灰暗拥挤的建筑群。用木板和篱织壁建成的房间，是嫖娼的住房，它与栅外的高墙广度对比鲜明。

这16排住房，外层6排，称为外堂，内层10排，称为内堂，按“金石其心，松筠比操，贞风劫世，清节流芬”16个字编为16条号子，每条号子都有12或13间房，例如金字号，就从金字1号到12号，每条号子都是如此编排，合计有200间，每家住一间，能容200家。尽管编号的16个字对“节妇”赞誉得如此崇高，而对待“节妇”却按管理囚犯的办法，以示真正的“保节”。在内、外堂的总出口，用直径约15厘米的圆木柱做成栅门，并在高约1.3米处装上一条粗大的横杠，用铁器将两扇栅门扣住，锁上一把长约尺许的大牛尾锁。平时不开门，嫖娼不能外出，每月逢五逢十才将栅门打开，这条横杠并不取去，嫖娼低头躬身，才能出入。平时小孩出入，是在栅门右扇下面开个小口，从这缺口钻进钻出，方法是，先踏出一只脚，再把头钻出去，把身子伸出来，再提出另一只脚。我们戏称之为“钻狗洞”，那时年纪小，还感觉不到这是一种侮辱。嫖娼有男性客人来会，要由传达室通知管堂人（内、外堂各设一名女管堂人），由她叫喊：“某字某号有客会”，然后嫖娼出来，站在栅门内与站在栅门外的客人谈话，和探监的情况一模一样。

孀妇要买蔬菜，在栅门外有卖菜的小贩挑来，隔着栅门买。那时吃鱼吃肉是稀罕的事，靠卤菜、辣椒下饭，小菜也买得不多。

更有一件费解的事：栅妇死了，棺木不能从正门抬出去，只能从后门抬出去。风、励两条号子中间留下一条宽约三米的过道，便于出殡。孀妇们常常存着疑问：“既然守节光荣，为何死后不能从正门出去呢？”听说这个办法，是在死亡的孀妇亲属反对之下才废止了的。

孀妇每人发一块木栅号牌，上面写着住房字号和姓氏。那时的妇女，不栅用自己的名字，是用夫家的姓和娘家的姓合起来称为某某氏。请假外出，要将号牌送交传达室，请假三日以上，还得将号牌送去管理人员办公室。

堂内的规章制度，在我们居住的时间内，未见明文规定，也不见口头公布，由管理人员说如何办便如何办，孀妇只能绝对服从遵守，不敢栅出任何意见和要求。管理人员对孀妇的疾病、痛苦，一概不闻不问。只是隔二三个月，进号子察看一番，名曰“查堂”，一行数人，走走看看，主要是交有不有人不请假外出或久假不归，其余的事，他们并不关心。

孀妇有申请出堂的自由，为子女成长栅栅养母亲，愿意接母出堂，提出申请，名曰“辞粮”，这在孀妇中是最称心的事，也是最引人羡慕的事，一些近邻，多鸣爆竹相送，以表祝贺，这在孀妇中只占十之二三。还有的是带着儿子入堂，不幸儿子死了，失去希望，只得出堂另作打算。更有的是受不住堂里沉闷空气的压力和生活上的熬煎而出堂的，这也是少数。

苦难的生活

百善堂属于社会救济性质，非由政府直接管理，是当地士绅把持着。经济来源不详，听说有湖田作为主要收入。要求入

堂，只要有当地有权势的士绅的条子就可以批准。后来要求入堂的人多了，不够应付，就用定期抽签的办法解决。

孀妇的年龄，多数是二十至四五十岁，六十岁以上的极少。其中绝大多数是贫苦无依，求一栖身之所；也有家境较好为“保节”而来的；更有受家庭压力硬逼着来“守节”的。

入堂孀妇孤身一人的极少，多数是拖儿带女，还有的带着家婆或自己的母亲，一闾不足9平方米的房间，挤着两三代人，包括厨房、厕所也在内。冬天用小煤炉煮饭，便带烤火；夏天把炉灶放在房外不满1米宽的过道上，所有盆桶和其他杂物都堆集在这里，往往来来的人，要从这里经过，走路是要十分小心的。

长沙有句俗话：“人穷水不穷”，在这里用水也是困难的。在勋字号两间房的中间，有一眼方口大井，装上轱辘，系上两个大吊桶，没有大力气是汲不上水的。堂里雇用两位男工人专司挑水，按人口给水，1至2人每日给水半担，3人以上每日给水1担。因此用水得格外节省，数人共用一盆洗脸水，还要把洗脸水留着洗衣，洗菜的水留着倒便桶。遇上下大雨，连忙用盆、桶接雨水作补充，若能接满一桶，就非常高兴，留作饮用，称之为“天花水”。

孀妇每月定期可领到一点钱，称为“发粮”，是否按人口计算，就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们母女两人每月领到湖南官钱局印发的纸币2400文。当时军阀混战，长沙地当南北要冲，战祸连年，纸币贬值，物价不断上涨。每月领了这点钱，首先买米和煤，油盐蔬菜就得看着办，靠油萝卜、酱辣椒送饭是极平常的事。遇着荒年买不到米，吃皇仓的霉米，弄到一升两升，就欢天喜地了。岁暮天寒，吃不饱，穿不暖，眼巴巴地盼望一点救济，偶尔有富人为了博得慈善的美名，来堂发散米粟，每家一升二升。还有慈善机关——恤无帮堂、积善小补堂也在年关

发散米票给穷人，多由执事人员支配，偶尔能得亲友帮忙，弄到三、五升米票，就算意外收入了。

孀妇多数是中年人，有劳动力的可以参加生产，增加收入以改善生活。大约是民国初期，堂内办染织和缝纫工场（手工），那时孀妇欢天喜地，纷纷报名参加，为了避免姓氏重复，不用原来的某某氏，而是在姓氏之后加上自己的名字，如“蔡李顺”、“彭李娟”。虽然工资低，大家生产劲头仍很大。惜开办不久，由于军阀混战，时局不稳定；加之负责人经营不善，产品没有销路，这个工场以亏损而结束，孀妇们又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去。

孀妇的另一生产门路是刺绣，关于这个情况，下节再详述。

孀妇长期过着这种苦难生活，悲伤到无可发泄之时，便痛哭一场。经常在夜深人静、更鼓点点中传来一阵凄凄切切的哭声，我母亲每每听到，触动自己心事，就陪着下泪，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难忘的印象。

旧社会妇女死了丈夫，总埋怨自己的命不好，对人生感到没有希望，有的就长斋念佛，说：“不修今世修来生”。还有个别的人，因精神郁结，发展成为神经病。

尽管生活困苦，而孀妇之间，相濡以沫，关系相当密切，彼此之间，以伯婶相称，小孩以兄弟姐妹相称。一家有事众家帮，满肚苦水，互相倾诉，孤身一人的，遇有疾病，送茶送饭，煎茶煮汤，争相照料。平时米、油、酱、醋彼此通融，更是常事。

但其中也有些乘人之危，放高利贷进行剥削的。例如：借出光洋10元，每月收利息1元，而且第一个月的利息，先从本金内扣去，实际上只给9元。如果以后到期付不出利息就以复利计算。借贷者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得饮鸩止渴，其后果

是不堪设想的！

孀妇后代的出路

孀妇多钟爱儿子，认为他是传宗接代的人，是自己未来唯一的希望。想培养他成材，却没有力量。民国初年，私塾少了，中、小学也办得不多，按当时学制是：初小四年，高小三年，中学四年。孀妇一般勉强能送男孩念完初小或高小，送去铺店当学徒或学手艺，三年后出师当个店员或手艺人，一月能有数元工资收入，贴补家用。但能够这样做的，为数不多，因为当徒弟既要有亲友介绍，又要有一笔钱做进师酒和出师酒。那些无法去当学徒的，在家里闲不住，终日到外边游逛，母亲无从约束，难保不沾染些坏习惯。年满16岁的男孩，按堂规不准在堂内住，只好寄养在戚族家里，慢慢设法安置，有几个无处寄养的，就在设立吴大征长生禄位牌的风子里，架个临时铺位，一日三餐由母亲送饭，满满一大碗饭，上面盖些菜，插一双筷子，送给等候在棚门外的儿子。

有的在儿子就业之后，积攒了一点钱，娶房媳，养个孙儿，全家欢喜。可是在旧社会，工作没有保障，一旦失业，只得出外谋生，留下妻儿，妻依靠婆母生活，也住到堂里来。像这样的人家，儿子能不时寄点钱回家，还过得下去，有的儿子一去不归，音讯全无，让祖孙三代在一处苦熬着。

孀妇对女儿所抱的态度与对儿子不同，无法养活的，就将女儿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当时收童养媳的大多也是贫苦人家，而且对童养媳每多虐待。女孩子受不了，便逃回娘家，做母亲的打着、骂着，又把女儿送去。有一罗姓人家，三回五转地把女儿送去，还是逃回来，那位母亲下狠心对女儿横施暴虐，打得她皮开肉绽。事后，那位母亲对邻居说：“我是出于无可奈何啊！”邻居们只报以同情的目光，并不责怪她。也有一些比

较开明的母亲，送女儿上一两年学，说：“开开眼，免得像我们一样，做睁眼瞎子”。但更多的是不送女儿上学，等到十一二岁，就在堂内学刺绣，从师三年，或自己带着女儿绣花。

湘绣本是驰名全国的，嫗妇中就有不少技艺精湛的人。而且这门活计完全是手工操作，不受设备限制。当时长沙八角亭一带，开设了几家规模较大的绣馆，产销绣品。将屏幅、斗方、对联、被面、枕头、衣、裙等等，先由画工画好或印好——如人像、人物、山水、飞禽、走兽之类，发给绣工去绣，工价由绣馆规定，视工夫难易，多者一件工资二三元，少者四五百文。绣品售价极高，而工资如此低微，剥削是很严重的。嫗妇及其女儿们视刺绣为唯一生产门路，都去绣馆承接绣品。刺绣是非常细致复杂的工作，一针一线，煞费心思；而且每日自朝至暮，直到深更夜半，伏在花棚边，而每月所得，至多不过五六元，一般是一二串钱。而绣馆验收绣品，又极苛刻，多方挑剔，或指责工夫粗糙，或指责配色不当。有时不慎在绣品上弄上一点小迹印，画工只须加上一枝一叶，便可以遮盖下去，却故意刁难，扣去工资或责令赔偿，她们只能低头忍受，不敢抗争。有的发货人还利用发货的权力，向少女们调笑，她们也只能隐忍着。“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不啻为这些姐妹们写照。

女儿陪伴着母亲，过着凄凄惨惨寂寂的生活，和外界很少接触，加之当时社会的婚姻嫁娶，讲究门第，有人认为百善堂的姑娘门户低微，不愿选作配偶，因此过了待嫁之年，只能作人家继配。更有的受着母亲悲观消极思想的影响，与母亲一道吃斋念佛，矢志不嫁。待母亲去世，就申请入堂，住在母亲原住的号子里，被称为“贞女”。这虽是极个别的例子，然由此可见封建思想毒害之深远！笔者由于有一位开明的母亲，不顾我外祖父的反对和亲友们的闲言碎语，坚决送我入学；又得到

我的老师崇实女校校长胡兆麟及姑父贺益仁的支持和帮助得，以完成师范学业，没有走上与这些姐妹们相同的生活道路。

百善堂的变迁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运动，反封建的口号声，也传进了百善堂。大革命的风暴，席卷长沙城，涤荡着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影响所及，百善堂内孤苦孀妇的生活，也出现了一些变化，监牢式的栅门终于打开了，一些侮辱人格的陈规陋习也都逐渐取消，恢复了停办已久的缝纫织造工场，孀妇们参加生产，增加了收入，不仅改善了生活，政治、经济地位也有了稍许提高。她们的子女，争取入学，较多的有了就业机会，有的还参加了北伐军，进了军事学校。总之，百善堂也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化。但妇笔者那时已从事教育工作，奉母出堂，未能了解到更多的情况。抗日战争发生后，长沙处于前线，国民党反动政府对这样一些残老孀妇，自然无暇顾及，听其扶老携幼，各自逃生。建国后，人民政府将保节、百善两堂合并，成立妇女教养所，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的性质，办成了生产自救、社会福利性质的单位，原百善堂的人们，才从根本上得到了解放。

【担任编辑 朴永子】

长沙娼妓之兴废

谭文俊 渔 夏

娼妓之成因

中国娼妓出现，约有3000年的历史。追溯源流，分为5个时期：殷商时为巫娼时期（一称宗教卖淫）；西汉至东汉，为“家妓”、“官娼”发生时期；三国至隋，为“家妓”、“官娼”发展时期；唐宋至明，为“官娼”鼎盛时期；清为私人经营娼妓时期；至民国虽提出禁娼废妓，但官娼私妓，仍流毒社会。

其盛行的原因之一是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割据一方，这些称霸地方的“土皇帝”各有妻妾10多名，当官为政者，尚不能禁己，又怎能禁人？

此外，“女子无才便是德”，妇女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妇女就业机会少，经济上依附于男人；社会道德观与贞操观日趋沦落，不以当娼为耻；从而助长了娼妓的风行。

长沙娼妓之繁衍，约在民国4年之后。在此之前，各酒楼饭社，尚无妓女踪迹。她们大多寄居樊西巷、仁美国、大官园一带。妓女以苏州、扬州外来者居多。后国难当头，时局动荡，加之湘省连年遇水、旱灾和兵燹之患，有女者无法生活被迫为娼，堕入“平康”者不知其数。故延续10年之后，长沙沦为娼妓者越来越多。究其来源，主要有：

一、农村妇女因受封建婚姻制度的迫害，不堪虐待，而只身进城谋生，辗转陷入娼门；二、良家女子或幼女，遭歹徒拐

骗，卖入妓院，或因家境贫困，典押给妓院；三、妻子被丈夫遗弃，或染烟毒嗜好堕入青楼；四、因夫妻生活不谐，关系破裂，或丈夫远去，久未归家而寻求外遇者；五、为“三姑六婆”、“蝴蝶党”等帮会用金钱引诱或用骗术使其陷入火坑；六、个别女招待、弹子姑娘、舞女、歌妓、因羡慕虚荣而操妓业者；七、因收入不足难维生计，兼以卖淫为副业者；八、被拆白党等行骗秘密组织，用“仙人跳”、“放白鸽子”等骗术引入火坑者；九、因失恋自暴自弃而离家出走，生活无着而陷入虎口者；十、少数好逸恶劳，好吃懒做，追求享乐而堕入烟花柳巷者等。

1948年9月12日，长沙《小春秋》报披露：“饥饿把许多人赶到男盗女娼的路上去了，本市的乐女，今年比去年又增加了一半。昨天，医院又体检了几十个申请做乐女的妇女，发给证书的有32人。”可见，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到了何等程度。

娼妓之分布

长沙是湖南省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随着资本主义的侵入，又成为商贾云集之地，所以娼妓更加盛行。据记：“民国19年前，由公安局登记者，计千五百以上。”民国初年，军阀、政客、商贾等，狎妓酗酒，相习成风。甚至政团、军旅联系公事，商贾洽谈生意，也要选在妓院。当时，长沙有名的妓院“清香堂”，“顾客”盈门，每当社会上有出风头的事，总与“清香堂”丝关蔓连；其次，“爱福堂”和“清莲堂”亦是政治角逐的场所。小瀛州、大官园、百花村、仁美园、古道院等，都是当时中、上等妓院（亦称堂班）集中之地。大西门外的墙湾子、流水沟及小吴门外的煤堆子、经武路、便河边一带，则为下等娼妓出没场所。

抗日战争胜利后，长沙娼妓有增无减，娼妓的分布也有所变化。上等妓院（堂班）多集中在大东茅街、小瀛州、百花村、仁美园、樊西巷一带；中等娼院（窑班）则集中在大官园、卜官园、宝南街一带；下等妓院（台基）则散居于便河边、流水沟一带。解妓前夕，长沙有大小妓院250余家，台基61处之多，妓女约800人。

娼妓之类别

娼妓除按知名度和贞操程度分为上、中、下等外，还可分为三大类：

一为公娼：即得到行政官厅的许可纳一定的“手数料”（俗称花捐税），领有营业执照，名正言顺的正式开设堂、窑班。娼门之中，超级的为堂班，其规矩较严，妓女必须通晓歌艺，平时过着豪华生活。这类超级妓女专门应酬，周旋于达官贵人、大贾富豪之间，是鸨母、堂老板的“摇钱树”。

二曰私娼：未取得营业执照而秘密卖淫者。长沙私娼多于公娼。由于此类私娼所居之地分散隐蔽，其活动尤为诡秘。若无人牵线“带马”，则难于入门。私娼中最为卑贱者则为钓台（即临时之秘密香巢，提供场地者要分成）。此等娼妓，更甚于公娼和一般私娼，误入钓台者，多系良家妇女，或为一时财物引诱，或受“性自由”之迷惑，堕入火坑，铸成大错，遗恨终身。

三是土娼：此类娼妓，来源不尽相同，但多寄寓于饭店、旅馆之中，其规格逊于堂班而高于一般私娼。这类妓女，经济拮据，服饰不能与超级妓女媲美，要求助于鸨母，甘将其身作抵押，行动受鸨母制约，俗称搭班。这等妓女，有擢升入堂班的，也有落荒成为私娼的，是娼妓中一个不稳定的阶层。

此外，还有散娼、集娼。按卖笑地点分为：坊里制——以

街巷为单位；堂院制——以房屋为单位；夜合制——台基；秘密制——暗娼。后两者无固定地点。从旧长沙妓女的分布情况来看，则是这样自然形成的。

娼妓之局規

生客欲与堂班妓女交游，须依妓院格局和规定，循序而行，过从密后，成为入幕之宾，然后感情融洽，始可谓交情之熟客。普通彩头有如下种种：

一曰喊堂：嫖客在旅社酒栈之中，欲招徕酒者，必先出堂条一纸，作催花之符，飭请茶役送至妓院，距离不分远近，每条给力资洋1角。妓女奉召而至，是为“出堂”。此项堂条，由旅社酒楼事先印好，供嫖客备用。出堂例价收取1元出堂费。然一般慷慨嫖客，往往多给2元不等，也有阔少给数元或数十元，借此显示豪富，讨妓女更大欢心。

二曰打茶围：打茶围即嫖客迳赴妓女妆阁小楼，由妓女供给茶烟糖果，而不直接索取费用，面图常来常往，寄希望于未来。此所谓“香饵吊金鳖”，“吃小亏占大便宜”。

三曰做花头：做花头即嫖客呼朋邀友，三五结队，麇集妓家，打牌与宴客。这亦是结识妓女之途径，其开销，每次至少五六十元以上。纵嫖客每日获100余元之收入，除正当生活开销之外，所余仅可作一次去妓女家之用。

四曰铺堂：所谓铺堂，即嫖客初次在妓女家度夜后，与妓女经历一段相好交往，妓女探知嫖客名望、钱财之虚实，认为可以结交，于是主动提出要求“铺堂”；或者嫖客察觉妓女对自己有好感，方托同僚表达倾慕之忱，经过对方同意，遂约期邀客，届时聚集妓女家，设席宴请主宾，有群妓环而歌唱。

翌晨，仆奴、娘姨、姊妹，入室道贺，籍素犒赏，铺堂犒赏，一次掷百十元，倘嫖客财力不胜，而外表亦不露难色，富

家纨绔子弟，如不加约束，一个铺堂可以弄得他倾家荡产。

五曰挂衣：即嫖客与“清倌人”（黄花妓女）初次同枕，一切手续与铺堂略同，唯须鸣鞭炮、燃蜡烛（俗称点红蜡烁），开支之大，更胜过铺堂。妓家胃口特大，借此敲诈嫖客，如吃酒须摆双桌，犒赏须加二倍，称好事成双，实为一饱私囊。倘嫖客自不省悟，欲留恋不舍，则妓家敲诈伎俩的花样时刻翻新，防不胜防。一次挂衣，可使嫖客囊空如洗。

此外，还有所谓“开盘子”、“包盘子”、“挂席”等名目，这些名目排场，时髦一时。长沙系一内河港埠，虽不及上海等大城市娼妓之盛，但卖笑生涯之发展，也似有不可遏制之势。

妓女的遭遇

堕入“烟花”的妇女所受的痛苦和压迫，非一般人所能想象。她们一入妓院，便是妓院老板、鸨母的专利商品和嫖客的玩弄品。她们没有自由，得不到同情，处于社会最底层。每天被迫卖笑接客，强作欢颜。如是本家妓女（即年幼由鸨母养大，成年后被迫为妓），接客所挣的钱全部归养母。有时接不到客，就挨打受骂，受尽百般凌辱。有的妓女怀了孕，被鸨母逼着吃药打胎，没等恢复，就得继续接客；来了月经，鸨母就强迫喝灰汤，坐冷水盆，提前停经；生了鱼口疮，老板用剪子剪开搽上盐水，仍要接客。外出有人监视，以防逃跑。有的想从良，跳出火坑，鸨母便要索取一大笔赎身钱。老板还利用高利贷剥削妓女。

如属搭班的妓女，接客所得的钱，要同老板四六或三七分成。另外还受“带马婆”、“王八蓑衣”等恶棍的欺榨。他们心狠手辣，为老板逼良从娼，追寻逃跑的妓女，蹂躏妇女更是肆无忌惮。

妓女在精神和肉体上所受的摧残，更令人发指。绝大多数妓女患有性病（梅毒、淋病）和其它病症，面黄肌瘦，靠胭脂花粉招徕嫖客，强作欢颜取得客人欢心。1948年12月，长沙卫生院给所谓上等妓院扬州班49名妓女进行检查，患淋病者34人，患恶性梅毒者3人，其余9人，均患有不同疾病。其他中等、下等妓女和一些私娼、暗娼土娼就可想而知了。

娼妓之泛滥

妓院深巷有之，门闾之内有之。不受任何约束，只须缴纳“花捐”，便可得到政府的合法保护而存在。虽有什么“新运会”救济妓女提案；一些社会贤达志士也有什么“废娼之我见”见诸于报端，但无济于事。持续几千年的娼妓制度，成为社会公害。如下场景可见一斑。

每当华灯初上的时候，一群群妓女，站在妓院门口，招徕“客人”。甚至还有八九岁的小姑娘在妓院附近“拉皮条”，主动告诉嫖客，她家的门牌号码，家里有妈妈和几个姐姐，然后，便一溜风似的跑了。还有那茶楼里的妓女装出笑颜，躺在茶椅上，露出雪白的大腿和内三角裤。待茶客叫好号子后，便手掖小皮包向茶客走来。

有所谓“空心嫖客”者，每逢过年过节嫖客稀落时，便乘隙而入。他们为“姑娘”大做花头，遍邀朋友，一次辄取数百十元，欢娱散去，“姑娘”不得不贴开销，赊酒席，赁台高筑。此类嫖俗，多为封建把头 and 地头蛇。

有次，某嫖客来长客居，经茶房介绍一妓女伴寝。该妓女因另有“茶局”，故来时较晚，嫖客也未细究陪妓为何许人。翌晨醒来，已日上三竿，嫖客方知枕边人乃是自己的表妹。两人面面相觑，难以为情。

娼妓之废除

建国后，经过民主建政，清匪反霸和“三反”、“五反”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封建把头 and 封建势力。1953年1月14日，长沙市人民政府根据“共同纲领”第六条关于“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的规定，召集了市民政局、公安局、卫生局、文教局、法院、劳动局及市政协、市妇联等有关单位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长沙市收容处理妓女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市长尚子锦，副主任委员为罗秋月、杨极，并推选了7名委员。会议还决定由市民政局、卫生局、公安局和妇联等单位，组成新生妇女教养院，院址设在河西含光中学校内，由范明亚任院长，向全市人民发布封闭妓院之布告。并于当月27日深夜，由市公安局封闭了全市妓院，收容妓女115名。依法逮捕了罪大恶极的妓院老板、鸨母29人。对其中拐骗、贩卖妇女，逼良为娼或残酷虐待妓女至死者，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了惩罚，并没收其全部或一部分财产，充作改造妓女之经费。公开的妓女被收容后，小巷僻静之地仍有流散的暗娼活动，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因此，1957年前后，又进行了一次清除，陆续收容140余人。至此，娼妓活动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健全，基本绝迹了。妓女被收容后，政府和有关部门做了大量的教育、改造和安置工作，使她们各得其所。有的结婚，组成了新的幸福家庭。还有的经过改造，发愤求学，考取了大学。

【责任编辑 徐境吟】

龙 潭 首 义

石老保*

永綏县(今花垣县)苗民武装革屯运动,最先是从我们龙潭开始的,我参加了这次举义。

我们上六乡(今龙潭镇)的龙潭坝,下九乡(今吉卫镇)的水洋坝,花垣镇的丰和坝,都是县里有名的田坝子。当时,全县大部分屯田每亩只缴纳租谷一石二斗。龙潭坝有近千亩屯田,由于土地肥沃,水源充足,一律按上等屯田纳租,每亩需缴纳租谷一石六斗,比其他地方的屯租都重。

1934年,龙潭一带遭到特大水灾,1935年又遇上了百口大旱,许多田地颗粒无收。不少屯户缴不起屯租,只好拖儿带女,去外地逃荒讨米,龙潭河两岸的大片肥田沃土都荒芜了。可是,屯官们坚持“荒田不荒粮”,仍然严令催交屯租,逼得我们无法生活下去。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真实地反映了我们苗民的苦难生活。

龙潭生好一坝田,
还有一坝在湾湾。
屯官吃的大米饭,
穷人没有米过年。

继 父 被 害

我们乡的守备(又称总爷)石达轩,逼租尤为凶狠。他的那帮仓兵,时常捆人打人,老百姓无不恨之入骨。我的继父石春禄是开染坊的,经常外出做生意,能说会道,结交很广。因此,

*石老保,苗族,82岁,当年龙潭起义的参加者。

附近几个村寨的电户，大家凑盘缠，请他和大坪村一个善于言辞的苗巫师张巴柱，一同到凤凰县陆军新编34师电政处去告状，揭发石达轩贪脏枉法，盘剥电户的罪行，要求电政处查办石达轩，以平民愤。石达轩得知此事后，便用金钱买通了官府。结果，不但告状没响，反而把我继父关押一年多。我继父回到窝坨寨后，石达轩又收买手下人去暗杀他。1936年正月，继父为我妹妹准备嫁妆，石金文来到我家，说永绥城里的帐子便宜，邀我继父一同进城去买。我继父不知是计，便答应了。第二天是正月十五，继父在家等了好久不见石金文的面，便独自去麻场取钱，但一去数日未归。母亲请人去寻找了很久，可是连尸骨也没有找到。直到后来才知道，继父是被石达轩买通石金福、杨再兴、石金文等人暗杀的。

继父被暗害一事引起了公愤。特别是张巴柱，他到各村秘密串联，物色青壮，准备待机行事。窝坨寨屯户石启云积欠电费较多，仓兵上门逼租，抢走了他给妻子坐月子吃的鸡蛋，还把他打得死去活来。于是，石启云下狠心和张巴柱一起去联络蚂蝗塘石维桢举义。石维桢时年26岁，平时好打抱不平，见他俩来邀，便满口答应。

歃血盟誓

1937年1月26日（农历腊月十四）清早，石维桢、石启云、张巴柱分头邀约龙潭附近的窝坨寨、杨家寨及各乡的电户代表，在虾公坡秘密开会，歃血盟誓。

虾公坡距龙潭场大约10华里，坡上有块比较平坦的场地，当地人常在这里练拳习武。这天上午10点钟左右，龙潭及各乡电户代表都聚集在这里。来开会的电户代表每人拿出一个当100文的铜钱，丢入会场上面的一个背笼里。我们花了6吊铜钱买来一只家猫，又用6吊钱从土地坪请来石友生“骂猫”（按规矩

由一位公道正直人“骂猫”)。会场中摆设石案，点着香烛，由石友生“骂猫”后，当众杀猫，将猫血滴入酒内，并叫大家跪在石案前，由石友生领念词咒：“一把钢刀五寸长，倒下平地来砍香。上不认兄刀下死，下不认弟刀下亡。真的同娘同爷，假的同猫同血。上不斩天，下不斩地，单斩抛人卖客。哪个反水，就象这只猫，就象这柱香！”念完咒词，石友生首先一刀将香砍成两截，然后由每个人自己发誓：“若我不仁不义，反心倒意，照香行事！”一刀把香砍断，随即拿起装血酒的竹筒，呷一口血酒。吃血酒后，又由苗巫师张巴柱做“法事”，口念：“石春禄，你要在黄泉之下显灵，助我杀死石达轩，为你报仇雪恨。”

歃血盟誓时，石维桢说：“明人不做暗事，杀屯官要杀在青天白日之下。”他提议选出几个胆大敢为年轻壮士去刺杀总爷。大家当场推选出石维桢、石维金、石老挽、石生富、石玉章、石树林、石保玉、吴继臣8人，每人付给25块光洋做“洗手钱”。上五乡的龙云超还向大家讲了隆子雍晋省请求废除屯田制度的情况。他最后说：“现在已是年边无日了，大家先过个安稳年后再相机行事。”大家觉得他讲得有理，商定年后动手。

揭竿起义

我们下山快到古老桥时，碰见千总石金福和仓兵吴老六、石昌林、杨再兴等4人，拿着铁链，正在威胁两个老婆婆：“抗交屯租的，要杀几个人给你们看看，不怕你们龙门寨又出苗王*。”那两个老婆婆讲尽了好话，千总和仓兵才说：“限你们明天交租，不交清就要捱索子。”说完，还把铁链抖得叮当作响。石胜见此情景，跑来告诉我。于是我马上邀集大家拿起梭标，怒不可遏地冲进古老桥寨子。仓兵见我们人多，拔腿就跑。千

总石金福跑到区长石述尧家里，当我们赶到时，他又从屋后挑手吊下楼，逃进了石海成的屋里，用根木头顶住篱笆门。我们又一窝蜂地围了上去。血气方刚的石老三，手拿踩锹，几下把门掀破了。石金福顿时慌了手脚，跑不到几丈远，就被石仁华等人用梭镖戳死在地。此时，仓兵吴老六吓得魂不附体，连忙窜进石甲云屋里，躲在床下，用口大锅盖在身上。当我们发现床下铁锅边露出两只脚时，就用梭镖掀开铁锅，将吴老六捅死。仓兵杨再兴跑到田坝边时，见后面追赶得紧，便慌忙跳到水田里，石林朝挥舞柴刀追下田，将他砍死。仓兵石昌林见三个同伙被杀，没命地朝屯仓方向逃跑，他刚刚跑到新场，也被结果了性命。

我们惩罚了一个千总和三个为虎作伥的仓兵，为民出了一口气。这时，石达轩的大儿子石长寿从杨家寨玩耍回来，听说仓兵被杀，拔腿就跑。我们哪肯放过他，跟着就追。当石长寿跑到天王庙坳上时，农民唐兴华等踩土回家，正路过这里，见我们追杀石长寿，便挥起踩锹朝爬土坎的石长寿铲去，石长寿当即毙命。

石维桢等人见我们已提前动手，就去寻找石达轩。这时，石达轩已经闻风，带着石洪恩向青龙坡逃匿。他身穿竹布长衫，非常显眼，刚逃到麻林山就被龙潭河对岸的人发现，他又慌忙脱掉长衫，转身窜进龙潭场上饶老满家里。石维桢和石维金闯进饶老满家，抓获石达轩。石达轩向石维桢跪下求饶说：“孙儿（石达轩在家族中辈份大）呀，你怎么跟人家干这种事，求你给爷留条命。”石维桢义正辞严地斥责道：“你催逼屯租，不顾百姓死活。留你一条命，不知要死多少人！”说着，手起刀落，将石达轩杀死。弟兄们为了给石春禄报仇雪恨，又将石达轩尸体砍成四截，还把钱和谷塞进他的血嘴。杀死石达轩后，石维金等人当即赶到阿弥陀佛（地名），见石达轩的二儿子石

老碑正在此地放马，便对他说：“你爹被人杀了，你还有心思放马？”石老碑听了就要回去取枪，石维金等人乘其不备把他也干掉了。

次日，龙潭逢场，场上人挤人，争相观看石达轩等人的尸体。众百姓都悄悄地说：“杀得好，为我们穷人出了口气。”这天中午，区长石述尧同永绥县政府一个科长及刘队附等8人，来到现场验尸。这伙人翻弄了几下尸体，二话没说，就溜回县城去了。

石维桢带领我们干掉石达轩后，正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明濠寨的龙正波，听到石维桢在龙潭杀官起事的消息，很是佩服，便自动带一帮弟兄来和石维桢等人一起干。他出谋说：“事情搞起来就要搞到底，缩不得脑壳。老百姓被屯制害苦了。我们先打开屯仓，让屯户挑屯粮，解决生活困难问题，这样群众就会拥护和支持我们。”石维桢听了觉得有理，随后，他和龙正波等人，打开了龙潭屯仓，老百姓都来挑屯谷，劳力多的户，有的挑得十多担。挑完谷后，将屯仓拆掉，搬到离农户远的坪场，放火烧掉。过了几天，石维桢又带着我们去打开了铅藏坪仓，但结果一无所获。原来，下五乡乡长张次准见我们打开龙潭屯仓后，就叫手下人抢先把谷子转移了。我们一怒之下，放火烧掉了铅藏屯仓，砍断了区公所的电话线，砸毁了区公所的桌椅门窗。区长石述尧早已吓跑了。与此同时，龙正波从茶溜请来一个毛师傅写标语，向广大屯户宣布了石达轩的罪行，从而使抗屯租斗争得到广大屯户的支持。

■ 困 罗 军

县长李卧南听到石维桢、龙正波为首在龙潭、铅藏等地杀屯官、烧屯仓的消息后，于2月2日命令屯备军11大队长罗静平率两个中队60多人枪，从吉洞坪进驻龙潭，驻扎在龙潭场上饶

章保家里，叫嚣要搜剿肇事的苗民。

面对这种局势，龙正波对我们说：“屯务军来了，你不打他，他要打你，非水不犯河水是做不到的。伸起脑壳让人家砍，不如拿起刀枪同他们对着干。趁他们刚到龙潭立足未稳，杀他个措手不及。”大家听了都很赞成，于是马上分头准备刀枪。那时，我们人多，但只有几支旧枪，多半是拿些梭镖、马刀和勾勾刀。天刚煞黑，我们就在屯务军驻地周围，放起三连炮和雷公炮，虚张声势。罗静平听到炮声和喊杀声，急忙带着队伍爬上了凉子山，还从上七乡（今麻栗场镇）排谷美调来屯务军唐树清中队增援。唐率队在深夜偷偷爬上了凉子山。

2月3日清晨，窝坨寨的石启云跑到各寨敲锣聚众，准备围攻屯务军。此时，罗部的三个屯务兵正在鸡卡树（地名）张老大的屋里煮饭，他们挑饭上山时被我们杀掉了两个，另一个班长逃脱了。屯务军没有早饭吃，又冷又饿，只好在山上架起石块生火用脸盆炒黄豆吃。晨雾未散时，我们对屯务军只围不攻，吹起牛角和甲马号壮威。大约上午10点钟，我们龙潭上下河的屯户都赶来参加战斗，上五乡的龙云超，下五乡的石永安也率众赶来增援，我们的人少说也有一二千。罗静平见山脚人山人海，刀枪林立，杀声震天，吓得惊恐万状，不敢贸然下山。我们的弟兄几番向凉子山上冲锋，但都被屯务军的木把手榴弹打退了。不过，没有伤着人。到了下午，屯务军实在捱不住饿了，又怕我们苗民冲上山，性命难保，于是向山下喊话：“大家都是本地人，枪也是本地的枪，只要你们不打了，要枪好商量。”罗静平派中队长张大忠下山同石维楨谈判。

受 骗 上 当

张大忠走到山脚，见我们苗民个个义愤填膺，吓得战战兢兢

兢，他恭恭敬敬地对石维桢说：“罗大队长请你上山，他要和龙桢是诚敬香拜把，结为弟兄。”石维桢开始不信。张大忠为成意，赌咒说：“如果我们有半点假意，电打雷劈！”维石了认为，与罗结拜，既可停止战火，又能充实力量，增加枪支表一举两得。于是，他叫人捉来一只大公鸡，带着张巴柱、石生富等人，与张大忠一起上凉子山，与罗静平结盟。搞到日暮时分，石维桢才带着张巴柱等人下山，并命令众人撤围。这时，屯务军才要死不活地下了山。他们只缴20支旧枪，有的连通条你明有。当时没屯务大队的人都在我们窝坨寨学校里落脚。石维桢还出钱杀了我姑爷家一头肥猪，用酒肉款待他们。当时，龙正波等弟兄对石维桢的这种作法很不满意，责备他不应该和屯务军合伙，说：“羊不能和虎在一起，我们和屯备军合伙也早要吃亏的。”石维桢执拗地说：“既然喝了血酒，大家就一家人了。我们不懂军事，以后让罗静平当我们的指挥官，好吗？”龙正波只好随石维桢的意。有的弟兄仍不服气，主张干掉屯务军，结果被老总爷石贵清制止了。

2月4日天刚亮，罗静平对石维桢说：“我们合在一起了，屯务军会来围剿的，我带人去堵卡，阻击县城来兵。”石维桢信以为真，和罗静平等人一起走到鸡卡树，向罗指点守卡要隘。不料，罗的一个贴身卫兵突然抽出连枪对准石维桢，罗静平顺手将连枪推开。这时石维桢这才明白罗静平施的是“金蝉脱壳”计。于是，他转身跳下一个高坎，跑回窝坨寨，急忙带人去追赶，但屯务军早已翻过角弄寨山坳，从吉峒坪逃回县城去了。

龙潭举义后不久，县政府印发了《永绥县政府告民众书》的传单，威胁我们说，如果不解散队伍，政府要派大军来剿。我们不理睬他们这套，仍然坚持活动。接着，第三行政督察区专员兼湘西屯务处处长余范传又发出了《告永绥县屯苗民众书》，我们仍继续活动，并与在下七乡起事的梁明元取得了联

系。我们两军会合，声势更大了。（陈自焜 龙泽全整理）

*乾隆嘉庆苗民起义时，龙门寨苗民石果堂，曾组织苗民奋勇抗击清军，人们称他为苗三。

【责任编辑 朴永子】

我的土家族织锦艺术生涯

叶 玉 翠*

我于1907年农历八月二十八日出生在龙山县苗市乡叶家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叶家寨是个土家族居住的寨子，寨前一条清清的洗车河，山清水秀，人们居住在这里，就象生长在图画里面。可惜人民的生活太贫穷了，象我家5口人，只有5挑包谷土（大约相当于一亩）。为了度日养家，父亲叶成乐农闲时常去挑脚（当挑伕），日日夜夜在里耶、贾市、隆头、苗市、洗车河等墟场奔走；母亲尚二姐每天五更起床半夜才睡，一年到头不得空闲，打点豆腐拿去卖，挣几个油盐钱。因为家中贫穷，大哥读了一年书就停学了。二哥读书时，我好羡慕，天天拿他的书翻看。有个隔房叔叔是教书的，见我爱书，就对我父亲说：“你这个女子（女儿）读得进书，你要盘（让）她读点书。送她来我这里读吧，我不收钱。”父亲连连摇头：“女子家，读么子书？不读不读。”叔叔只好算了。我们叶家寨出山进城起码要走百多里路，封建思想严重，重男轻女。土家族男子十一二岁就要帮家里打柴种地；女子稍微大点就不准单独出门了。到了十一二岁，开始学针线活路，一直到做出了陪嫁物为止，到了婆家才可以单独出门做工。父亲就是受了这种封建思想的影响。

那时，我们土家山寨是“养女不织花，顺如（还不如）莫养她。”家有机声，户户有织锦。有句打油诗说：“白布帕子四只角，四只角上绣雁鹅，帕子烂了雁鹅在，不看人材看手脚

*叶玉翠，女，土家族，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湖南省民间工艺美术学会名誉主席。

（针线活技巧）。”土家族女子在婚前要学的针线活很多，有织花、绣花、插花、挑花、扯扯花几种，织花只是其中的一种。织花的纹样都是从生活和生产中所接触的动物、植物、日用品、天象等中取材的。这些花型纹样经过祖祖辈辈的摸索、挑织，共有两百种左右。动物纹样有虎皮花、狮头花、马花、猫脚迹花、蛇皮花、猴手花、燕子花、蝴蝶花、阳雀花等；植物纹样有大白梅、小白梅、九朵梅、烂苦梅、岩墙花、韭菜花、金勾莲、葫芦花、麻叶花、葡萄花、菊花、藤藤花等；生产、生活用品的纹样有桌子花、椅子花、船花、棋盘花、箱子花、称勾花、铜钱花、锯子花、打杵花、耙耙架子花、豆腐架子花等；天象纹样有太阳花、月亮花、满天星、雾云花、半边月花、天蓝花等；动物和植物合并组成的纹样有蜂子（蜜蜂）牡丹、喜雀闹梅、凤采牡丹、凤朝牡丹、野鹿含花、鹭鸶踩莲等，还有米字花、万字花、十字花等等。另外，有种八勾花纹样也是大家喜欢挑织的。这些八勾花分为单八勾、双人勾、十二勾、二十四勾、四十八勾、盘子八勾、箱子八勾等许多种。这些纹样从生活、生产中接触的事物中来，又不是全象原物，颜色搭配得好，织出来十分好看，用途也很多。土家族办喜事必备的被面、门帘、帐檐、飘带、八挂、宝剑、枕头、小孩的摇窝被衾（小被面）、盖裙、背裙、帽子、口水夹，土家族成年妇女穿的衣服、戴的帽子等等，都是用这种织锦做的。土家族织锦和我们的生活、感情密不可分，女子出嫁时要用它来盖头，出门时要用它来包衣，跳摆手舞要披着它作为披风，女子婚后生了小孩，娘家贵重的礼物就是土花被衾，用它来祝愿新一代人幸福。因此，织锦是我们土家族人民生活中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

“西兰卡普”是土家族女子挑织的土锦中的主要工艺品，译成汉语，“西兰”是被面，“卡普”是花，“西兰卡普”就是花被面的意思，因为它是我们土家族的被面，就叫“土花被

面”了，它还带有泛指所有的土家织锦的意思。“西兰卡普”到底是哪个创造的？是怎么织出来的？没有文字记载，只有一个民间故事。说是在很早以前，我们土家族有一位叫西兰的女子，长得很美，很会织花。天上飞的、地上走的、山上长的、生活用的，她看一眼就能织出来，世界上能织的花她都织遍了，她的美名传遍了土家山寨。一次，她听说屋后园里白果树也开花，是“寅时开花卯时谢”。为了织出它，她夜夜去白果树下守候。嫉妒的嫂嫂见她一连几夜开后门出去，怀疑她在屋后园与后生约会，就对她哥哥说了。哥哥一听妹妹在外鬼混，火躁脾气来了。他喝了一肚子酒后，赶到后园。这时，明月朗朗，正巧白果树开花，惊喜若狂的西兰正摘下一朵绿晶晶的白果花闻了又闻，自言自语。哥哥听见西兰讲话，便认为嫂子的话是真的了，一下子扑上去，用棒槌将妹妹打死了。西兰死后，变成一只叫“哥哥苦”（阳雀）的鸟，每天在白果树前飞来飞去，用凄厉的声音叫道：“西兰去起恰达（土家语：西兰没做别的事），等着白果开花！嫂嫂是非小话，哥哥把我错杀！”后来的土家锦就再也没有织出白果花。为了纪念这位为织锦而死去的美丽的西兰女子，土家人把原来叫“谈慈”的花被盖改叫“西兰卡普”，还用“西兰卡普”代指土家锦了。

西兰卡普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汉代起，它就被先辈们作为向皇朝“进贡”的工艺品。在龙山、永顺、保靖等县，它是姑娘出嫁时的必须陪嫁品，从娘家送的织锦被面多少，可以判断娘家的贫富情况，最少的两、三床，最多的有三四十床，一般的也有四至八床。

1916年春天，我9岁，对于挑花绣朵这些事情由好奇转到有兴趣了，看到寨上许多十一二岁的姐姐都在学织花，也很想学。有一天，我对母亲说：“娘，寨上好多姐姐都在学织花，你教我织罗！”母亲说：“娘只会挑花，不会织花，你要学，

就拜你伯娘做师傅吧。”母亲真的请来了伯娘向水花。织花的机子是木制的腰机，我们叫“机头”，这种“机头”机体低小，长五尺、宽二尺多，高三尺，分为机架、滚板（或称经轴）、绊带、踩棍、竹筘、棉棕、绞棍和梭子。织花步骤是：染色、倒筒（将染好颜色的纱线倒成筒）、数筘、牵纱、滚线、上机（安筒、捡花）、试机、挑织。挑织时面对斜放着的腰机，带好绊带，把经线的一端系在腰上，拉紧，凭脑子记忆下来的传统纹样或参考花型蓝本的要求，用小牛角挑子挑起已分成小组的底绞纱（经线），再扳一下机上的梭刀，将不同颜色的纬线，用梭子打紧。在挑织时，花面朝下，眼睛能看到的是土锦的背面，而挑织方法又分为上斜、下斜（对斜）、中斜几种。所以，开始学打时根本摸不到门路，挑一下，打一梭，又要翻过来看一下，十分麻烦。那天，伯娘教我织的是燕子花。这种“燕子花”从纹样上根本看不出是燕子，它是以两块反向对称的三角形象征燕子尾，表现出燕子最有特点的剪刀形尾。在挑织时，只要反复挑简单些的下斜和对斜针，比较简单。可是，伯娘手把手教了我一个上午，口都讲干了，我还是稀里糊涂，心想：这么难学，还不如踢鸡毽去。午饭后，伯娘没见我去，只好对我母亲说：“这个女子还没有坐心，我哪里教得好？”伯娘走后，母亲骂了我一顿，说我：“既然想学织花，又没有坐心，害我请人。”我好伤心，认定她们是看不起我。我偏要争这口气，就暗暗下决心要学会它。第二天大清早，我一个人先起床，偷偷织了一个早工，吃早饭时，我终于掌握了织花的最基本动作，告诉母亲：“娘，我会织花了。”母亲当时连声夸奖。以后，我对织花的兴趣越来越浓，不论天晴落雨，都坐在机子上织花，不久就把最好织的哦啰背（铜钱花）、咳扯花（锯子花）、铜把花学会了。母亲见我认真了，就想方设法让我学会更多的针法纹样。她带我四处求师。有一次，还带我去朱家寨，向庙上

的一位尼姑学会了九种扯扯花技术。慢慢地，我把上斜、下斜、中斜几种织法都织熟了，织的东西拿得出手了。按照土家族风俗，女子不能赶场卖货，我就让哥哥去卖，看到那一顶鱼尾巴帽子换来一斗米、一个围兜换来一斗包谷，给家里添了收入，我心里不知有多欢喜。

我学会织花以后，又接着学了纺纱、染线。过去织锦用的彩线，都是用植物和矿物作染料的。如土靛、草莓、棉叶、棉梗、朱砂、土红等等。染出来的颜色虽然不及现在用的化学染料染出来的颜色鲜艳，但显得很古朴。十一二岁时，我就开始织土花被面了。土花被面一般有三尺多长，一尺多宽，它是由三四幅土家锦拼合成的，两挡头缝合宽约一尺的黑布，所以，织一床要花一个多月时间。为了把花织得更乖些，我经常跟着摆地摊的人学剪纸，向大自然学画画。我们女子不准单独上山，我就跟着哥哥们一起上山砍柴、打猪草，看见好的东西就用心记住，回家后先在石头上画好，再照着织。一次，看见一蓬刺花开得很鲜艳，就坐在石头上看，连柴也忘记砍了。回去后把画好的花样剪下来贴在布上试绣，看起来不太象，但却很有味道，就上机挑织。对山上的蜻蜓、蝴蝶、飞鸟和河里的鱼、蟹、虾等动物，我也经常用这种办法来挑织，寨上许多姐妹向我学，甚至晚上还点着桐油灯来学，十分认真。我们认为“好象”是没味道的，还是“不要太象”，就是“似而不似，不似面似”有味些，如“阳雀花”纹样是深色底上有几行鸟形几何纹的垂直排列，或隔行错动移位，两只鸟中间挑上菱形小花，每一只鸟纹的颜色不同。这种阳雀就是那种“西兰”传说中叫“哥哥苦”的鸟，因此，这种纹样看来不大象鸟，但很有味道。再如“台台花”纹样，一看就太象虎头，为什么叫“台台花”呢？因为土家族人过去避讳“虎”字，这里织的虎头是指的坐堂白虎（神），我们土家人说它是保护生灵的。“台台花”作成大

小被面，是借这种神来维护（虎音）生灵的意思。还有“万字花”是长命百岁的意思等等。

随着年纪的增大，我对这种工艺越加热爱，真是上了织机就舍不得下来。但是，由于没有文化和家庭生活的贫困，又使我不得不回到现实中来，用自己微薄的力量来做一点能做的事。

我17岁那年，大哥结了婚。他与大嫂感情不和，一气之下，出门当兵去了，这么一来，家里生活就更困难了。为了替父母分担忧愁，我拼命地织花。那时，一床土花被面可以换五斗苞谷，我就主要织土花被面，别人织一个多月，我就织20来天。

按照土家族的习惯，男女婚姻在很小的时候就由父母包办确定了。我还在学踢鸡毬的年纪时，就和西吾坪嫫嫫（姑姑）家的表弟向心远订了亲，1926年9月和他完了婚。我的陪嫁品是四床自己设计、自己挑织的土花被面，纹样是一床大白梅、一床小白梅、一床山羊石必（小兽花）、一床四十八勾。到了夫家，算是走出了闺房，得天天陪伴丈夫上山挖地，下田做秧，不能再象做闺女时那样天天在家织花了。我放不下对西兰卡普的热爱，白天干田里活，夜里点上桐油灯织花，不到半年，上河下河，七里八外的人都称我是“妙手”，说我能“妙手生花”。他们和我换工换活，帮我做门前活，我帮他们准备嫁女看月（女子坐月时，娘家的亲族前去看望）的礼品西兰卡普。丈夫是个厚道人，见大家要我帮他们织花，也就不要我去做田里工夫了。这样的安定日子刚过上两年，一天，娘家来人报信，说二哥死了。二哥一死，大哥又杳无音讯，孤苦的父母依靠谁呢？我真是忧愁万分。真是祸不单行。不久，丈夫又在为西吾坪团防小头目彭夫驼子守寨卡时，被彭夫驼子放了暗枪。我赶去时，他已经奄奄一息了，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腹部，浑身上下都是血。我只好把丈夫抬到塔格洞的向六姐家里，请草腹医

治。彭夫驼子是当地一霸。他听说我丈夫没死，又带人来到塔格洞，非要把我丈夫打死。我拼死命拦在向六姐门口，拖住凶手说：“要打，就连我一枪打死。”彭夫驼子真的把枪口对准了我。这时，幸好有个叫么女麻子的好心女子拦住了彭夫驼子说：“这么搞要不得，叶家寨的叶成本昨天回去时说，他们叶家的人，连手指也不能出点血，要是有事，他们叶家一族人都要来打！”她还对凶手说：“向心远的伤势这么重，活不几天了，何必补他一枪。”彭夫驼子想想也就不再叫人打了。他找到帮我丈夫治伤的草医说：“你再敢帮向心远找药，我连你一枪打死！”那草医吓得不敢再来了。第二天夜里，丈夫就含恨死了，这时，我才22岁。丈夫一死，无依无靠的父母、婆婆，都要靠我照顾。我挑灯摸黑地织些西兰卡普，还卖掉了我结婚时的一床四十八勾被面，以此糊口。

这样的日子熬了3年，父亲患了痢疾，上呕下泻，这种病当时是没法治的，没过多久，父亲就去世了。父亲死后，我们的日子就更苦了。为了生活，我没日没夜地纺线、染线、织花。

这样苦撑了两年。我27岁，了在母亲和嬷嬷（姑姑）的劝说下，和补竹湖的向心锐结了亲。向心锐也是个苦命人，年纪轻轻就死了妻子，留下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我过门以后，见他很老实，对我也很好，心想，这下又算找到了个好人。我把那个孩子当成自己的亲生骨肉，细心照看，看着他长得白白胖胖的，心里真是高兴，和他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哪知，他还没长到两岁，突然发高烧，用草药也没治好，没几天就死了。1940年正月，向心锐也害肺病死了。我又成了寡妇，沉重的打击使我几次哭晕了过去，真想一死了事，左邻右舍苦苦地把我劝住了。从此，家、幸福这些事我都不敢想了，只怪自己命不好，一心一意把心思放到了织锦上。

这时，由于日军的侵略，官僚、地主的剥削，土匪的抢劫，

民族歧视和天灾人祸，我们土家村寨的日子过不下去了，许多土家族人民逃进山林，刀耕火种。土家族妇女为求一点衣食，扔下了织锦手艺。原来在赶场时可以见到的那些地摊上、货架上、背篓上、手腕上叫卖的十分好看的织锦都不见了，连我结婚时陪嫁的被面小白梅和大白梅也被土匪抢走了。可是我仍然坚持织西兰卡普，我心爱的人一个个都失去了，我喜爱的西兰卡普不能丢，生活已经把我和它的命运连在一起了。经过摸索，我发现我们土家族织锦和其他民族的工艺品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如和苗族打花带就不同，花带是用丝线和棉线打的，它是由预先安排好的经线和随时变化的纬线一次织成的。织的时候正面朝上，可以看得见，花纹也简单些。而我们土锦只能背面朝上，透过背面“看”清正面，花型也很多，有200来种，我亲手织过的就有140种，现在还能记清80来种。我还发现土锦的一些纹样是吸收了其它挑花、刺绣工艺的精华而成的，如凤穿牡丹、狮子滚绣球、野鹿含花、喜鹊闹梅、鹭鸶踩莲等纹样，但它经过我们土家族织锦艺人的挑织，已经变成地道的土家族织锦纹样了。土家族织锦的配色很自由，红、橙、黄、绿、青、蓝、紫、黑、白、棕等颜色，可以随意选择，不受任何工艺的限制。从各种色彩选配上，可以看出一个挑织女子的性格、爱好和技巧。根据土家族织锦的挑织要求，从它的纹样花型来看，多数是菱形结构，有以斜线为主，对称、反复连续的纹样；也有勾形组成的菱形纹样，如以八勾为中心对称地向外缘逐层扩散，黑勾形成后，空隙的地方就成了白勾。黑白都是勾，正反交替、上下连续，十分好看；还有象动物动作的几何排列纹样，如猫足迹、鱼尾花、狮子头、蛇皮花等。有的纹样还只有我们土家族织锦才挑织得出来的，如铜八独斋（桶盖花）、娥罗卑（背笼花）、礼毕合（船花）、妥毕八勾（箔子花）、惹斗盖（万字花）、马卑花（小马花）、拆俄利（波浪和蛇）、似桂似梅

(山梅花)、咳扯(锯子花)等等，还有迎亲图、老鼠迎亲图、福祿寿喜、米字图、打杵花等，都是按照民族的意识挑织而成的。例如，我们土家族织锦的龙纹，就和书上画的不同，由于受到挑织工艺的限制，又要求具有“不要太象”的特点，经过挑织加工后的龙纹一点都不象汉族的“龙形九似”(头似牛、角似鹿、嘴似狮、须似虾等)的花型纹样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还接触到了一种以素色为主的土花被面，这种土花被面大多是三四十岁的土家族妇女挑织出来自己用的。这种被面叫做“数纱花”，它用色简单，一般只有黑白或者蓝白两种色。在黑的或者蓝的底线上织出白色的有规律的花纹，布满整个锦面，纹样大多数是传统的万字花。如“七字夹花”，是由四个正方形的万字花纹样连接起来组成基本形，中间加上九个小白点。还有一种数纱花是在黑的或蓝的底线上织出白色的清秀独幅自由花纹，如风穿牡丹、蝴蝶牡丹等，它的形体自由，纹样也与传统的十字花型接近。

我就这样一天到晚沉浸在自己喜爱的织锦工艺中，有时忘了吃饭，忘了睡觉，只是非要出去卖锦或传看纹样时，才出去串串。虽然，我深居简出，却仍然有人打我的坏主意。我第二个丈夫向心锐有个族弟叫向心美，见我不改嫁，认为我挡了他夺家产的路，就四处造我的谣，说我不学好，乱跟男人来往，丢了家族的脸。他见我不理他，没有改嫁的打算，就跑到叶家寨的叶仲翔家拨弄是非，说我败坏了家风。叶仲翔是县保安团的中队长，是我的叔辈，他信以为真，亲自带一名枪兵来补竹湖。这时我刚好从外面回来，叶仲翔就命令枪兵朝我开枪。枪兵扣动了扳机，没响。枪兵第二次举起了枪，叶仲翔拦住了他，说：“别打了！要是冤枉的事，子弹就会出水子。”他走进屋来问我：“你刚才怕不怕？”我很奇怪，问他怕什么。他说：“有人告你不学好，给我们大根大族的人丢脸。子弹出水子了。”

我才明白，你是受了冤枉。”我一听这话，眼泪直流，想到自己命苦，没惹过别人，别人却要害死我。我对他说：“二叔，你如果信别人的话，打死了我不要紧，可我娘要靠我织花过活呀，我死了，她也要饿死的。”叶仲翔点点头，走了。过了不久，补竹湖有个妹妹要出嫁，我去教她织花纹样，天天早去晚归，叶仲翔又听信了别人的谣言，要打死我。当叶仲翔向我瞄准时，被那个妹妹死命拦住：“二叔，打不得，你帮帮我的忙吧，她还要教我织许多花样咧！”叶仲翔这才走开。

旧社会，一个穷苦人家的女子，地位是相当低贱的，要想做个安分守己的手艺人很不容易，一不小心，就有丧命的危险。我就是这样又要保命又要养家，又要坚持织锦，又不改嫁中熬到解放。

1949年9月，叶家寨解放了，多年漂荡在外的大哥回到了家中，尽管颠沛的生活已经把他变成了一个呆痴的废人，可全家三口总算能安稳地住在一起了，我再也不担心别人来谋我的性命，我真正能安心挑织了。我把一颗心都放在挑织上，一些我喜欢的花型，千方百计找来织出，我自己一块旧帕子上有“迎亲图”的一段纹样，我照样回忆织出了全图。刚刚解放几年，我就织出许多好看的花型。寨上许多年轻女子都来向我学，遇上我去做田土功夫，她们就都邀着去帮忙。有一次，一下去了十一个姐妹帮我挖桐子坡，锄棉花草，喜得我母亲直笑。

土家人民获得新生以后，土家织锦的名声也传到四面八方。那些虎豹的斑纹、锦鸡的彩羽、蟒蛇的赤章、龟甲的格纹、艳丽的山花、勇武的壮士等等各种各样的花型，主花用色都很明亮，看上去十分突出，次花用色比较灰暗，看上去隐隐约约，主次分明，十分好看，它表现了我们土家族人民的粗犷、直爽的性格和真挚的思想感情。1958年夏天，中国美术家协会湖南省分会主席李昌鄂同志从长沙给我寄来一张新设计的纹样，叫

做《开花山区》图。图上有花、鸟、金鱼、兔子、猪、马、牛、羊，还有山、水、林、木以及放排的土家族人物形象。我一生中从来没有织过这么复杂这么宽幅的大型土锦。凭自己40年练就的挑织技术，我很快就把这幅壁挂挑织成功。接着又挑织了另外四幅大壁挂，被选送到伦敦国际博览会上展出了。

1959年初，苗市人民公社全部劳力都到克拉山上扎营，进行“大兵团”生产，我已经50多岁，也被叫上了山，不能参加劳动，就给别人带小孩。正巧，李吕鄂同志到叶家寨找我，听说我已经上山，不再织花了，便马上去县里和有关领导商量，把我叫下了山。这年冬天，湖南省美协又把我邀到长沙，和那些工艺美术设计人员一起研究土家族织锦的工艺，一住就是半年。解放前我从来没有进过县城，赶场也只到过毛滩、苗市等大寨子，突然一下进了省城，真象做梦一样。我十分感激党和政府对我的关怀和重视，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我把平生所学的土家锦挑织方法、纹样以及染色、工艺程序等毫无保留地讲了出来。从长沙回来后，我把省里行家们新设计的一些纹样和传统纹样进行了比较，发现传统纹样的上斜针多，难织一些，新式图案对斜针多，好织一些，就是不熟悉，难得记住。我吸收两种纹样长处，又打出了一些花型。我暗暗下决心，要摸出一些既能保持土家族风格，又便于挑织的纹样来。我不分日夜地在一块石头上画，画了擦，擦了又画，把那块石头都擦得溜光，可以当画板了。就在我快成功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挑织西兰卡普成了搞“封、资、修”，我的机子被没收了，每天上街捡狗屎，真是度日如年。

1978年，我又一次获得了织花的自由，我的心欢喜得要跳了出来。此时我已是70岁的人了。我整天高高兴兴地坐在腰机上织呀挑呀，不知道什么是疲劳。1979年11月，我到北京出席了全国工艺美术艺人、创作设计人员代表大会，受到党和国家

领导人的接见及记者们的采访。这次会以后，我们土家族织锦，的美名传遍了全国，许多画家、记者专门到叶家寨来看我挑织，买去我们的土锦。《人民日报》、《人民画报》、《民族画报》等杂志，都刊登了我们土家锦的挑织方法、纹样。上海科技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也先后拍了《湘西土家锦》、《土家织锦》的电影。

土家锦在保持自己风格的基础上，也采用了现代流行的毛线、腈纶线、膨体纱等，这些线颜色鲜艳丰富，不需染色、并纱，但必须用染色棉线作底纱。织锦品种也由被面、帕子发展到沙发套子、信插、自行车坐垫套、电视机套、电风扇套、挎包、壁挂、小钱包等许多种，还远销日本、美国、新加坡、英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很受消费者欢迎。我自己织的《张家界》大型壁挂，被挂在北京全国人民大会堂里；我织的《燕子花》被选入《中国绢织艺术》一书；我织的《老鼠迎亲》等68幅作品，被轻工部征集为国家织锦珍品收藏了。我还当选为省民间工艺美术学会名誉主席。

看着西兰卡普越织越多，流传下来了，我的心宽了。但又担心自己年岁大了，这门工艺不能全部传给后人，就想收几个徒弟。1980年以后，我陆续收了本寨的冬翠、七妹、春英、作香四个女子为徒，白天，教她们挑织，夜里，教她们画画。不久，她们织出的东西还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了。

1984年，龙山县为了发展土家织锦，决定把原来的县帆布厂改为县织锦工艺厂，接我去厂里当织锦顾问，还要我带几个人去厂里生产织锦。我带着冬翠、七妹、春英、作香、水云五个徒弟进厂工作了。1987年3月，我的徒弟叶七妹、叶吉秀、刘燕被省工艺美术研究所请到长沙织了一幅4米多宽、10余米长的“岳阳楼”，挂到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现在，县织锦厂每年生产土家锦1万多件，产值80万元，产品多次

荣获轻工业部、省、州优质产品和全国工艺美术百花奖。1985年10月，厂里挑织的一幅名为《张家界风光》的土锦，在武汉举办的全国少数民族用品展销订货会上，得到许多客户的赞赏，一时有10多个省、市共300多个单位要和厂里订货。1987年4月，省长熊清泉亲笔为织锦厂题字“土家织锦，大有可为”。联合国一位叫端兰的人题词说：“我所见到的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工艺品，愿她更快更好地得到发展。”她说：“如果将土家锦带到欧洲去展销，将会轰动整个欧洲。”可惜我今年已经80岁了，力不从心，我真想再多织一些好的西兰卡普来，打入国际市场。

（邱晓玲 整理）

【责任编辑 朴永子】

隆 回 瑶 族

■ 泽 芝

历 史 源 流

隆回瑶族亦称花瑶，现有人口5395人（1985年底统计），散居在雪峰山东麓的小沙江五个乡和词门前区大水田乡。姓氏有沈、奉、蒲、刘、步、回、严、兰、丁、唐、杨、梅。究其历史渊源，曾有“过黄河”的传说，相传瑶族祖先的发祥地在黄河以北。逐步迁徙南下，“漂湖过江”到达浙、闽等地，后迁至江西吉安府、田庐，在此居住时间较长。据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奉氏族谱》“序”中记载：“奉明公原籍江西吉安府、田庐，坟墓均在鹅颈坪。”因遭封建统治者镇压，一部分迁云南，一部分迁贵州。迁往贵州的一部份，后又迁往广西桂林，奉姓过去有人在春节时写“桂林世第”贴在堂屋门楣上，出处沿此。迁往桂林的一部分人后又辗转来到湖南西南山区。由于官府派兵穷追不舍，为了谋求生路，寻找安身之地，这部分瑶民被迫再度迁徙，沿河直下洪江，终于找到栖身之所，开始刀耕火种，劈山垦田，安居乐业达两百年。在此期间，逐渐形成了瑶族独特的风俗礼仪。至今瑶族姑娘所唱的瑶歌《夜汕》中有许多歌词述及在洪江生活的情况。如“洪江约民郎素，哥剥约喜郎礼”（意即“洪江瑶民前辈的风俗，洪江瑶民前辈的礼节不能忘”）。在瑶民一些礼仪词语中也有反映这种情况的。

瑶民在洪江期间，封建王朝惧怕瑶族人民互相串连，聚众

造反，因此只准在常德以上到洪江止这个地段居住，并且划地为界，不许超越。故当地汉人呼为“介古老”，地方统治阶级、豪绅官吏对瑶族人民肆意进行剥削压迫，强夺其财产，使瑶民生活极度艰难。明洪武时，瑶民不得不由洪江迁徙溆浦龙潭。据奉氏族谱载：“五房始祖影世公明洪武元年（1368年）从洪江徙户至龙潭。”可见其后裔均是这一时期迁入龙潭的。到龙潭后，瑶族人又被称为“当鼓老”。原因是：瑶民被统治阶级步步追杀，在逃奔途中，所有物件尽弃，仅存一只心爱的战鼓，行至龙潭，饥饿不已，只得将战鼓当给饭铺老板，换饭充饥。“当鼓老”的称呼便由此而来。瑶族在龙潭居住期间，专门刻有大石碑，记述祖先的来历、大事和规章告诫。瑶族在龙潭住了一段，又遭朝廷官军镇压和地方势力欺凌杀戮，遂被迫往高山密林进迁。各姓上山的时间有先有后，上山的路线也有几条。沈姓出了龙潭后，到葛竹坪住了一段时间，继而到沈家洞，再上迁至响水洞、麻塘山、洋九江一带，后分开，一部分到桐木溪、白马山的穆子坪居住，另一部分迁到金竹山、鱼鳞洞和崇木幽等地；奉姓从龙潭绕葛竹坪到鹿洞，再迁岩头至本国盛，有一部分到歇官寨。在此扎根之后，又扩展到虎形山，另一部分到茅坳、白水洞等地；步姓径迁步下垅，后又上移至飞水洞等地；刘姓从龙潭到麻塘山，继又分迁至大托、茅坳、畚坪等地；蒲、杨等姓经葛竹坪到打卦冲、鹅羊寨、岩下塘、黄土、蒲家坳等地；回姓绕司门前到邹家坳，再分迁至桐木溪、弯溪、杉木坪等地。此外，严、唐、梅、兰等姓也同时陆续上山。据清《邵阳县乡土志》载：“瑶不编都以峒分，峒十有六。在县西北，属隆回巡检而统于县（今隆回县小沙江区）。其峒曰：鱼鳞峒（今黄金井乡兰草田村、小沙江乡龙幽村）；界上峒（今小沙江乡芒花坪村、文明村之牛家店）；鹅栗树峒（今小沙江乡金竹山村、江边村之何家湾、亭子界）；

麻坑峒（今江边村之黄家、奉家及茅坳村）；上山峒（今小沙江村、文明村）；桐木峒（亦名三青界峒，今虎形山瑶族乡崇木幽村，富寨村之顶天坡）；马蝗峒（亦名马蝗山峒，今茅坳瑶族乡草原、大坵、四角田、白水洞、周朋、岩儿塘等村）；布当冲峒（今富寨村之竹山、金田、富寨、向阳）；扫箕峒（今富寨村之庙山，刘家、网形）；香炉山峒（今龙坪乡的光化、龙坪、光龙等村）；白面江峒（亦名白马江峒，今虎形山瑶族乡的虎形山村、水洞坪村、水栗幽村之本国盛）；岩壁下峒（今龙坪乡之响龙、岩背村）；下山峒（今小沙江乡的肖家垅、分水、洞江、白银等村）；贯冲峒（又名田贯冲峒、乾鱼峒，今小沙江乡的杉木坪、梅家坪、管子溪等村）；暗溪峒（今小沙江乡的旺溪村）；刘家峒（又名麻塘山峒，今麻塘山乡）。以上是隆回瑶族的来历和分布居住情况。

三大节日的来历

瑶族有三大传统节日：每年农历五月十五至十七日在水洞坪举行“讨念拜”（汉语拼音“tǎo lín bài”）。“讨”是走，“念”是月，“拜”是半，意思是月半所过的节日；七月初二至初四在茅坳、七月初八至初十在小沙江所举行的两个节日都称为“讨僚皈”（“tǎo liǎo guī”）。“皈”是菩萨，“讨僚皈”意思是逃脱凶恶的菩萨。

这三个节日的渊源，据传水洞坪的“讨念拜”源于明万历元年（1573年），神宗皇帝遣兵数万余人镇压集居在潯（潯浦）、邵（今隆回）地带的瑶民，为时三年零六个月，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所不为。瑶族人民不畏强暴，在潯、邵瑶山修建唐梅寨、尖岩寨、鹅羊寨、天心寨、蕨芽寨、歌官寨、香炉山等寨坚守，明军不断向各寨进攻，在瑶族人民英勇抗击下一筹莫展。第三年端午节（农历五月十五日）夜晚，明兵施

计，打着200余个灯笼火把，佯攻香炉山要塞，瑶族军民放弃各寨前往堵击，明兵趁虚而入，偷营破寨，杀死瑶族男女老少不计其数，血流成河，歇官寨后改名为“血光寨”。瑶民遭此杀戮之后，幸存者四处逃命，不得不隐藏到深山老林，靠挖蕨，拾野菜和捕捞鱼虾为食。至明万历五年（1577年）神宗才下令收兵回朝。从此，瑶族祖先议定每年农历五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水洞坪举行集会，作为受辱雪耻纪念，并由奉姓为首主持。

茅坳的“讨僚皈”起源于元朝末年，瑶族祖先聚居在江西吉安府田卢地带，遭到当地统治者赵、鲁二督统的镇压，瑶族人民四处奔逃，许多老弱妇孺逃走不动，在元军追杀下，只好躲藏在鹅颈大丘黄瓜、白瓜丛中。有些怀孕妇女因又惊又怕，加上连日奔走，致使胎儿早产，无奈跪地哀求饶命，追兵见状禀奏元军统帅赦命，统帅照准，在鹅颈大丘丢插令旗：“此处赦留，不准斩杀。”因此，凡躲在鹅颈大丘黄瓜、白瓜底下的瑶民总算保全性命。瑶族祖先为了纪念这次在黄瓜、白瓜底下幸免于难，免遭杀害，当天起誓：“永传后代，要越过七月初二才能吃食黄瓜、白瓜，如有违者，则子孙不昌。”自此至今，奉、沈两姓在农历七月初二以前禁食黄瓜、白瓜。并定于每年农历七月初二至初四，举行集会以示纪念，名曰“讨僚皈”。开始由刘姓在大坵主持，后因此地偏僻，交通不便，清末才改在茅坳举行。

小沙江的“讨僚皈”源于清雍正元年（1723年）。据传麻峒瑶族回姓有七姊妹，被汉族豪绅廖元翁带领200余人追赶，引起回姓人的反抗。廖元翁慌报军情，称瑶族造反，请王朝立即遣兵数万前往镇压。瑶族人民不畏强暴，英勇奋战，在大沙江与清兵大战一场，瑶民死伤甚众，剩余的人败退到小沙江，清兵跟踪追杀，又在此小杀一场，两地共死伤瑶族数百人，剩

存的瑶民被迫越山绕道退到麻塘山隐居。清兵直追到五都七岭八寨，瑶族人民靠着“一夫当关，万夫莫入”的地形，与敌周旋，不断出没在山林中，奇袭清兵，杀得敌人胆战心寒，无法进兵。加之潯浦瑶族首领蒲公祥领导瑶众攻打龙潭切断清兵后路，逼使清兵停战议和，从隆回小沙江、潯浦五里江等地撤兵。与清廷议和之后，瑶族祖先为纪念作战牺牲的勇士，两地改称为“大杀江”、“小杀江”。后来汉族迁居上来的人越来越多，为了加强民族团结，又改称为“大沙江”、“小沙江”。同时，定于每年农历七月初八至初十在小沙江街上（开始在崇木岗场上）举行集会，名曰“讨僚皈”，表示永志不忘。

在这三大节日时，瑶族人民不论男女老少，都身着节日盛装，兴高采烈地奔赴集会地点，尽情欢庆，周围汉人亦参与同乐。也有邻县群众远道而来，有的是来庆贺，有的是看热闹，有的是做生意。人山人海，熙熙攘攘，历时三天，兴尽而归。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瑶族人民的节日，每逢三大节日，省、地、县党政机关时有代表参加，并抽调干部组织指导；商业部门为满足节日需要，增拨物资，摆摊设点；宣传文化部门演出戏剧，放映电影；政协、科技等部门组织服务队，为开发山区、搞活经济，开展技术咨询，提供各种服务；卫生部门派名医为瑶民免费看病。特别是近年来，文化部门多次上小沙江参加瑶族节日活动，将节日盛况、挑花技艺、衣着服装搬上了银幕、银屏，在北京还专题举办了隆回瑶族风情摄影展览等。所有这些，既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瑶族人民的热情关怀，也体现了民族间的亲密团结。

生 产 与 生 活

瑶族自古“刀耕火种”，进入洪江时才开始开垦农田，种植水稻。瑶族人民以大米、玉米、红薯、马铃薯、糝子、粟等

为主食。以豆类、蔬菜、家禽、家畜为副食。他们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如烧草木灰，沤制廋肥，改良土壤，提高单产。到了明清时期又学会在水田中施放人畜粪尿，在秧苗根上糊上骨粉，促使禾苗迅速返青，分蘖生长，结籽壮实。在灌溉方面，根据山区条件，开渠引水，或架设竹、木枧，分流灌溉。在生产技术上，按不同作物特性，分别实行条播、点播、散播、浅种、深种、远栽、近栽，另外对分留、架楼、传粉、除草、灭虫等形成一整套种植经验。植树、栽竹方面，在竹、树未发芽生长前，进行栽植。如松树在清明前移植，成活率高；杉树的移兜、插枝，则在冬末、春初为宜；种油茶树和栽楠竹时，为减轻根部吸水分和肥料的负荷，先将油茶树苗的叶子全部摘掉，母竹截去尾部，留四至五层竹枝。种植药材，他们更是行家里手。如种天麻，不施人畜粪，只挖取老竹根，连同易朽的树木埋入穴中，再放入天麻种苗，用土盖好，使其生长。

瑶族人民长期生活在山区，掌握了各种鸟兽的活动规律，能用各种工具或方法进行捕猎。捕猎时，一般知道哪个山岗，有什么野兽，栖息的地点。如围击野猪，首先摸清野猪的落脚地，再看地形，派人把住野猪必经的道路。在围击时，众声呼喊，让野猪惊而出逃，捕捉者把握战机，及时瞄准射击，很少差误。另外，还有“装铁踏”、“用石堕”、“安绳套”等捕法。捕捉鸟类，除了“装套”、“网罗”之外，便是铳打。瑶族人使用鸟铳、猎枪的技术十分高超，有些猎手甚至能百步穿杨、弹不虚发。这些捕猎方法与技术，显示了瑶族人民战胜自然的无穷智慧。

瑶族人民因受居住条件限制，自古以农业生产为主，工、商业比较落后，地方经济不发达，生产发展很慢，至今还只有简单的手工业。手工业多属就地取材的家庭副业，如竹篾编

织，以山竹为料，编织后也不外出销售，只在家里出卖。瑶民中会木工的不多，工匠多半串户上门干活，没有固定的作坊与加工厂。铁工手艺及其他制造业，至今仍是空白。

瑶族人民没有经商习惯，也没有经验。解放前所需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等都靠外地汉人进山贩卖和附近汉人所开设的商店供应，商品交换以货币为媒介，也有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商品交换对瑶山生产的发展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由于瑶民缺少文化，在商品交换中总是吃亏。特别是商人利用赊销典当手段变为债务剥削，使得不少瑶民倾家荡产。如“布当冲”就是过去商人用两匹粗棉布，轻而易举地骗取瑶族一个山冲的山林和田土而得名。

瑶族居住的山区，峰峦起伏，沟壑纵横，交通不便，物资供应缺乏。正如他们所唱的歌谣：“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对面喊得应，走路半天多，要想得生活，全靠自己作。”

瑶族人大都嗜好烟酒，一般自酿米酒，自栽旱烟，很少仰赖市场上的供应。瑶族住房多属木屋，一栋三间，中为厅堂，侧屋加部为厨房，后为卧室、储藏室，左右偏舍为猪、牛栏或厕所。房屋多数矮小狭窄，简陋粗疏。衣着用品都要购买，除妇女服装用粗棉布挑花刺绣外，一般都很朴素。解放前男女老少跣足草履的多，至解放后才普遍穿上鞋袜，生活逐步得到改善。

语 言 特 点

瑶族与汉族杂居，既能讲瑶语，也能说汉话。瑶语近似苗语，多带鼻音，是古时传留下来的方言土语，没有文字，只限于古时的物、数、色、情、性及自然变化等。如：

1. 称谓人的：汪（我）、猛（你）、并（他）、男（人）哥男（老人）、门男（瑶人）、客（汉人）、剥（祖父）、噍（祖母）、爸（父）、漫（母）、老巴（哥）、老忒（弟）、

馈（姊妹）、达（岳父）、对（岳母）、统（舅）、己男（丈夫）、阿（妻）、档（儿子）、嬖（女儿）、省（孙）、彼（伯父）、抗（叔父）等。

2. 说人体各部的：几（头）、腊（口）、没（眼）、秒（鼻）、茂（耳）、补（手）、肱（脚）、哼（肚）、抗儿（膝）、十（胃）、杏（肝）、渺（肺）、笔（毛）、儿笔（头发）、扣（牙）等。

3. 说家用各物的：裱（屋）、套（桌）、洁（凳）、总（床）、报（被）、塙（衣）、镐（裤）、顿（裙）、稳（锅）、降（鼎）、夕（碗）、勺（筷子）、颠（杯子）等。

4. 称动作的：狼（吃）、狼夜（吃饭）、号（喝）、号狼（喝酒）、少（站立）、宜（去）、宜果（走）、背（睡）等。

5. 称自然及气象的：狂（天）、叠（太阳）、推叠（出太阳）、拉（月）、扁拉（月明）、杠（星）、昂机（风）、飘昂机（动风）、箔（雷）、瘪箔（动雷）、磅（雪）、绑磅（下雪）、躲（霜）、杂躲（打霜）、合（雾）、乌合（起雾）、昂鲁（露水）、昂弄（雨水）、拜弄（下雨）、勒（土）、约（石头）、动浪（夏天）、动吼（冬天）。

6. 呼植物的：杂（树）、拨（竹）、锁（草）、拍（谷）、扁（瓜果）、土（豆）、特（薯）、位（菜）等。

7. 叫动物的：买（马）、恨（牛）、容（羊）、介（鸡）、亮（狗）、拍（猪）、拨岩（老虎）、跪（鹰）、嫩（蛇）、界（虫）等。

8. 表数字的：页（一）、滑（二）、不（三）、积（四）、璧（五）、丢（六）、假（七）、洗（八）、个（九）、苦（十）。

9. 表年月的：钟（年）、戛钟（去年）、礲钟（今年）、

拨钟（明年）、低钟（后年）、碾叠（今天）、拨得（明天）、假演（正月）、泄演（二月）、伞演（三月）、斯演（四月）、恨演（五月）、柳演（六月）、喜演（七月）、把演（八月）、久演（九月）、献演（十月）、献衣演（十一月）、献二演（十二月）。

10. 表明颜色的：告（白色）、巩（黑色）、得（红色）、茂（青色）、桂（黄色）、拨（蓝色）。

11. 表明性情的：跌（笑）、戛（哭）、孽（恶）、恙（善）。

以上所举的是部分常用词，其余不一一举例。

近代出现的事物，用瑶语无法表达，瑶民只能按汉语称呼，如：地球、地极、南极、北极、大空、行星、恒星、太阳系、飞机、火车、汽车、大炮、坦克、核武器、炸弹、原子弹、电灯、电话、电报、电视机、收音机、手表、挂钟、开水壶、的确良、毛线衣、呢子裤、灯芯绒等。

因瑶汉杂居，受汉语的影响，有些瑶话中带有瑶汉两种语音结构，如：丢鞋（穿鞋）、蹲帽（戴帽）、陡爆（放爆）、剃几（剃头）、读西（读书）、犁凌（犁田）、破炭（烧炭）、买替（买布）、对灯（点灯）、诊骂（诊病）、摊本雷（摊楼板）、瘥木匠（做木匠）、瘥生意（做生意）、撬汽车瓜隆回宜（坐汽车到隆回去）、弄抱态度恙（他的态度好）等。

瑶语虽然在语音上受到汉语的影响，但在语法上仍然保持自己的特点，多在名词前面冠以状词，也有将状词倒置在名词后面。

1. 在名词前面冠以状词的。如：

表明条形的：得杂（条树）、得沾（条凳）、得推（条楼梯）、得补（条手）、得肮（条脚）、得套（条桌子）、得得拨（条竹子）、得壁（条棍）。

表明性别的：男（人）、男剥（祖父）、男嚟（祖母）、男爸（父亲）、男慢（母亲）、男老巴（哥哥）、男老斌（弟弟）、男愤（姐妹）、男达（岳父）、男对（岳母）、男统（舅舅）、男己男（丈夫）、男阿（妻子）、男档（儿子）、男壁（女儿）、男省（孙子）、男彼（伯父）、男扰（叔父）、男门（瑶人）、男客（汉人）。

表明动物的：哼介（只鸡）、哼亮（条狗）、哼拍（头猪）、哼恨（头牛）、哼某（条鱼）、哼嫩（条蛇）、哼跪（只鹰）、哼勒下（喜鹊）、哼丫（鸭子）、哼卧（只鹅）、哼毛突（兔子）。

表明个数的：浪表（个屋）、浪稳（个锅子）、浪降（个鼎）、浪忌（个柜子）、浪歹（个碗）、浪儿（个头）、浪钟（个钟）、浪灯（个灯）、浪桶（个桶）、浪黑（个园）。

表明张块的：该陶（张纸）、该靠（张皮子）、该毯（条席子）、该报（条被子）、该绕（条手巾）、该凳（条裙）、该对（块土地）、该本（块板子）。

总之，凡表明各物都要把状词加在名词前面，这是与汉语语法不同之处。

2. 将状词倒置名词后面的。如：

瓜、果都称“扁”：扁挂（南瓜）、扁蒲（白瓜）、扁卦（黄瓜）、扁当拍（冬瓜）、扁得（辣椒）、扁亢恨（丝瓜）、扁媛（梨子）、扁勒（李子）、扁禹（板栗）。

豆类的豆称“土”：土彼（黄豆）、土当（饭豆）、土勺（豆角子）、土罢（峨眉豆）、土四季豆（四月豆）。

称器物的。如：忌杂得（木红柜），如果按瑶语的顺序翻译就是：“柜树红”了，用汉语说是不通的。又如：橙柏（花裙），“橙”是裙，“柏”是花，如果按汉语字的顺序讲，就变成了裙花，以“花”为主，而不是以“裙”为主，与原意

“花裙”完全不同。其他如：总圣（新床）、套躲（长桌）、降鹿（铁鼎）、啻告（白布）、啻茂（青布）、啻桂（黄布）、啻拨（蓝布）、啻得（红布）等都是将状词倒置在名词后面。

将状词倒置在名词的后面是瑶语修辞的特点。如果汉语把状词倒置在名词后面是不通的，或者改变了原意。如前所举“木红柜”、“花裙”二体便知。

瑶族说话分为“普通话”、“阴暗话”、“特用话”等几种说法。

1. 普通话。普通话如同汉语中的白话，人人易懂能说，是用来谈话的口语，只要学了瑶话的人都会说。旧社会瑶汉有矛盾，虽然瑶汉杂居，汉人都不懂瑶话，更不会说瑶话。解放后，瑶汉人民交往密切，很多汉人逐步能懂能说普通瑶话了。

2. 阴暗话。阴暗话如汉语中的文言文，这话瑶族人也有很多不懂，更不会说。只有极少数人，如瑶族巫师，瑶族歌手和熟习瑶族各种习俗礼仪的人才会计。通宵“夜讪”的歌词，瑶族巫师给人“瘥皈”，觅神、说理、喃喃念说的咒词，婚聚“邀酒”席上欢饮所说的恭维话及平时敬神、祭祖所说的词语等属阴暗话。阴暗话在一般的场合是不说的。

3. 特用话。特用话是将普通瑶话倒过来说，故意使人不懂。如吃饭，普通说法为“狼夜”，改后成为“丢渺”。丢渺用汉语翻译，即“啄鼻子”的意思。坐下要走了，普通说法为“宜”，改后成为“冬”。“冬”用汉语翻译，即“拔起来”的意思。

文 化 教 育

瑶族人民因长期遭受剥削压迫，迁徙频繁，加之没有文字，文化教育比较落后，古文古代诗歌、舞蹈及传说、故事等都是老人口授，时间久远，多有遗忘。歌词留存不多，舞蹈全部失传，民间传说与故事也很少。兹将现存的文化、教育略作介绍。

1. 文化方面：

瑶族在长期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创造了一些绚丽多彩的文化艺术。

歌谣：

瑶族不论男女老少，都喜欢唱歌。瑶歌一般是对唱形式多，独唱或合唱较少。在格律音韵方面，无一定句式，不强调押韵。歌谣朴实而富有生活气息，是瑶族古代社会文化的直接反映，较为全面地记述了整个社会历史发展史实。如瑶歌“夜汕”，歌词都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有抒情、叙事；有生产、生活、习俗、劝勉等内容。从中可了解一些古代历史。隆回瑶族祖先在湖南洪江时，青年男女多以唱歌表达感情，最后结为伉俪。他们所唱的情歌，语言优美、善于比兴，民族特点浓郁，既可畅叙胸怀、表达心意，也可鼓励对方进步。

挑花、刺绣：

挑花、刺绣是瑶族妇女传统的手工艺艺术。早在汉代就有挑花，作为衣裙装饰，到了明清时期，挑刺艺术更有提高，善以简练生动手法，表现出复杂的自然形象。色彩的处理，能应新巧配，往往以青色、深蓝色布为底，用红、黄、绿、白纱线、丝线或毛线挑刺出线条明快、色彩鲜艳的图案。

瑶族妇女的包头巾、衣袖口、裙、脚干包布、鞋、袜等都刺绣有花。她们挑花不需描图，全凭一双眼睛，依照裙布、头巾等的大小，固定图案位置，然后运用各色纱线、毛线挑刺出各种绚丽多姿的图案。如“双龙抢宝”、“双凤朝阳”、“双虎示威”、“双鹤报喜”、“双蛇比势”、“双狮滚绣球”、“喜鹊含梅”、“雄鸡斗志引吭长鸣”等。旁边插配一些奇形怪状的花样及一些三角形、菱形、直角、直线等几何图案。并使整个大小图案互相对称，互相衬托，有主有从，层次分明，色彩和谐，浓淡相间，鲜艳夺目。体现出浓厚的民族特色。

2. 教育方面：

瑶族人民迁徙频繁，生活极端贫困，没有受正规教育的机会，瑶族子弟主要是受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是家长鼓励子女勤劳、诚实、孝敬父母，尊敬老人，对人和睦，热情相待等。社会教育是利用集会、讲故事、对歌等形式宣讲民族历史。清代时有“私塾馆”，教授“四书五经”，但入学的全是富家子弟，一般贫民子弟极少。隆回瑶族虽然也有几名“秀才”，如杨才雄、杨才英、刘绍南、刘绍元、奉德芳等。但这些秀才也只能背读《三字经》、《学面》、《幼学琼林》等，只有极个别的能通达“四书五经”，写一般的应用文。

国民党统治时期，在瑶区开办了一些乡村学校，推行开化措施。民国初年在瑶族集中的虎形山，办了一所开化学校，但瑶族人民能送子女读书的寥寥无几。小沙江区境内的瑶族，自费读到初中毕业的只有一人，读到高中的没有。只有两名在邵阳简易师范读书。虎形山开化学校经费不足，师资缺乏，学生质量差。至今瑶族中年长者大多是文盲。

解放后，党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十分重视，加强了领导，增拨了经费。在文化上，省里在小沙江的老鸭山建有电视微波站。虎形山、茅坳两个瑶族乡均建有广播站、电影院，相当一部份瑶族家庭都安装有广播喇叭，每天可以收听到中央、省、县广播电台编排的节目。供销社代销文化书籍，以满足广大瑶民精神食粮的需要。在教育上，县里先后拨款修建了茅坳和虎形山两所民族中学，村里均办有小学。随着学校的增加，学生能就地入学，瑶族子弟读书的人数逐年增多，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中学生也有所增加。

医 药 医 术

瑶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掌握了许多草木的属性，

加上瑶族所居住的山区，是天然的药库，识药的瑶医不少。他们对虫毒蛇伤、跌打刀伤、风湿瘫痪等有特效药方。此外，也使用艾叶灸、打火罐、桐油烫、按摩、刮痧等许多土方。瑶族人民用草药和不用药物治疗的医术，给人们解除了不少伤病痛苦，深为群众信赖，享有较高的声誉。瑶医不仅为本民族治疗疾病，而且跨县过省行医售药。他们外出卖药行医时，一般利用农闲时间，其所到之处，受到各族人民欢迎和信任，对促进相互了解，增进民族团结起到了一定作用。

风 俗 习 惯

隆回瑶族虽与汉族杂居，但始终保持本民族的风俗习惯。

服装方面，瑶族妇女头上一般都绕丈多长青、白线织成的方格粗花布和各色（主要是红、黄色）缀成的结发带。头巾用手挑刺花纹图案，两端挂着各色丝线、亮珠、彩球等。所穿的绣花衣服因年龄不同而色彩各异。青少年女子穿浅蓝色或浅绿色；中年妇女穿深蓝色；老年妇女穿蓝灰色。内衣袖口刺绣有花，衣服边缘用红布卷边，纽扣也用红布卷制。衣服为对襟，布扣只是配相，长衣有四摆卷在腰间，只有冬寒时才放下。腰系各色花布结成的长约三丈圆筒腰带。下穿自己手工挑刺的精致花裙，花裙后面均为蓝布白线挑刺的各种图案，一般为花、鸟、走兽等；前面是用红、黄、绿色纱线、丝线或毛线刺绣成菱形、三角形、四方形、长方形、梯形等几何图案。脚缠一条宽五寸，长约五尺的白布，布边挑刺图案花纹，从脚踝起将花纹依层次露出，鞋子也刺绣有花。因妇女从头至脚喜着挑有花的服饰，故有花瑶之称。瑶族妇女不仅喜着花服，而且喜欢佩戴金银首饰，如遇婚娶喜事，或瑶族三大节日，他们便更换鲜艳夺目的服装，戴上金银耳环，颈悬金、银锁链和银铃等，腰佩银牌、银锁等。男子服装较女子简单。其特点是包头巾、大

漆长衫或短衫、腰带、裤子、绑腿、鞋、袜等都着青色。近代因受汉族的影响，男子服装逐渐被汉化。

婚姻方面：自古瑶族青年男女以唱歌、游戏等方式联姻。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受汉族婚娶风俗影响，也有采用媒人介绍结婚的。瑶族婚姻，舅权至高无上，姑母之女出嫁，首先要征得舅父的儿子同意，舅父儿子不娶，才能另嫁。做媒先由男方媒人说起，待女方同意后，才约女方媒人，共同议婚。双方媒人多是男子，妇女较少。征得父母同意，本人愿意，媒人才约男女双方定日期过礼订婚。订婚手续过去比较简单，如今则需要较多的财物礼品。根据古时流传下来的办法，在订婚那天，男方媒人携带一把老油纸伞去女方家，进屋时，媒人把纸伞放在堂（厅）屋的神龛上，女方取下伞，并在伞内的撑篾上悬挂着先已准备好用各色花布和丝线扎成的十二个丝线布球。这些布球就是订婚证明。媒人将伞带回后，丝线布球便永远保存在男方家。如要离婚，必须把订婚时的丝线布球退还女方，才算了结。订婚仪式是这样：媒人在女家坐席时，女方把线球挂好后，仍照原样把伞放在神龛上。同时，女方准备许多湿田泥放置门口，并在门口紧紧守住，等到媒人与送礼物的男方客人在筵席上喝到第四碗酒时，闹爆竹一响，男方便立即取伞溜走，女方便将湿田泥朝媒人和担送礼物的人身上乱涂乱扔，一直追到离女家约五百米媒人来时所做的纸柱边（用红纸为底，在红纸上插入小木棍15根，再用红线将木棍互相连上），才停止追击。媒人身上虽糊满田泥，不但不生气，还喜笑颜开，因为糊的田泥越多越好，表示女方很同意此婚事，如不糊田泥，则表示女方对婚事有意见。媒人溜走时只能走堂屋正门，不能走侧门，所以男方来人无不沾泥。所沾的泥衣要穿回男家，保存三天才洗掉。用田泥追击媒人，是根据传说古时的瑶族人沈丫乖，用纸伞抢走了老道君的女儿——姮娥如灵，老子道君发怒用飞

刀追击的故事而来的。

迎娶时，新娘的亲朋戚友都可陪送，只有新娘的父母不送。送行时由男方媒人走前带路，走到离男家约120米远的地方，也有一纸柱（如前介绍），此时新娘与送行妇女都必须撑开所携带的雨伞，缓步前进，不论路程远近，傍晚时才能进男家。走近堂屋外“喊杀”（“喊杀”意即“驱邪”）的几案旁站立。执行“喊杀”的人高声念“咒语”，然后杀雄鸡一只，把鸡血绕地洒一大圈，最后焚纸、抛米、洒酒于地而结束。

“喊杀”之后，新娘与送亲妇女才收伞入堂屋。新娘到了堂屋，先向神龛行一鞠躬礼，再朝堂屋门外行一鞠躬礼，其意是先敬祖宗，再敬天地神灵，然后进屋就坐。此时，送亲男子们被“邀酒”者拒之门外，不得进屋。执行“邀酒”者，向来宾说一遍奉承话，来宾答言之后，才劝客人饮酒。劝饮中，主、客双方客气以礼相待，邀酒完毕，男客才能进堂屋，然后正式摆桌设席。在堂屋中用三个大方桌合拢来为首席（正席），专为新娘的长辈（祖父、叔伯、外公、舅父等）而摆设。席间执壶敬酒的人，由男方选一能说会饮的人担任。他劝饮敬菜时，都用一套歌词性的话，如请客人挟肉吃时喊“单位叫郎”，用汉语翻译就是“挟点野菜吃”。席间敬酒、喝酒有很多名称。如初喝“成双”，就是连喝两碗，喝第三碗叫“三架闯财”，喝到第四碗叫“四季发财”（必须连喝四碗），如果继续喝，便是“对亲家”（必须连喝两碗），再喝还有“五子登科”、“禄位高升”、“七星北斗”、“八仙过海”、“一中苦一娃的吼浪”、“苦一娃的满纳领号”等喝酒名称。喝酒、吃饭的碗数要成双，吃了一碗，就要吃第二碗，吃了三碗，必须吃第四碗。劝饮、劝饭要讲许多客套话，所以这席酒需要二至三个钟头。坐上席的人称为“龙头”，待全席人散开之后，才能离席。

新娘、新郎当晚不见面，新娘不入洞房就寝，也不吃饭或

别的食品，整夜坐在凳子上，由所有男女来宾及男方亲朋戚友等陪同，玩上一晚。主要活动就是男女方各选来歌手对歌，除唱瑶歌外，也有男女对唱“山歌”，谈笑说趣，闹到天亮才罢休。

死丧方面：瑶族人办丧事与汉族人不同，要为死者“瘳皈”问去向。人死后，死者家属请瑶族巫师为死者“瘳皈”两天两夜，或一天一夜。巫师不停地念诵“阴间咒语”，目的不是为死者“超度”，而是寻死者的阴魂下落，处境如何？寻见问明情况后，死者给后人“颁巩斜”（赐福分的意思），然后才转达死者的话，家人听到“死者的话”无不悲泪痛哭。死者未出葬以前，由其亲属、朋友及附近的妇女来陪同哭孝。死丧不送礼，远近亲友只来吃饭凑热闹，顶多拿几根香、几片烧纸来；埋葬时，孝子要披麻服孝，行跪，选地定针，焚烧灵屋，念经拜忏，三牲祭奠，绕棺做道场。另外还要挂“三夏”，死者家属为其先人“挂夏”，大家邀请亲朋戚友参加，在清明扫墓前进行。“挂夏”的礼物是各色纸张、爆竹、肉、年粑、糖果等。“挂夏”那天，先为死者做一花纸树，插在坟前，花树用竹尾为杆，上挂各色纸条而成。去坟墓挂夏时，妇女穿白色孝服行前，到达坟边，即伏在坟墓两侧放声大哭，一直哭到把祭奠仪式举行完毕。出坟山后，要给每个上山挂夏的人两个年粑，并邀亲朋戚友回家吃饭。

其他习俗还有：①座房内安置四方火塘，火塘中放个三脚铁架，火塘四周用厚石板围隔，外放矮足长板凳，以便煮食取暖。四方火塘是瑶族祖先所传，汉人很少用。②对来客少敬茶水，只殷勤递烟，而且围坐者只要与来人相熟也要相继递烟。③妇女临产前，她的乳母或姐妹要送碗饭给她，用意是吃了所送的饭，孩子生得快。分娩后要坐月，不倒床睡，天天坐着不能外出，等满了月，才到别人家串门，意思是未满月到别人屋里去会污秽了别人的地头。在坐月中要用用草药煎水洗身，洗涤

污垢，防止疾病。④杀过年猪时要请巫师“瘟饭”——“报饭正”。吃年夜饭规定三餐：即腊月二十九（月小二十八）日晚吃团年饭，三十日早吃过年饭，正月初一早吃新年饭。过年饭和新年饭要在天亮前吃毕，年饭只是家里人吃，不给外人吃。在吃年夜饭时，各自注意不随便到别人屋里去，以免“踩断别人的年庚”。除夕夜放在神龛上祭祀祖先的菜饭，要留到正月初一日，让小孩们拿到山野，边撒边唤鸡。天发亮时，家里主人取一把锄头、一把柴刀、一把割草刀和一些包谷穗，捆成一挑，到外面散步，表示耕种。⑤走路时让人先行，自己走后，表示尊敬。夫妇走路，男的行前，女的行后。⑥瑶族人好客并殷勤招待，喜欢劝饮，敬菜，劝饭，往往弄得客人酩酊大醉才罢休。如果杀有鸡鸭，以头敬客，其次是敬鸡鸭脚、内脏等。客人到家，如没有吃到鸡头，即使把全鸡劝他吃完，也不够满意。⑦瑶族人喜欢狩猎。大野兽必须集合多人围猎，所得的野兽肉，除头、四足归击毙者独得外，所有的肉都按人数均分（击毙兽者仍照样分肉），大人小孩所得数量相等。

宗 教 信 仰

瑶族的宗教信仰比较复杂。他们相信万物皆由天安排，人的命运也由天所定。同时把为人所用，给人所食的地生万物看作是神。对日月，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无法理解，也视为神灵，加以崇拜。有时还烧香化纸求天地自然神等保佑。崇拜祖宗至为真诚，为了表示对祖宗的缅怀和追念，每户必须在堂屋的正上面装设神龛，写贴家先，平时用饭菜供奉，每年古历七月初十接回祖先，餐餐都用酒饭敬奉，到了十四日晚烧纸焚香，备办各种食品等欢迎归位。每年清明扫墓，要携带香纸、食品等到坟前祭奠。

宋、元以来，佛教、道教相继传入瑶区，特别是道教的传

入，对瑶区影响深远，有些丧葬祭祀仪式，按道教法旨进行，其中只掺杂一些民族原始宗教内容而已。信奉佛教的人，平时在家供佛念经，出家化缘的虽没有，但是对寺庙的菩萨却很敬奉。也有一些人信仰基督教。

此外，鬼神禁忌也多，如信奉“土地萨菩”，用三块石板竖立土地堂，家里神龛下设土地屋，每逢杀鸡时，用血沾几根鸡毛贴在土地堂和土地屋的上面，表示感谢土地神对家禽家畜的保佑。狩猎要敬“梅山神”，祈求能猎获野兽。对“灶皇菩萨”很尊敬，厨房火灶、座房四方塘中的三脚架，都禁止用脚踩踏。有些人还信“娘娘神”、“坛神”、“产难鬼”等。禁忌有“逢戊不动土”、“山向不空”不能修坟和挖屋场地基以及婚娶喜事要择吉日、过年过节不能打烂东西、新年要讲好话，莫说死等等。

瑶族巫师自称勾通人鬼之间的使者，可以“探鬼”、“问鬼”、“征服鬼”、“攘鬼求福”。瑶民认为生病都是鬼怪捉弄，因此要请巫师“瘕皈”。妇女怀孕，请巫师“瘕皈”；杀过年猪，也请巫师“瘕皈”。不少人把一切灾祸、疾病都归咎于神灵，靠“瘕皈”消除。

瑶族盛行的“瘕皈”，据说是古时瑶族人沈丫乖从老子道君（李耳）的女儿——姬姬如灵学得的。念唱的术语都是瑶族人的“阴阳语”。“瘕皈”的方法：巫师坐在四方火塘边，日夜用竹片敲击着铜钟上的铁片，口里不停地念颂“阴阳术语”，以此寻神觅祖。在敲击“铜钟”的同时，用左手握着“法刀”（这法刀用铁打成，中间的小铁圈，有七个、九个和十二个三种），在地板上击响。这种求神谢鬼的方法，虽然许多人认为是迷信，不属宗教信仰，但至今瑶族中，甚至部分汉族中，也有不少人相信。

（指南 整理）

【责任编辑 徐晓吟】

龙山土家族的风俗习惯

王 本 亮

土家族，本民族自称“毕兹卡”，亦称“毕际卡”。龙山县的土家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1984年统计，全县总人口418,728人，其中土家族有195,863人，占48.42%。他们主要聚居于里耶区、洗车区的18个乡、镇、场和红岩区的农车乡一带。在其他区、乡、镇、场多是杂居。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龙山县土家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长期以来，一直通用汉文，但有着自己的语言；直到现在，聚居区的土家人民还习惯使用自己的语言进行思想交流。更值得重视的是，他们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传统地保留着本民族的独特风俗习惯。

称 呼

龙山土家族对人和物的称呼，都使用本民族的语言。

对人称呼：

曾祖以上的人统称“业替”。称祖父为“爬善”，祖母为“阿妈”。

称父亲为“阿巴”，母亲为“阿捏”。

称丈夫为“诺巴”，妻子为“洛嘎捏”。

称儿子为“闭”，孙子“惹”，重孙为“嘎惹”。

称媳妇为“铺”，女婿为“骂”。

除以上称呼外，其他同辈人，只分性别，不分年龄，都是一个称呼。如对祖父、祖母和外祖父、外祖母的兄弟，都称

“母思阿巴”；对他们的姐妹，都称“母思阿捏”；对伯父、叔父、舅父都称“巴也阿巴”；对伯母、舅母、姨母及其姐妹都称“巴也阿捏”；对姨父称“捏也阿巴”；对姑母、岳母及其姐妹都称“你可阿捏”；对婶娘及其姐妹都称“捏也阿捏”。对弟、叔伯弟、表弟都称“阿矮”；对姐妹、叔伯姐妹、姑表姐妹，分别称“阿打”和“阿矮”；对侄儿、外甥儿都称“诺必”；对女、侄女、外甥女都称“比郁”；对外孙、侄孙、姑表孙都称“惹”，对孙子以下各代，不论族内族外，一律称“嘎惹”。

普通生活用具称呼：锅子称“塔苦”，鼎罐称“写抹”，铁瓢称“爬树”，碗称“切闭”，筷子称“补指”，碗柜称“启波”，水缸称“沙缸”，筛子称“血七”，簸箕称“塔起”，背笼称“禾杀”，咱笼称“冗梯”，柴刀称“苏苦”，火钳称“劝千”，菜刀称“坨坨”凳子称“搓克”。

其他称呼如，油称“色四”，盐称“那布”，米称“直而”……不一一例举。

居 住

在旧社会，龙山土家族同苗族、回族等少数民族一样，多半聚居于交通不便、文化落后的边远山区和高寒山寨，如坡脚、龛房、洛塔、长潭等乡。就是同汉族杂居的一些区乡镇内，土家族居住的地方，又往往是在较远的偏僻角落里，他们欢喜同姓同宗住在一处。长期以来，由于各民族之间互相通婚的关系，各民族结寨杂居逐渐形成。但是这些地方往往是土家族人数多于汉族人数，如洗车、苗市、隆头沿河一带就是这样。

龙山县土家族习惯于一家住一栋房子。当然随着兄弟增多，分家后还未建好新房，也有几家住一栋房子的。

土家人多半是住木房子。房子的结构有严格要求，一般讲，框架结构不论是几间，都是“3柱4棋”或“5柱8棋”。比如一栋只有3间房屋的框架必然为四排，每排如果是3根落地柱头，那么必须是4根不落地的棋筒。同样如果是3间房的屋，也是4排，每排有5根落地柱头的话，那么，必然是8根不落地的棋筒。当然后来也有变化的。比如在北半县出现了“5柱7棋”的，富人家还有“7柱11棋”的。所谓“柱”和“棋”的规定，是指每排而言，不受间数的限制。

一栋4排3间的房屋，中间一间叫堂屋，作为祭祀祖宗、接待宾客和办婚丧大事之用，平时不是特殊情况，其中不停放什么物件。左右两间叫住房，住房以中柱为界又分前后两小间，前间设有火坑，摆有碗柜；后间作卧室。住房上有天楼，也分前后两楼，前楼铺楼条，用于通烟；后楼铺木板，用栏或手堆放杂物。在住房两边，一般喜欢在右边配偏屋，作猪、牛厕所用。在左边，富裕人家喜欢配厢房和吊脚楼，楼下作粮仓与碓、磨房；楼上作“书房”或“闺秀房”。还在房屋周围打围墙，前方开朝门。房屋四周也喜欢种果树、竹子、花草等。

对于大多数土家族人民来讲，盖栋住房是很不容易的事，“改土归流”前的土司制度时期，一般都是住木叉搭架、茅草盖顶的屋。新中国建立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关怀下，土家族人民住上了自己的木板房。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少土家山寨已盖起了青石、青砖平房和楼房，有的还住上了钢筋水泥楼房。

服 饰

服饰，是一个民族在外表上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显著标志之一。土家族的服装就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征。

男性老年人，爱穿无领大袖满襟衣，头包青布帕或白布帕；年轻人头包青丝帕，呈人字路，身穿矮领对襟衣，多布扣成排，裤子都是青、蓝布加白布裤腰，鞋子是青面白底。

未婚女子多将头发梳成独辮垂于背后，经常缠白布帕或青丝帕，光露面容，两耳下沿穿孔，并吊金、银质耳环。有钱人手腕戴银质或玉石手圈，手指上戴金银戒指，胸前挂“牙钱”，上系银链、银铃、银牙杆、银珠子一大串，行走时丁当作响。婚后则将发辮改挽成髻并束上丝网套，别上簪子，插上玉石花苞等饰物，衣长大无领，向右边开胸襟，袖管短而袖口大，胸襟和袖口滚有寸宽五色花梅条或丝绣花条，喜欢穿蓝、青布裤（白裤腰），裤脚大而偏短，裤脚口上方一寸处镶有花梅条或丝绣花条，鞋是青面白底，稍尖，鞋面前端绣花。老年妇女也穿宽大满襟衣，青、蓝布裤（白裤腰），不穿袜，多用青、蓝布裹脚后再穿鞋。

土家族很注重装扮小孩，特别是对帽子，按年龄、季节确定帽形。春秋季节戴“紫金冠”，夏季戴“冬瓜帽”，冬季戴“狗头帽”或“鱼尾巴”和“风帽”。这些帽子上面除用五色丝线绣成“喜鹊闹梅”、“风穿牡丹”、“长命富贵，易养成人”、“福禄寿喜”等图案或文字以外，还在帽子的前沿，缝上“大八仙”、“小八仙”、“十八罗汉”等银菩萨，帽后吊银牌、银铃。不管男女，小手腕上都戴银圈，银圈上吊有银锤和银铃。

解放后，随着时代着装的变化，土家族的衣着也在变化。小孩和妇女的浓装只有在大喜大庆的日子里才能看到，平时，土家青年男女一般穿汉族服装，只有土家族聚居的乡村的老年男女才穿宽长的满襟衣和青、蓝布裤，但很少见穿镶有花边的衣裤。

饮 食

龙山上家族的饮食与汉族区别不大，也有他们共同喜爱吃的东西。例如糯米糍粑、糯米团馃和火炕腊肉。每到过年前，腊月中旬或下旬，他们将饲养的肥猪杀了，做腊肉。先砍成长块（大小不均），抹上食盐，套上绳子，挂在火炕上方的楼架上，利用做饭和烤火的烟熏，直到水气蒸发，肉块表面变黑，方才取下藏在谷壳里或吊在卧房的板壁上，需要时洗净炒熟了吃，香美可口。有的甚至将它保存二、三年之久，香味愈增，是待客的上等菜。土家人最喜欢在每年的清明节吃猪头肉，口头禅叫“清明酒醉，猪脑壳肉有味”。

每到过年前，土家族人民总要将一年来收获的高粱、小米、糯米分别蒸熟，放在大木槽内用事先做好的丁字形的木棒打烂，再做成直径约三寸，厚约两厘米的圆形小糍粑，浸在大木桶或大陶器缸内，慢慢吃。开春以后，土家人民上山做工，往往要带上几个糍粑，利用休息时刻在火边烤熟作中餐，格外方便。糍粑做得多的，往往吃到端午节还有，只要常换浸泡的水，糍粑并不变味，因为做糍粑时，外表抹上了一层浅淡的蜡油。

土家人民喜欢吃甜酒，特别是团馃。每年秋收后，于8月趁大晴天，将糯米蒸熟后，用竹箩圈做成直径约一尺，厚两三厘米的糯米饼，这就是团馃。有的用红绿颜料在上面做成各种鲜花，有的写上“喜”、“财”等字样，然后晒干反生，吃时用植物油将生团馃爆成美观而且松脆可口的熟团馃，既可干吃，又可泡开水放糖或盐吃，色、香、味均美。无论是聚居还是杂居的土家人民，只要是客人来到家里，他们总是热天一碗甜酒冲凉水，冬天一碗糖开水泡团馃热情招待。除此以外，还要以酒饭相请，劝客人喝大碗酒，吃大片肉，认为小碗小片是“小

气”，舍不得。如果客人实在不能喝酒和吃肉，也得表示个意思后再分给主人，并向主人表示谢意，主人也能谅解，不再强劝。如果不能吃也不能喝，又不表示态度，主人不会给你解围，更不会叫你吃饭。如果你最后将酒肉剩在碗里，主人就会不高兴，认为你对他的感情是不真挚、不够友好的。

劳 动

龙山土家族人民，具有十分勤劳的良好习惯。特别是妇女，比男子更勤劳，更辛苦。白天，她们除同男子一样在山上、田间做工外，还利用休息时间绩麻、做鞋；晚上还要纺纱、织布或编织“西兰卡普”。

无论新旧社会，土家族人民始终保持着亲帮亲，邻帮邻，互相换工干突击活的习惯。换工集体干活，人越多越热闹，干得越起劲，在劳动中享受传统的《挖土锣鼓》和《薅草锣鼓》的情趣。这就是在集体劳动中，由主人家带着锣鼓上工地，由大家推选两个歌手（群众最喜欢推选一男一女），站在劳动队伍中间，一个打锣，一个打鼓，边打边唱，先是分别唱，后来对唱。他（她）们打锣鼓不错拍节，唱歌时强调情意和音韵。内容有表现古代神话故事的，有歌颂当今方针政策的，有表现劳动场面的，有当场表扬先进和批评落后的，也有表现自由恋爱和美满夫妻的。

《挖土锣鼓》、《薅草锣鼓》能鼓舞劳动情绪，使劳动者忘却劳累。这种传统形式在龙山许多地区一直盛行，在农车乡、猛西乡、他砂乡一带更易见到。

龙山土家族人民特别爱上山打猎，叫“赶仗”。在旧社会，他们信奉“梅山”（猎神）。每年从正月初一到十五日，几乎每天都结伙扛着土枪，引着猎狗上山，首先祭祀猎神，然后围猎放狗追赶野猪、山羊等动物。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不信

奉猎神了，但有组织地进行狩猎活动一直是土家人的爱好。这不但猎取了野味，而且保护了农作物和人畜的安全。

喜 庆

龙山上家族的喜庆活动的范围、内容及形式，同汉族差不多，但也有它的特殊之处，比如生育、起新屋、婚嫁等。

生育。妇女婚后怀孕，叫做“有喜”。在旧社会，妻子生了男孩，丈夫要抱只公鸡去岳母家报喜；生了女孩，则抱只母鸡去报喜。岳家一看到“喜鸡”便能知晓是生男或生女。生育第一胎，娘家宗族总要进行隆重的“望月”，大家邀集在一起，送去早已准备好的大米、团馓、糯米甜酒、鸡、蛋给产妇吃；还要给婴儿送去衣裤、鞋袜、帽子、新摇窝和小蚊帐、小棉被、棉垫等物，以示关怀和祝贺。生二胎时也兴“望月”，但不如第一胎时隆重。

妇女分娩后，第一个到产妇家去的人叫“踩生人”，产妇家一定要留他吃团馓、鸡蛋、踩生人往往要对婴儿说“长命富贵，易养成人”等吉利话。产妇产期满一月，一定要抱新生儿去外婆家，这叫做“出月”。

起新屋和住新屋。起新屋是土家族人民一生中为子孙后代创业的大事之一，每个环节都安排得周到认真。

哪户起屋，同村人和外村的好友、亲戚都要无偿帮工。立屋架那天，在上中堂梁木时，还要举行上梁仪式，亲戚朋友都要送礼庆贺。

土家人修建新屋时，中堂梁木兴“偷”。由主人给木匠准备好一双新鞋、一段红布、一瓶酒、几块钱、一封鞭炮，再选两个得力的后生同木匠上山砍梁和搬梁。一般用有双叉的树杆作梁木，只要发现，不问树的主人（后来也不给出价钱），举斧就砍，这叫做“偷梁”。梁木砍倒做好后，先用红布盖着，

然后请两个后生喝够酒，放了鞭炮，将梁木搬来“华堂”（必须一肩搬到，中途不能放下歇气）备用。

“画梁”。梁木搬来华堂后，主人请画者在梁木的正中画上红黑两色的太极图：在靠近两端处分别写上“乾”、“坤”两个大字；并且在“乾”、“坤”与太极图之间分别画一“八卦图”。

“讲梁”。往往是在清晨进行，众人将屋架一排排地立起，当梁木安稳在中堂的两根中柱顶端之间后，主人请两个历史知识较丰富的人，边讲吉利的言辞，边分别由东西沿梯上屋，直到梁木。这时帮工的群众一律停止工作，静听这两个人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叙述梁木的沿革以及其他屋架结构的作用。如果两人一时难分上下，还要讲一些其他如各历史时期的名人及其事迹，给主人道贺等。讲完后，主人和讲梁人将事先准备好的糯米糍粑从梁上抛向观众。大人小孩都争着抢，人越多越好，以示兴旺发达。

“踩财门”。新屋在安装堂屋的大门时，一般要行施“踩财门”礼。就是先把新大门关上，然后主人站在大门内，木匠站在大门外（有的不是木匠，而是请一个会随口便答的人），用茶盘端一个大冬瓜和四个铜钱，边敲门边喊：“开门，开门！”内问：“你是什么人？”外答：“我是天上财白星，来给主东踩财门。”经过一番问答以后，主人将大门打开，外来人将冬瓜和铜钱由大门槛下直滚到堂屋中间，表示四季财源滚滚而来。

“贺火坑”。主人进住新屋，第一次使用新火坑，亲友也要来送礼，放鞭炮祝贺；主人要用大酒大席款待客人，象征今后有吃有馥。

婚 嫁

龙山县土家族的婚嫁程序同其他民族大致相同。由于男女

青年都勤于生产劳动，有较强的独立生活能力和对真、善、美的辨别能力，虽然封建婚姻制度对他们有一定的约束，但大多数人的婚姻还是在比较自由的情况下结合的。就是在以父母包办为主的旧社会里，定婚时父母也要征求儿女的意见，起码要得到儿女的勉强点头。婚前，一般要经过订亲、认亲、过礼、娶亲等仪式。姑娘出嫁，有“哭嫁”的习俗，就是用土家族语哭诉离别之情。一般都是在出嫁前的三、五天或七天开始，也有在十几天前就开始哭嫁的。姑娘哭嫁，同村寨的姑娘要去陪着哭，主要是表达安慰、祝愿之情，如果只哭三、五天，就日夜作陪；如果要哭十天半月，那么姑娘们就分班轮流作陪，在出嫁的前一天晚上最热闹，按传统称呼，哭到谁，谁必须去陪哭，以示惜别。特别是天快亮时，父母、兄妹与新娘对哭时，非常动情。

男方派人来女方接亲时，女方要派人进行“拦门”，即在大门外摆上一张大木桌，挡住为男方接亲队伍的路。这时，女方的礼官和男方的督官要对讲拦门礼。其内容是群众比较熟悉的民间故事，英雄人物的事迹，各农事季节的生产活动，有益的为人处世哲理等。其形式是你问我答，我问你答，往往要闹到深夜，男方接亲人才得进屋吃晚饭。第二天清晨起程，新娘要坐四人抬的花轿，两个送亲客（多半是最疼爱姑娘的长辈妇女）要分别坐两人抬的棚轿，伴随乐器的吹打直到男家。

新娘进入男家后，要举行“拜堂”，即新娘身穿“露水衣”，头戴“露水帕”，新郎披红扎花，两人肩并肩先向祖宗磕头，表示要光宗耀祖；又向父母磕头，表示孝敬；再向四周乡亲磕头，表示谢意后进入洞房。晚上同其他民族一样，附近的男女老幼都来新房玩笑一番，以示祝贺。新中国成立后，“坐轿”已取消，“哭嫁”和“拦门”逐渐减少，“拜堂”多数已改为鞠躬礼。



龙山上家族不干预与外族通婚，也不主张同姓通婚，但是由于科学文化落后，又往往喜欢开姑表亲。姑表兄妹有娶嫁优先权，姑氏之女，多嫁舅氏之子，名曰“骨种”，至今还流传着“姑家女，伸手取；舅家要，隔河叫”的说法。也有开姨表亲和“扁担亲”的。还有一种叫做“坐床”，就是兄死了，未婚的弟与嫂成亲；弟死了，无妻的兄与弟媳成亲(又叫转房)。另外还有妻姊妹婚的遗俗，即妻子死了，妻子的妹妹又与姐夫成亲。新中国建立后，这些封建、落后的通婚习俗逐渐减少，为自由恋爱的情侣婚姻所代替。

丧 葬

龙山县土家族对死者均行土葬。丧葬轻视小孩，重视老人；轻视在家外死亡者，重视屋内死亡者。小孩死了，叫“化生子”，特别是婴儿死了，大人还不哭，不给穿好衣好裤，用黑灰将脸抹黑，打他三巴掌，盛于木盒葬在十字路口，任人践踏，示意他再不能投胎害人。成年人，特别是老人死了，认为是最大的悲哀之事，要尽力将丧事办得好一些，以示敬孝。在旧社会，葬礼一般分入棺、操度、送葬、埋葬几个步骤。

入棺。亲人将死者洗好澡，换上新做衣、鞋，装入棺材内，用皮纸、寿被等垫盖好后封棺，停棺于堂屋正中，再点上头灯、脚灯，以示为老人照明，还要由晚辈轮流守灵。

操度。在停棺三、五日内，对善终者，要请土老司唱“溜床词”以安慰遗属；唱“告别词”，以叙说生儿育女之艰辛。有的要请和尚念经，请道士边唱边敲打锣鼓为死者“开路”、“盖灯”，往往是通宵达旦。而死者的子孙们也得身穿孝服，头包孝帕(均为白色)哭着陪同烧香纸磕头。

送葬。一般在清晨进行，乡亲们抬出灵柩，儿女们(由一位手举灵牌，其他人簇拥)在前磕头引路，丢纸钱，放鞭炮；

乡亲们一部分抬柩，一部分在后护送到墓地。

埋葬。墓地往往要选择开阔地，正前方最好是笔架山或独秀峰，认为这样能保佑子孙出现文武全才。墓井往往撒些五谷、烧些纸钱，以示死者有吃有用；还要将棺材喷上雄黄酒，用于驱虫防腐，然后才盖土垒墓。

祭墓。家属在新墓前用猪肉、香纸祭祀和烧火三夜（每夜一次），三日后，还要去新坟上“收魂”。捉一小生物放在纸筒里封牢，带回家放在神台上，表示将亡灵接到家同历代祖先住在一块。另外还有“守孝”，即儿女们一般要在头上包三年白色孝帕，以表示孝敬。

新中国建立后，这些迷信习俗，随着人们思想觉悟的不断提高而逐渐破除，丧葬采用群众性的追悼会形式，多半是用打三棒鼓、唱汉戏、讲故事等文娱形式和简单节省的方式来办丧事。

节 日

土家族的主要节日是过大年，比汉族提前一天，月大是腊月二十九日，月小是腊月二十八日，是孝家还要提前一天，即二十八或二十七过年。土家提前一天过年的来历始于明代，据《龙山县志》同治版卷之十一记载：“土人度岁，月大以二十九日为岁，月小则以二十八日。相传前土司出军值除夕，令民间先期度岁，后遂以为常。”在明世宗嘉靖三十三年冬，正值年关，朝廷调土兵，协剿倭贼于苏松，按路程算时间，不等过年就得出发，才能按时赶到目的地。为了使出征官兵过了年走，便决定提前一天过年。土家兵出征后，立了“东南战功第一功”。后人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每逢过年时，就习惯地提前一天过年。过年这天，土家人不管家中人多人少，都要架甑子蒸饭和蒸它它肉。据说是为当时集中出征官兵开餐，只有用甑

子煮饭才行。为了赶时间，杀了年猪，肉也来不及细切细炒了，只能砍成它它，和饭蒸在一起，其他猪杂、豆腐、粉条、萝卜、白菜等也合煮一起吃，后人将此合菜谐音名为“贺菜”。所以土家人民都喜欢吃“贺菜”。

过年那天先祭祖先，将常供在神龛上的祖先牌位和香炉、蜡台都取下来供在神龛下面的大桌子上，两边陈列有猪腿、粑粑、团馓等各种供品，磕头礼拜敬奉祖先。过了正月十五后才将祖先牌位再供到神龛上去。过年时酒席特别丰盛，这叫“团年饭”，但不喜欢添客。这天在门窗、猪圈、牛栏、鸡笼和各种用具上都要贴钱纸，以此预兆来年“财源兴隆”。

腊月三十日晚上兴守年，每家都要烧大火，俗话说“三十夜的火，十五的灯”。鸡一叫就立即放火炮，争先挑水，这叫“抢年”。六月六也是土家族主要节日之一。其来历，传说土王“覃厚”遇刺血溅龙袍，是日洗晒。为了纪念覃厚王，土家这天家家都要晒棉衣和新衣。又叫“吃新节”，是六月逢第一个卯日即过此节。与以上节日同样隆重，除鱼肉酒饭外，还用新辣子、新包谷它、新谷穗敬祖先和五谷神。

祭冬节又叫十月节，即农历十月十六日，是洛塔土家族人民特有的节日。据说土家族原来的首领“吴著”，是日死于洛塔山洞，洛塔人民为了纪念“吴著”特定此节日。其他各地少过此节。《龙山县志》记载：“十月朔至十六日皆宜霜，谓霜多则来岁盛木棉也。朔日，土民家宰豕作米粢，设筵宴宾如度岁然，谓之祭冬。然只洛塔里者为然，余里则无此风。相传吴著冲是日没于洛塔山故也。”

信仰和祭祀

龙山的土家族崇拜祖先，迷信鬼神的现象，在旧社会普遍存在。为了祭祀祖先，每家堂房正面壁上两米高处都设有神

台，写有“天地国亲师位”或“天地君亲师位”贴在正中。每月逢初一、十五要在神台前烧香纸，表示给祖先运送钱财；每逢过年还要隆重祭祀：凡是平时喝酒吃肉，都要将杯中的酒外洒一点，将筷子在装着饭菜的碗上放一放，静默几秒钟，表示让祖先提前吃喝。无论在自己家中还是别人家中都是如此。

土家人民认为土王和八部大神是本民族的英雄，因此在土家族聚居的乡村，基本上都建有土王庙和八部大神庙，也叫摆手堂。土家族人民都按照自己宗族派系的传统，分别于正月、六月用摆手歌舞活动来祭祖。正月进行的叫正月堂，三月进行的叫三月堂，六月进行的叫六月堂。全县以农车乡马蹄寨的摆手活动规模最大，湘鄂川边境的人民常来观赏。

土家人民信奉“土老司”，认为他们可以为自已排忧解难，帮助求子、解冤、消灾、除病。因此凡是在这些方面有需求，就请土老司来边跳边唱，闹上两天两晚。主人还要杀牛宰羊请客吃饭，然后把牛头和四蹄给土老司作谢礼。

土家族人民也信奉“四官神”和“五谷神”，传说四官神管六畜，五谷神管五谷。特别是南半县的土家人民，把石磨安放在堂屋的左大门后，视为四官神，每逢节日，都要将做好的饭、菜和酒摆在磨前的长凳上，点烛烧纸，斟酒磕头，祈求六畜兴旺，四季发财。全县均于六月六“吃新”时敬祭五谷神，祈求五谷丰登，储粮满仓。

大部分土家族也迷信鬼神，还相信吉凶之兆。在过年、起屋、娶嫁等喜庆日子里，饭煮得不好，或损坏了物件，认为是坏兆头；相反是好兆头。清早起来，听到喜鹊叫，认为这天有喜事临门；如果听到乌鸦叫，认为要倒霉。每年第一次听到阳雀叫时，如果在睡觉或拉大便都是坏兆头；如果在吃饭、休息，是好兆头；如果在看书、写字，或算帐清钱，认为要升官发财。出远门，走出家门时，如果第一个碰上的人是扛着锄头

的，就认为这次出门不损财就有灾，有的干脆不出门或者延长出门时间；如果是挑柴的，就认为一定是空手出门抱财而归。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党的民族政策的关怀，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逐步发展，这些信奉和祭祀正在逐渐减少。目前作为传统的土家族摆手歌舞活动仍在有组织地开展，土老司的活动已改造为群众喜闻乐见的铜铃舞。

禁 忌

旧社会，土家族人民由于种种社会和历史的原因，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忌讳。他们和汉族、苗族一样，过年吃年夜饭不准泡汤，否则在新的一年内大雨后的洪水会冲垮田坎；也不吃糍粑，吃了，身上要生疮长包；菜里不拌辣子，吃了怕在新的一年内办事不顺利。老人出于对子女的爱护，平时不让小孩吃祭祖的食物，认为吃了会减弱记忆力；不准小孩吃猪尾巴，吃了则要事事落后；不准小孩吃猪鼻孔，怕吃后流鼻涕和睡觉打呼噜；不准小孩吃鸡爪子，怕吃了以后读书写不好字；特别不准未婚男女青年吃猪脚叉，认为吃了以后找对象会被别人叉掉。

如果是在屋外死去的人，无论年纪多大，尸体都不许抬进堂屋，只能摆在屋外办理丧事，认为这是野鬼，不能上神台。

平时见到两蛇交配，认为是很不吉利的事，决不能喊别人观看，因为谁看了，谁就要倒霉。如果喊别人观看，则是转祸于人，别人把你看做起心不良。

在家里，不准用脚踩灶，也不准在灶锅里弄狗肉吃，认为这是侮辱灶神。不准用脚踩“三脚”（用来架锅做饭菜的铁器，有三只脚），不准移动“三脚”（只能在腊月三十那天烧大火时可以移动），否则会穷得揭不开锅。不准穿蓑衣和草鞋进火坑屋，否则腊肉会腐烂生蛆。不准将撮箕倒扑在堂屋里，

因为这是埋人的象征。不准在家中吹口哨，怕引来火灾。

对孕妇要求特别严格，不让她们随意动土，钉钉子，怕震动胎童提早坠胎；不让她们用刀子 in 门楣上砍东西，怕生下的小孩缺嘴；不准她们和寡妇坐新郎新娘的床，坐了会带来新婚夫妇不和，甚至不能同偕到老；也不让她们上树摘果子吃，怕引起果子成熟前脱柄坠地。

在旧社会，土家人民对这些禁忌非常讲究，谁违犯了，不是对他内心埋怨，就是当面教训。解放以后，广大土家族人民同其他民族一样，通过党和政府的正面教育及参与广泛的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活动，科学文化知识和思想觉悟不断提高，除极少数人外，这些禁忌已基本破除。

【责任编辑 徐晓吟】

订正《我所知道的李锐》

李 肇

登载于本刊第28辑的拙作《我所知道的李锐》一文中说：李锐“于1946年初奉调入国民党中央训练团高级班受训三个月。”是根据本人的记忆。冯华德先生阅后给我来信，指出：李锐进中训团高级班，是在他任财政部税务署署长期间，具体时间是1943年冬至1944年春，为期大约半年；毕业后数月——1944年9月，他被调任川康区专卖局局长。龚泽楚先生也证实冯先生的说法。冯、龚二位都与李共事多年，所述是可靠的。拙作中的说法，是我记错了，特此订正。

